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启示录 21:3 和合本

迦南 书集选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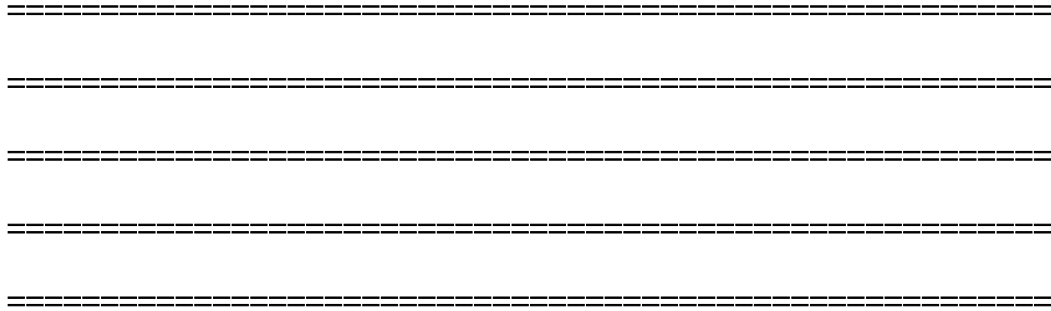
护教学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关于基督教的基本真理》

原著：克里斯托夫-恩斯特-卢特哈特

原著出版日期：1879年



目 录

第一讲 【第20页】

对立的世界观的历史发展。

提出的主题—基督教的新世界观

古代教会—中世纪—宗教改革

消极精神的发展—索西尼主义—英国的神灵论—法国的自然主义。德国的启蒙运动—理性主义—泛神论—唯物主义前观点—有神论和宇宙观的对比，……………

第二讲. 【第40页】

存在的矛盾。

问题——人与世界的关系——知识的谬误——人的存在的矛盾。

知识的矛盾——情感的矛盾——意志的矛盾

一切存在——死亡——对真理的认识是一种道德行为

——基督教的答案

第三讲. 【第53页】

有位格的神（能听能看、有自由意志、有自我认知、大有作为、无限全能的上帝）

上帝存在吗？

对上帝存在的直觉；其普遍性——无神论

上帝存在的证据：来自自然；来自自然的存在；来自自然对其目的适应；来自自然的历史；来自我们对上帝的观念。良知——结果

上帝的本质——泛神论——泛神论受到批判；它与理性、良知、心灵的要求.....相矛盾

第四讲. 【第80页】

世界的创造。

自然科学与宗教世界观的冲突—创世的观念—泛神论与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受到批判—天文学及其假定

地球的位置

地质学及其发现—地质学与圣经—地质科学的不确定性—形成正
确判断的观点，以及要点中的和谐

第五讲. 【第109页】

人。

圣经的总体观点—达尔文的嬗变理论—人类的统一性从宗教和人
性的角度来看都是必要的

种族的多样性—人是肉体与灵魂的结合—肉体—灵魂—被批判的
唯物主义心理学—圣经观点。

人的本质和命运--人是世界在更崇高意义上的再现

人的个性--他有意识的思想--他的自由意志

人的位格--人的意识形态--人的自由意志--人在世界中的地位

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人的崇高命运。

第六讲. 【第138页】

宗教

宗教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它植根于人的本性--它的居所，人的内在精神生活--它的根源--它是一种信仰。

宗教是信仰，信仰的本质；信仰在祈祷中的体现--宗教的地位--精神文化与宗教的联系。

宗教是国民生活的基础

民族生活的基础--宗教与政治生活--宗教对当今高度文明时代的重要性

第七讲. 【第160页】

启示。

启示的必要性与我们的理性和意志的关系

罪--对其普遍性的证明--对其起源的描述--其后果

道德

我们整个存在中的道德分裂，以及我们无法自我启示的可能性--
奇迹和自然法则--我们自己的力量。

奇迹与自然法则--奇迹的确定性--奇迹与启示的关系--启示的真
实性和真理

使徒的见证--复活的事实

复活的事实；整个教会的见证；我们自己心灵的见证--真理的自
证--启示与理性的关系，因为它超越了理性的局限；与错误的理
性相对立；与理性的内在真理相一致。

-理性是接受启示的器官

第八讲. 【第194页】

启示的历史--异教和犹太教。

启示的历史性质--不同民族的使命

-宗教的民族与文明的民族

异教宗教--异教道德--异教的哲学道德--异教的实际道德--异教
国家中的预言之声

各民族中的预言之声--异教徒对上帝的追寻

犹太教和以色列的宗教使命--犹太教的伟大基本思想--预言及其
历史--耶稣在以色列--以色列的审判

基督教

第九讲. 【第221页】

历史上的基督教

基督教传入世界时的历史状况

世界帝国：巴比伦帝国和波斯帝国

古代的终结和现代的开端与力量-基督教在世界的胜利进步

基督教精神的力量-基督教的普世性及其证明

基督教的普世性及其对耶稣基督的见证

第十讲【第239页】

耶稣基督的位格

现在的问题--古代的立场；现代的立场--斯特劳斯和勒南--福音书；古代教会的见证

关于耶稣的记述--福音书的自我见证--古代教会的见证

福音书的自我见证；其叙述的可信性--对福音书的攻击--福音书对耶稣的人格、青年时期和公开传教的描述

救世主的一生是神圣之爱的启示，甚至至死不渝

耶稣神奇的位格；他的圣洁与和谐；他与上帝相交的意识；他的神迹；他的话语；他的自我见证——人子；

他对世界的普遍立场；他对未来的预言。

上帝之子及其与上帝的绝对关系

洗礼和主的圣餐这两项制度的见证

复活

APOLOGETIC LECTURES
ON THE
FUNDAMENTAL TRUTHS OF CHRISTIANITY

Apologetic Lectures on the Fundamental Truths of
Christianity: Delivered in Leipsic in the Winter of 1864

Christoph Ernst Luthardt
T. & T. Clark, 1879 - Apologetics

APOLOGETIC LECTURES
ON THE
FUNDAMENTAL TRUTHS OF CHRISTIANITY.
APOLOGETIC LECTURES

护教学讲座
关于基督教的基本真理

关于基督教基本真理的辩证讲座： 1864 年冬于莱比锡演讲

克里斯托夫-恩斯特-卢特哈特

T. & T. Clark, 1879 - Apologetics - 438页

护教学讲座

关于基督教的基本真理。

索菲亚-泰勒（SOPHIA TAYLOR）翻译自德文第七版。

1879.

第一版序言。

这是一个充满辩驳的时代。两种世界观相互对立，共同争夺现代思想的主导权。那么，基督教观点倡导者的任务就是，在现代思想面前，借助现代知识文化的资源，证明只有基督教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所有存在的问题、人类生活及其谜团、人类心灵及其探究，证明基督教是真理，是永远年轻、永远新鲜的真理，是普世真理，因此同样适合、同样满足所有时代和所有文明程度的人。

帕斯卡在他的《笔谈》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他所勾勒的大致轮廓和未完成的东西，应该由我们这些他的继承者，根据我们时代的资源和需要来完成。我们不难看出，下面的讲座正是从帕斯

卡的《笔谈》中发展而来的。

一直以来，我的天职和爱好都是研究护教学；无论是在讲课还是在研究中，我从未忽略过这一观点。关于这些问题的学术演讲引发了面向更广泛听众的公开演讲，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兴趣，并导致了出版请求，从而使我有义务让这些演讲得以发表。晚上的时间都用来听这些讲座了，这将永远成为我感激不尽的回忆。这里介绍的几乎是演讲的原稿。唯一不同的是，由于现在不受时间限制，我在某些地方根据主题做了更多的划分，在其他地方则扩大了篇幅。在后面的注释中，我增加了插图和文学参考资料，这些资料部分是为较小范围的读者准备的，可以用来证明或解释所讲的内容，或引出进一步的探究。

讲师的职责不是仅提供自己的想法。他的讲座不应提供太多新的科学研究成果，而应说明已有成果所提供的真实性。注释将说明我对哪些作者最为感激。课程的统一性在于贯穿始终的基本思想；而这一基本思想就是我一生的思想。虽然我可能借用了别人的材料，但我在这本书中提供了一部分，也许是最好的一部分，是我自己的东西，因为上帝是真理的真正主人。

因此，我也要以这种形式将我所讲的内容献给上帝。愿他的祝福伴随着本书即将踏上的道路，愿本书在这条道路上得到基督教真理的老朋友的接受，并获得新朋友的支持。

莱比锡，1864 年 4 月 25 日。

第四版序言

我的《护教学讲演录》在德国以外的广泛领域受到了极好的欢迎——据我所知，它们已被译成五种语言——这使我有责任仔细修订这一新版本，并在必要时加以改正。本书的编排是其基本思想的必然结果，因此保持不变。但在细节方面，我做了很大的扩充和改进。特别是关于人的部分，我根据当时的讨论情况作了必要的补充；关于异教的描述也重新写过，因为我发现它不够充分。不过，我在注释部分付出了特别的努力，尤其是力求使其中对现代护教学文学的看法更加完整。

当今时代令人欣喜的是，护教学文学作品非常丰富，在这一领域，罗马天主教与新教不相上下。在新教神学家的作品中，除了托鲁克（Tholuck）为他的书（*Vermichten Schriften*）所作的出色导言（1839 年，两卷本）外，斯特尔姆（Stirm）的《基督的辩护》（*Apologie des Christenthums in Briefe für gebildete Leser*）（1856 年，第二版）尤其值得一读。1856 年第二版，值得特别注意。该书走的是一条老路，即首先确定《圣经》的真实性，然后再讨论实际问题本身，而不是采用当前更流行的方法，即立即讨论这些问题；但它很好地、清晰地展示了丰富的辩护思想和内

容，并在很大程度上提供或完善了当今辩护士们所使用的材料。齐特的小众作品《基督的真理与神圣》（*Die Wahrheit und Herrlichkeit des Christenthums*）是前者的续篇，共七讲，1863年出版。纳维耶在日内瓦和洛桑发表的关于永恒生命的七篇演讲（1863年），以及他现在发表的关于天父的演讲（1865年），都洋溢着法国人的热情。道尔顿（Dalton）题为《拿撒勒人》（*Nathanael*）的基督教讲演（1864年第二版）充满温情，但也许过于华丽。1864. 奥伯伦（Auberlen）等人在巴塞尔为基督教信仰辩护的演讲，也在1862年要求出版第二版时得到了应有的赞赏。在关于单一主题的著作中，法布里的《反对唯物主义书简》（第二版，1864年）是一部公认的优秀作品，它在唯物主义问题上给了我特别的帮助。在基督教的道德影响部分，斯特拉斯堡的施密特（Schmidt of Strasburg）的优秀作品《古代罗马世界的公民社会》（*La société civile dans l'ancien monde romain et sa transformation par le Christianisme*）（1853年）很好。这里还可以列举海尔德、杜斯特迪克等人的许多其他作品，但我只想提及我在这些讲座中特别使用或关注的作品。

除上述著作外，我还想补充一些罗马天主教神学家的作品，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博森（Bosen）的大部头著作《基督与他的信徒》（*Das Christenthum und die Einsprüche seiner Gegner*），第二版，科隆，1864年。然而，它的方法和方式与我的工作不太协调，使我没有机会利用它。法国学者奥格-尼古拉（Aug. Nicolas）

的《基督教哲学研究》共四卷，发行量最大，据我所知，自 1842 年首次面世以来，在法国已经出版了十四版，西尔弗-海斯特(Silv. Hester) 的德文译本也出版了四版。虽然它们缺乏准确的编排和敏锐的评论，但它们却以热情洋溢的激情、生动活泼的感知力和对古今文学的广泛了解而著称，这使它们经常成为辩护作家的宝库。令人惋惜的是，尼古拉后来竟将自己的才华和学识奉献给了对圣母的奢侈崇拜和与新教的不公正争论。我经常有机会在《注释》中提到《哲学研究》。《为了基督的辩解》虽然是独立研究和广泛阅读的结果，但显然与这本法国著作非常相似。该书的第一卷《Der Beweis des Christenthums》，1863 年（刚刚出了第二版），是一部优秀的著作，其珍贵之处在于全书洋溢着热情洋溢的气氛，也在于对各个事实进行了透彻的讨论。如果读者对这本书中的许多引文感到收获很多，那么从辩护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价值就更大了。即使在我的讲义第一版中，我也承认这部在我的讲义出版前不久问世的作品为我提供了重要的服务。由于主题和论述如此相似，除了个别段落外，这两部作品在许多方面不可能不吻合。在这一版本中，我努力使我对这部作品的引用更加完整，只要有必要；我借此机会再次表达我对与另一个教会的神学家友好会面的喜悦之情；在这一领域中，我们双方都要团结起来，用思想武器捍卫我们的共同财产，对抗共同的敌人。

本书注释中多次提到现代辩护学作家，这可能被认为是完全或部分不必要的，因为在这类并非以科学为目的的作品中，避免提及

这些内容是比较惯常的做法。

但是，我的目的不仅仅是要给予每个人应有的荣誉，而且还要通过引用来展示已经收集到的丰富的共同财产，以便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加以应用，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用途。这里的问题不是个人的名声，也不是妒忌地保护自己的份额。这种小家子气既不符合任务的规模，也不符合任务的目的。无论武器是谁铸造或收集的，一切都取决于如何使用它们。

我们所参与的这场冲突会持续多久，结果会如何，我们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将决定我们国家的未来。我们没有理由担心我们所倡导的真理本身，也没有理由担心真理在世上会缺少朋友。但是，国家的公共生活是否会继续受到这一真理的影响，却绝非绝对肯定。让我们至少做我们应做的事，履行我们对时代和国家的责任！我确信，对许多人来说，当前的冲突将结出硕果，使他们坚信，正是基督教将人们和国家的生活和思想从虚假中解救出来，并使之升华为真理。我也大胆地希望上帝能祝福这本小书，帮助许多寻求者获得这一信念。再次向他致敬。

莱比锡，1865 年 10 月 2 日。

第五版序言。

我怀着对上帝的感激之情，第五次寄出这本书，现在是作为基督教护教学的第一部分。因为我希望在今年能够实现我的夙愿，在《基督教基本真理讲座》的基础上增加第二辑，讨论围绕罪与恩典的“拯救真理”，即所谓的“救赎真理”。

我再次回顾、改进和补充了整部著作，尤其是注释中的不足之处。有关这一主题的文献太多，我无法对其进行完整的阐述。我仅提及在居特斯洛出版的功勋卓著、价值连城的护教学书籍《格拉乌本斯的辩护》；1865年苏黎世出版的施图茨的有力而新颖的证词《格拉乌本斯的护教学》，它作为一位科学工作者的作品更显珍贵；最重要的是1866年格-维-泽施维茨的演讲，内容丰富，才华横溢。

愿这些讲座能继续帮助探究者，指引漫游者，坚固信仰者！

莱比锡，1867年1月16日。

第六版序言

在讨论基督教救赎真理的《讲演录》第二辑接连出版了两个版本之后，第一部分立即需要一个新的版本。我将此视为上帝仍可利用我的劳动来为他的国度服务的象征。在人生的苦难中，没有人能够逃脱；他的恩典安慰了我们，允许我们用双手的工作来侍奉

他。愿他继续使用这本书，因为这对他是可喜悦的。

我在正文中只做了很少的改动，但在注释中很容易发现改进和补充之处。

谨以此书问候我的老朋友们，以及我的新朋友和不认识的朋友们。

莱比锡，1868 年 3 月 16 日。

第七版序言

自从我的上一版问世以来，德里茨施（Delitzsch）的《基督辩护体系》（System der Christl.）出版了；所有基督教真理的朋友都有义务向该书尊敬的作者致敬。虽然我很想利用这本著作来改进这些讲义，但我还是认为最好不要再做改动，而只对注释做一些补充。但愿它们能以这种形式继续促进上帝国度的利益，只要他认为是好的！

卢特哈特

莱比锡，1869 年 11 月 1 日。

卢特哈特博士的《基督教基本真理讲座》第七版——《基督教护教

学》的第一部分——出版之后，第二部分——《基督救赎真理》——的第三版和增订版于1870年出版；1872年《基督教道德真理》即该书第三部分完成了这一系列的出版。在后一部著作的第一讲注释中，作者写道：“《基督教基本真理的辩护讲座》于1864年初在莱比锡发表，同年春季付梓”。第七版于1870年问世。在我所看到的各种译本中，《基督教基本真理》迄今已有七种语言译本，其中我对耶路撒冷神学院神学教师米利安图斯博士的现代希腊文译本尤为满意，该译本是由圣墓出版社印刷的。该书所附的订户名单几乎囊括了希腊教会的所有教派。《基督教救赎真理讲座》第二辑于1867年初发表，第三版于1870年出版。本课程的大部分内容是基于我多年来在这里的大学里讲授的神学道德课程。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与本著作一致，也由同一出版社出版。

=====

=====

=====

=====

=====

关于基督教的基本真理

第一讲

历史发展中的对立世界观。

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在我即将发表的演讲中，我向自己提出的任务是，陈述基督教背后的普遍真理，并在现代思想面前证明这些真理的正确性。在这个时代，基督教的世界观遭到了非基督教观点的反对；现代世界整个舆论潮流的分离，导致对未来产生致命影响的决裂，日益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基督教真理的倡导者都有责任竭尽全力保持思想生活的联系。

在我们这个时代，基督教思想无疑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启蒙和强大程度。我们只需观察一下神学研究的认真程度，或将当今的布道与过去的布道相比较，或将基督徒在各行各业所表现出的巨大积极性，以及在国内和国外传教的自我牺牲的劳动与过去的劳动相比较，就会确信基督徒的智力确实是一种力量。但非基督徒的智力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泰尔统治着他那个时代受过教育的头脑，他能够沉浸在几十年后基督教将消亡的希望中。在今天，

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抱有这样的希望；然而，非基督徒的智力现在比那时更强大。这有两个原因。当时，教会习俗的力量仍然形成了一道屏障，阻挡着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并使基督教本身在怀疑论盛行的时代完好无损。但这道以合理言辞为形式的屏障越来越屈服于现代的洪流。同样，以前的攻击是零星的，而现代的攻击则是系统的。法国人的不忠精神更加如同狂风暴雨、跌宕起伏，但并不像德国人的不忠精神那样危险。当法国人勒南写出《耶稣的一生》时，它是巧妙的、生动的、通俗的；但它是一部浪漫主义作品，一部有趣的小说。小说作品是当今最受欢迎的文学作品；还有什么能比一部小说更有趣呢？小说的主人公是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革命家，一个模范的爱好者和狂热者，被那些爱他的人胜过爱他的工作的女人所包围，被那些迫使他扮演奇迹创造者的角色的门徒所包围，等等。但结果如何呢？再过几年，这本书就会被人遗忘，而三十年前德国人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对教会信仰的猛烈炮击，以及此后他的知识继承者们对教会信仰的猛烈炮击，在信徒队伍中造成的混乱远比这些法国小兵所能造成的混乱要大得多。自从伏尔泰时代法国人的攻击以来，对基督教的驳斥已经转变为一个流派，即德国思想的哲学流派；它已经形成了一种系统的世界观，并且有人认真地试图用它来取代基督教。这种观点褪去了哲学的外衣，与这个时代的其他倾向结合在一起，不仅成为受过教育的人的普遍观点，而且以一种更粗糙、更笨拙的形式成为劳动阶层的普遍观点。

每个人都有责任正确了解这些对立的观点，以便对它们采取清醒的立场。在任何其他案件中，我们都承认，为了在任何法律诉讼中作出判决，我们必须知道判决所依据的行为。基督教受到了审判，也作出了判决；但在那些如此热衷于对基督教进行审判的人当中，有多少人了解作为教会主要行为准则的《圣经》和教会教义著作呢？当然，在所有能够激荡一个时代的问题中，宗教问题一定是与我们关系最深、最密切的问题。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仅仅依据权威做出决定，任由他人向我们指出我们必须接受的立场，是不公正的。无动于衷也是不对的。在任何重要问题上，漠不关心都是不允许的，也是不符合人的尊严的，就像在重大的宗教对立问题上一样。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双方都保持接受，选择中间道路。因为这些对立是排他性的。在其他情况下，在中间道路上寻求真理往往是权宜之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选择一方或另一方。一方的语言是“有上帝”，另一方的语言是“没有上帝”。那么是否可以说，真理就在两者之间呢？最大的对比莫过于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宇宙观。歌德在《西行记》中说，“世界和人类历史上最特殊、最无与伦比、最深刻的主题，以及所有其他主题都从属于其的主题，就是信仰与不信之间的冲突”。“决定这些观点的是两个完全相反的原则，每个人都不得不对其中一个原则采取积极的立场。然而，他所采取的原则将塑造他的整个生命，并为他的一生增添色彩。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接受什么样的原则，因为他的理论和实践都将据此形成”。让我们努力将这一伟大的对立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以便我们能够清楚地

认识到，究竟是什么问题激起了我们周围正在进行的巨大的道德较量，而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

当基督教传入这个世界时，它是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传入的。事实上，它的首要目标就是宣扬十字架、“与神和好”的话语、上帝在基督耶稣里的恩典的福音、悔改和信心是人类得救和永生之道的教义。基督教主要是救赎的教义。但这种救赎教义包括并建立在某种世界观之上，而这种世界观是全新的。

全新的观点。

的确，它的道路已经准备好了，而且先前的知识、哲学，更多的是人类的良知和对真理的本能意识为它提供了接触点；但就其本质而言，它绝对是崭新的。

即使是其最初的基本原则，即上帝的统一性和人类的统一性，也会给思想界带来一场彻底的革命。因为这些都是全新的概念。当我们把世界看作是造物主的杰作，看作是天父自由而慈爱的行为时，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该是多么的不同啊！天父以他的智慧和爱的力量安排和维持着万物；对他来说，最遥远的东西也不会太遥远，最微小的东西也不会太微小；他不仅在人类中拥有个别的选民，也同样在他的心中珍视整个种族；他不仅关心他们外在生活中最微小的利益，也首先寻求他们灵魂的救赎，最渴望的是他们

内心的爱！这些都是全新的观念，是旧世界一无所知的观念。此外，上帝用同一血脉造就了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所有人都是弟兄，应该用共同的爱联系在一起；陌生人不是陌生人，而是邻居；我们不应该只顾自己的事情，而应该关心他人的事情；我们的生活应该是为他人服务和牺牲的生活；自私是人类本性中最根本的罪恶；自我牺牲、爱是最根本的美德；——这些观念是谁的想象力？

最后，只有一种思想主宰着民族和国家以及个人的命运；整个人类只有一部历史，从一个起点开始，走向一个终点，而这个终点就是上帝的国度；地上将有一个上帝的国度，所有人都将聚集其中，所有人都将融入其中；这个上帝的国度已经在他（耶稣基督）的身上建立起来，他是历史的中心点，是旧时代的终结，是新时代的开端；他不仅是它的预言者，也是它的奠基人，他是新时代的开端。

他不仅是历史的先驱，而且是历史的开创者，是上帝自身的显现，是上帝的生命、光明和爱在历史中对人类的显现——耶稣基督，前世的历史在他身上交汇，后世的历史从他身上出发，他也是吸引个人灵魂的中心点；在他身上，每个人和整个人类都能够实现自己的命运，每个人从而能够成为上帝伟大王国的一员，这个王国建立在正义和恩典之上，建立在最深厚、最坚实的道德基础之上；——这一切给历史、给上帝与国家的交往、给上帝与个人灵魂的交往投下了多么灿烂的光芒啊！这一切又是如何把最伟大的和最

卑微的、整体的和个体的汇聚成一个奇妙的统一体！最伟大的哲学家，最全面的思想家，最高超的头脑，都还没有对这些真理形成过哪怕是一种猜想，更不用说去思考、认识和表达它们，而且还成功地使它们成为普遍的观点，成为大众的事情，成为支配心灵和生命的力量。诚然，基督教给世界带来了新的世界观。

在我们这里，这些都是现在流行的观念：当时新奇、令人惊讶、闻所未闻的事物，现在已成为基督教观点的基本主张。然而，这些思想丝毫没有失去它们的伟大之处；它们现在仍然和过去一样，一样真实，一样崇高，一样给人以启迪，一样令人振奋。（只是我们许多人失去了对它们的伟大、崇高和美丽的深刻印象；我们已经对它们习以为常，因此它们对我们来说也变得太熟视无睹了。这就是所有伟大真理在我们许多这些罪人中间的命运。）

这种新的世界观自然不会立即占上风。它必须克服顽固的阻力，才能取得胜利。诚然，这种阻力并非来自任何一种观点体系。古代思想世界已经解体。分解的过程始于公元前六世纪哲学的兴起。因为哲学将自己置于传统的宗教观念之上，用自己的思想世界取代了曾经支配当时（公元前六世纪以前）社会的思想力量。事实上，古代哲学试图取代宗教本身的地位。它不仅仅是推测性的理论，而且在性质和倾向上都是实用的。伟大的政治家都曾在这个学校学习过哲学，为他们的实际工作做准备。它既研究道德和政治问题，也研究科学（认识论）问题。但是它有点贵族化，而且

局限于一个小圈子，无法取代宗教的地位，而且很快就会形成最相反的倾向。因此，它（哲学）的主要结果是建立了对一切真理的怀疑，推翻了一切信念和确定性。

然而，人类却永远无法摆脱对于确定性的渴望。

因此，哲学伴随着各种秘密学说；这些学说越神秘，就越令人向往。古老的宗教及其神话得到了寓言式的解释，并被转化为道德和智慧的象征。在之前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一整套观点和观念。但这只是一个废墟世界。领军人物收集了这些昔日的碎片，并试图将它们组成一个新的结构。为了恢复异教徒的观点，人们付出了巨大的智力努力。

亚历山大的新柏拉图主义是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中，想象力和深刻性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座看似思想丰满的大厦。这的确是一个奇妙的复合体。所有宗教和所有民族都不得不为它做出贡献。但它仍然只是一个精彩的实验。它的倡导者都是看似杰出而高尚的人。与异教徒的观点交织得最紧密的普遍教育为它提供了支持，然而实验失败了；基督教的观点战胜了异教徒，从此统治了文明世界。

被基督教征服的犹太教和异教的思想力量，为了报复，以异端的形式在教会内部和基督教的土壤上施加影响。他们试图从犹太教

或异教徒的角度曲解基督的教义。犹太化的精神限制了这一教义的意义，把基督的人格尊严降低到仅仅是一个先知的地位；异教徒的精神则把基督的历史真实性蒸发成仅仅是一个概念；要么否认他应有的神性，要么诋毁他真正的人性，既没有公正地对待两种本性的统一性，也没有公正地对待它们之间的区别。在这一切中，受到攻击的不是单一的教条，而是基督教本身的精髓，因为这涉及到耶稣基督的位格（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无论是犹太精神还是异教徒精神，都不断地从基督教之外渗透到基督教世界内部，并以基督教的形式继续着古老的冲突。但是，即使是教会内部这种与基督教观点的全部真理的对立也被克服了，后者的排他性至高无上的地位得以确立。

中世纪就是这种排他性至高无上地位的时期。基督世界的外部世界被聚集到基督的教皇和德意志皇帝——整个地球的两个最高权力者——身上，就像太阳和月亮照亮了世间的一切，同样，思想世界也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统一体。异教徒的思想确实在实践中发挥了自己的影响，但它不得不屈服于教会的权威，屈服于教会对所有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方式。中世纪是单一宇宙观盛行的时代。正是这种观点形成了中世纪的魅力和伟大。在这一时期的伟大诗篇和艺术作品中，我们看到了这种单一的观点。这种情况在后来的任何时代都没有再出现过。理性是信仰的婢女，哲学是神学的婢女。在中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的伟大神学著作《神学大观》中，异教徒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作为基督教真理的见证人出

现了；同样，在伟大的大教堂——那个时代最具特色的代表——中，一切事物，都为这座伟大而又简单的建筑做出了贡献。这一切都是为了教会的荣耀，教会是地球上的最高权力，它将整个人类社会紧密团结在一起。

这就是中世纪，基督教对世界及其舆论具有至高无上影响力的时代。然而，异教徒的精神只是被压制了，并没有被消灭；它很快又出现了，而且更加公开，更加强烈。

中世纪末期，意大利人热衷于在古典研究中复兴古代世界，这也使异教精神复活，将其藏匿在罗马本身和罗马主教的宝座上，并以新的异教威胁着世界，除非宗教改革能避免这一危险。这是德国宗教改革对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尽管它是最不为人所知和最不被承认的贡献之一。

我们在思考意大利的学术复兴时，很容易被它所带来的启蒙运动的辉煌所迷惑。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毫无疑问，在麦地那时代，意大利的艺术和科学得到了空前的繁荣，这种繁荣是前无古人的，也是后无来者的。但是，真正的道德基础还很欠缺。古典研究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放荡生活和动机。米兰朵拉的皮库斯伯爵确实是一个杰出的例外。他的名言“哲学寻求真理，神学发现真理，宗教拥有真理”几乎就是他一生的写照。但他只是个例。古典学派最杰出的倡导者们互相指责对方犯

下了不可告人的罪行。波吉乌斯（Poggius）写的笑话（facetia）在庸俗和不道德方面几乎无与伦比，但却在三十年内出了二十版。异教精神以高雅和科学兴趣的形式统治着麦地那宫廷。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院把柏拉图哲学放在了基督教的位置上；萨伏那洛拉以极大的热情反对异教徒的不道德和异教徒的信仰，而这些都是由那些所谓最高级的牧师们所维护的。他描述说，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你认为我们的基督教信仰如何？你认为它是什么？”另一个人回答说：“在我看来，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信仰不过是一场梦，一件虚幻之事而已；是多愁善感的女人和僧侣的事”。甚至马基雅维利（Macchiavelli）也公开说：“的确，我们意大利人是最不虔诚和邪恶的。”他补充说：“因为，教会的倡导者们树立了最坏的榜样”。随着古代的完结之后，它的不信和罪孽又死灰复燃。教士们所表现出的罪恶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甚至受到了像吉恰尔迪尼（Guicciardini）这样的教皇官员的严厉谴责。在罗马的宫廷里，人们对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对神学和基督教却知之甚少：关于基督的事情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益处，大家都不甚了了；还有一句话说，人最好还是不要相信灵魂不朽。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人们认为有必要在 1513 年的拉特兰大公会议上重新灌输灵魂不朽的教义。

与意大利高雅的异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德国宗教改革在路德身上表现出了良知和信仰的道德真诚，在梅兰克顿身上表现出了古典修养与基督教的结合，这对整个教会来说都是一件幸事。这甚

至在意大利也产生了影响，为反对天主教会的势力注入了道德和宗教上的真诚。宗教改革击退了这种消极的精神（不忠于信仰的精神），迫使它对宗教信仰作出让步。

三个多世纪后，它（不忠于信仰的消极精神）才重新回到当时的位置——事实上，它也因其间的发展成果而变得更加丰富。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一下消极精神从它所处的更为宗教化的地位，向现代异教所承认的消极主义的转变。

首先出现的现象，也是这场运动的开端，是索西尼主义。

宗教改革时期出现了一系列不安分的灵魂，他们反对正统的三位一体观点。意大利人福斯图斯-索基努斯（Faustus Socinus）是这一反三位一体运动最清晰、最全面和最有影响力的表达者。1574年，他放弃了在麦地那宫廷中体面舒适的职位，前往德国和波兰，在那里成为所谓的一元论者（否认神圣三位一体者）的中心点，他们在波兰和特兰西瓦尼亚成立了一个索西尼协会，并将其影响力扩展到西欧。

索西尼主义既不否认启示，也不否认超自然现象；它坚持圣经的权威，但将自己的主观观念作为所有宗教真理的标准。在它看来，基督教的精髓在于不朽的教义，基督正是为了不朽的教义而生，

也正是为了不朽的教义而死。但它否认基督的神性，认为圣经中没有这一教义。索西尼派的沃尔佐根说，“人是驴，比神是人更可信”。然而，它承认基督不是普通人；他是圣母的儿子，完全圣洁、公正、像神一样，因此被尊为世界的统治者，获得神圣的荣耀。它认为他的先知职务和国王职务是必不可少的，但删除了他的祭司职务，认为他的死是为了证实他的教义，而不是为了替罪人赎罪。

索西尼主义是超自然因素与理性主义观点的结合。

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英国神灵论在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它试图建立所谓的自然宗教来取代积极的基督教。切尔伯里的赫伯特勋爵（1640年）是一系列神灵论作家中的第一人，随后又有托兰、廷德尔、伍尔斯顿、博林布鲁克等许多人相继提出神灵论。发起这场运动的不是一种轻浮的精神，而是一种认真的道德精神，其目的是将基督教归结为一般的道德和宗教原则。赫伯特勋爵认为，“上帝的存在、崇拜上帝的责任、美德和虔诚是对上帝的真正侍奉、悔改和弃绝罪恶的责任以及对神圣报应的信仰（部分在今生，部分在来世）：这五项原则是纯粹宗教的主要支柱。凡是超过这些原则的，都是邪恶的。”

当赫伯特勋爵完成了他的《论真理与启示》一书之后，他对这本书的出版是否有助于上帝的荣耀充满了怀疑，于是他跪在地上恳

求上帝的指引。他说：“请给我一个来自天上的征兆，如果没有，我将停止我的著作！”他说，“我刚刚说出这些话，天上就传来了不同于人间的清晰而又温柔的声音，这给了我极大的支持和安宁，我认为我的祈祷被听到了”。——真是不可思议！上帝被说成是给了一个直接的神迹来证明一项否认所有直接启示的工作！因此，我们不能相信上帝在基督里显现了自己，因为我们要相信上帝向彻伯里的赫伯特勋爵显现了自己！

但很快又有了新的进展，《圣经》中所有关于启示的内容都被归结为圣职者的自我追求的发明，《圣经》中人物的道德品质也受到了攻击。这些攻击所引起的巨大反响，从它们所引起的大量回复中可见一斑。仅就廷德尔的著作《基督教与创世一样古老》而言，就出现了一百多份答复。但英国的其他宗教运动，尤其是卫理公会的兴起，很快就把这场运动抛到了九霄云外。

因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对启示的否定；但上帝、美德和不朽依然存在。

自然主义倾向在法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式。在那里，自然主义是轻浮的、不道德的，而且否认上帝的存在。在伊壁鸠鲁主义的土壤上，人们形成了怀疑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被一些有影响力的作家所鼓吹，为法国大革命做了准备。卢梭确实有宗教情怀，主张信仰上帝，并一再承认基督教、《圣经》和耶稣基督的崇高

性；但他对自然状态的理想摧毁了对现实存在的一切感知；只有在这种状态中，他才能看到对人类社会所有弊端的补救措施；然而，这种状态从未实现过，也不可能实现。伏尔泰的机智统治了他的时代，腓特烈大帝曾对他写道：“只有一个上帝，也只有一个伏尔泰”；他（伏尔泰）讽刺和辱骂基督教和教会，憎恨基督；他经常重复的一句话是：“écrasez l’infame”，他大胆预言基督将在几十年内从统治人们思想的宝座上跌落。狄德罗（Diderot）和达朗贝尔（D’Alembert）的《法国百科全书》的影响非常广泛，它建立在一种普遍的感官主义理论之上，并主张采取相应的处置方式。德国的霍尔巴赫男爵（Baron Holbach）周围聚集了一批美食家，他们创作了著名的《自然论》（1770年）等唯物主义著作，肯定了物质的排他性：人不过是物质；思想和意志是大脑的情感；对上帝的信仰以及承认灵魂的存在，都是建立在自然的二元化、物质和精神的虚假区分之上的；人的自由和人的不朽同样不可断言；自爱和利益是行动的唯一原则，人类社会是建立在互利体系之上的。

消极（不忠于信仰的精神）倾向已经退无可退。它从否定基督的神性开始，最终达到了对精神的全面否定！在后来的表现形式中，其动力不是理性，而是倾向。倾向是观点的基础。

在德国，这一运动的成熟更加缓慢，但也更加彻底，因此也更加危险。

与法国相比，德国人更有道德上的真诚，因此积极的精神提供了更有力的抵抗。汉堡人赫尔曼-赖马鲁斯（Hermann Reimarus）在莱辛（Lessing）出版的所谓《沃尔芬布特尔片段》（Wolfenbuttel Fragments）中，将英国神权主义的敏锐和尖刻移植到了德国的土地上。他的论战不仅针对圣经和圣经人物的道德，甚至针对耶稣本人。耶稣的计划只是一个政治计划；他在十字架上的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只是表达了他对计划失败的绝望哀叹；但他的门徒们，甚至在第十二个小时、把他的政治计划变成了宗教计划，把耶稣变成了宗教弥赛亚。然而，这对当时的时代来说是过于强烈的肉麻了，这些攻击引起了普遍的抗议。法国的异端邪说确实已经在腓特烈二世的宫廷里生根发芽，并向上流社会传播。但它仅限于这些阶层，在广大人民中还保留着太多过去的可敬的坚定性，不允许它渗透到他们中间。这个时代的精神与其说是对基督教的直接否定，不如说是与启蒙运动相一致的。沃尔夫学派起初试图用沉重的数学论证来支持基督教信仰，但后来却被流行的哲学推理所取代。只有清晰的东西才被认为是真实的，而且只有表面上清晰的东西才是真实的，而不是必须从深层挖掘出来的东西。就是这个时代的统治原则。门德尔松证明了上帝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在这些教义的基础上，人们为自己建立了宗教信仰的大厦。神学与时代精神结盟，宣告启示与理性的一致。

康德，哥尼斯堡的哲学家，确实推翻了这一教条主义的大厦，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证明，所有的思想都是主观的，因此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真理。

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试图指出，一切思维都是主观的，因此我们对上帝和超验的东西一无所知，没有客观的确定性，因而不能从哲学上证明上帝的存在，等等。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指出，良心及其诉求只有道德上的确定性。上帝、不朽、报应都是良知的诉求，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道德世界。遵守道德律是每个人的绝对义务。“必须以这一绝对命令掌握着权杖。这就是人的道德”。正如席勒回答他的那样，“真正的道德”是“奴隶的道德，而不是家庭中自由出生的孩子的道德”。宗教的价值只在于它能为这种法律道德服务。宗教不过是道德的一个载体，基督教当然是最好的；而教会所描述的基督则是道德的理想。历史上的耶稣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这一理想，我们无法确定。他几乎不可能与这一理想完全一致。但我们不必拘泥于历史上的耶稣，而应追求理想中的基督，即道德完美的理想；我们应努力在自己的生活中实现这一理想。

理性主义将基督教简化为健全的人类理性的标准，它就是从这些因素中发展出来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统治着教授席位和讲坛，在一般的宗教舆论中仍然保持着强势地位。在某些方面，它在道德上是令人钦佩的，但在最大程度上却是偏执的，而且，如

果允许我们这样表达的话，它还有点菲利斯特式

(Philisterhaftes)。它教导人们说，上帝是存在的，但上帝让世界自生自灭，只确保世界按照他强加给它的法则运行。既没有，也不可能有奇迹、预言或直接启示：上帝不能直接干预。基督教并不是所谓的启示；耶稣基督也不是神迹，他只是有史以来最聪明、最有德行的人，并通过他的教导（他用鲜血印证了这一点）成为人类的恩人。

如果说索西尼主义在耶稣身上保留了一些超自然的东西，那么理性主义则完全将其剔除，将一切归结为道德。然而，它却留下了有位格的神（能听能看）、道德自由和灵魂不朽。

然而，泛神论却废除了宗教和道德的这三项基本真理。泛神论是理性主义的必然继承者。我们不可能对一个只对世界产生外部影响的上帝保持沉默。

如果上帝只是从外部影响世界，那他还算什么上帝呢？只是让所有的人都在转圈？上帝，造物的隐秘之泉，应该运动；他在万物中，万物也在他的爱中；他们在他里面生活、活动、存在、“永远不会错过他的力量、他的帮助和他的关怀”。

上帝是宇宙生命本身，或者说是万物的普遍理性。他在本质上与世界并不分离。

上帝和世界只是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表达方式，是同一世界的两个侧面，是同一对象的内在和外在。因此，一切宗教都被取消了；因为与这样的上帝不可能有任何个人关系，因为他本身是非个人的，与我们没有个人关系。个人可能会有某种宗教倾向，可能会上升到一般的程度；但对这样的神没有信仰、没有爱、没有希望、没有祈祷。因此，道德实际上也被取消了。因为根本不存在自由意志。万事万物的发生纯属必然。没有人能摆脱它的力量。这样的个人不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他认为他人是被推动的，他自己也是被推动的。越是敏锐的人，就越能意识到一切行为都是由环境造成的。因此，既不存在道德责任、报应，也不存在死后的生命，而是个人被普遍的生命所吸收。

斯宾诺莎（1677年，荷兰的一名葡萄牙犹太人）联系实际地表达了这些概念，这些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中得到了重新讨论。它们在黑格尔的手中得到了一些修改，但从根本上说，它们依然如故。戴维-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在宗教和神学中继承了它们的成果。在他所谓的《信仰学说》中，对超自然现象的否定始终贯穿始终，其结论如下：“另一个世界，无论其形式如何，确实是唯一的敌人，而其未来生命的形式则是最后的敌人；推测性批判主义者必须攻击它，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战胜它。如果可能的话，对之加以克服。”此后，他的言辞更加尖刻。

他说唯物主义取代了理性主义。费尔巴哈标志着这一转变：“上帝是我的第一个观念，理性是我的第二个观念，人是我第三个观念，也是最后一个观念”。然而，他指的是经验的、感性的现实中的人。他的哲学变成了对这个感性的人的认识，变成了人类学。“所有宗教都是自欺欺人，是人类思想的错误。上帝的观念只是人的观念，人将其客观化，并浓缩为一个独立存在的概念，在这个概念上，他夸大地积累了自己的品质；因此，当他想到上帝时，他想到了自己。人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此外，人的感官就是一切；感官就是一切现实，一切真理。唯物主义建立在这些哲学格言的基础上，并相信自己可以通过事实来证明这些格言。没有精神，没有灵魂；物质的中介就是一切”。这就是唯物主义的智慧。

在此达到的发展是完整的，不可能再进一步。我们已经陷入了唯物主义的泥潭。

那么，流行的观点就是所有这些不同元素的复合体，这些元素接二连三地出现，接二连三地占据了当代人的思想，又接二连三地离开，留下了它们存在的痕迹。先是一个因素，然后是另一个因素会更加突出。然而，尽管当前的舆论形式多样，它却有一个总的趋势，一个总的原则。那么，这个原则是什么呢？吉佐（Guizot）将其描述为对超自然的否定。当然，超自然的问题是当今的问题。勒南曾说过，我们不能干涉超自然现象，我们必须彻底摆脱它。

因此，事物的自然秩序是最终的。我们可以说，当前观点的总体特征是把世界、宇宙变成了一个原则。然而，世界有两面——物质和精神。因此，有时更强调精神，有时更强调物质；有时更理想主义，有时更现实主义；有时更崇高，有时更平凡。但宇宙仍然是原则。正是这个原则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变得突出。神本主义允许神的存在，但却使神陷入静止状态；泛神论把神与世界混为一谈；唯物主义完全否认神；而另一方面，世界、世界的精神、世界的生命、世界的物质却相继被推崇。

它与基督教观点的对立就在于此。上帝是万物的原则，是世界、人、人的精神和物质的原则。基督教的世界观显然是有神论的。那么问题来了，到底是上帝还是世界是万物的原则和中心？

上帝是万物的原则和中心，因而也是我们推理的原则和中心。正是这一点构成了这一对比的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决定着我們思想的整个倾向。然而，不同观点的先决条件和决定性动机，与其说是不同的哲学、不同的观念，不如说是不同的情感状态。是内心的倾向和喜好最终决定了思想的观点。因为一个人是在世界中找到自己满意的部分，还是在个人和永生的上帝中找到自己满意的部分，必然会产生相反的人生轨迹。

第二讲

存在的矛盾

这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宇宙观。每一种观点都试图解决存在的大问题，并对问题中的问题给出答案。问题是世界，是我们周围的存在，是我们共同的存在。我们看到了精神领域和自然领域。

人本身。

精神世界和自然世界从何而来？它遵循什么法则？这个世界存在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这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无法回避。

如果回答说：“我们周围的世界是由一系列等级组成的，以人类为终点”，那么人类就成了“世界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人本身难道不是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吗？人难道不是最矛盾的存在吗？他与世界的关系是矛盾的，他与自己的关系也是矛盾的；他是一个天生的矛盾体。不仅是他的自然存在，他的道德存在更是充满了矛盾。这个问题不会让我们罢休。我们不能停止寻找它的

答案。古往今来，人们一直在寻求答案。所有的哲学、所有的宗教都在试图寻找答案。我们的兴趣不仅是智力上的，也是伦理上的，不仅是思想上的，也是良知上的。在这个问题上获得光明是心灵最深切的需要。

世界是一个问题

让我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以找到答案。我们身处世界之中。世界的存在压迫着心灵。世界从何而来？任何有思想的人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泛神论给出了答案：它来自自身；物质是永恒的，它自己形成了世界；存在是存在的基础。但这个存在从何而来？泛神论的回答是 来自自身。换句话说，泛神论无法给出答案。难道因为泛神论不得不放弃回答，我们就要放弃探究吗？

但是，不仅世界的起源是个问题，它的实际存在和历史进程也充满了谜团。它是受必然规律支配，还是受自由支配？它是根据法律、道德法则还是任意支配？表面上看，究竟是前者，还是后者？谁能给出答案？

最后，这一切都是为什么？这种对“怎么样”和“为什么”的追问是压在人类心头的主要问题，也是人类最无法摆脱的问题。

这是最值得人类关注的问题，但也是人类最无力回答的问题。为

什么有东西存在？为什么不是什么都没有？存在有目的、有结局、有命运吗？泛神论只谈原因和起源，却不谈结局和目的。但这个“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不会被压制。它是智力兴趣的问题，是研究的最高目标，是思想的特殊表现形式。当人类停止探究存在的原因和目的时，他就必须停止思考。

那么，宇宙的起源、存在和目的就是摆在人类面前的问题。人类是否可以这样回答：人本身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但人真的是答案吗？施特劳斯的确认为，人的思想作为大自然无意识的思想，创造了世界，“安排了星体的关系，形成了地球和金属，安排了植物和动物的有机结构”。但每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说这是愚蠢的。

同样，如果人是“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他本身不就是“问题中的问题”吗？

甚至人与世界的关系也是一个内在的矛盾。《诗篇》第八篇这样写道：“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诗篇表达的情感是无能与伟大、崇高与卑微之间的对比。在宇宙面前，人只是一个原子，一个消失的点，一个密码。然而，在世

界面前，他却有着最强烈的独立感和崇高感。他每时每刻都在担心被宇宙吞噬，在这巨大的力量和质量海洋中沉没；然而，他却骄傲地在自己的意识中将自己凌驾于宇宙之上。人是多么无能啊！帕斯卡说：“不需要整个宇宙武装起来消灭他；一口气、一滴水就足以杀死他。但是，即使宇宙消灭了他，人仍然是更伟大的；因为他知道他死了，但宇宙不知道它消灭了他。是思想构成了人的伟大”。但这种思想是否也是对世界的一种力量呢？人有一种自由的感觉，但他却处处看到自己受到微不足道的、最物质的力量的约束，被迫依赖它和受它限制。他受制于必然性，却又被赋予了自由感。如何调和这一矛盾呢？人与世界的关系确实是一个内在的矛盾。但人本身也是一个矛盾体。知识、情感、意志以及一切存在的矛盾在他身上交织在一起。

人的内心渴望知识，渴望真理，追求确定性。歌德在《浮士德》中所说的并非轻率的夸张。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这种对知识永不满足的渴望，——

“认识到
她的生命力，她的胚胎种子；
并将空洞的语言交易抛诸脑后。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补充一句：
我们其实一无所知；
这在我心中如火燃烧。

我们总是在问题中摸索”

歌德说：“人是黑暗的存在；他对世界知之甚少，对自身更是一无所知”。“我们每个人都渴望知识，这种渴望远远超出了尘世和肉体生存所必需的范围。我们渴望知识，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对我们有用的实际结果。如果把知识的本能局限于这些，就会贬低我们的本性。早在物理学或化学出现之前，古往今来的智者们就一直在探究万物的起源和宇宙的终极目的”。但他们找到答案了吗？人类的这一思想史不是仍在日复一日地重复吗？那怎么办？难道这就是人类的命运：永远不得不探求真理，却永远找不到真理；永远在学习，却永远无法了解真理？

难道他只能满足于梅菲斯特试图安慰浮士德的可怜的安慰吗？

“哦，请相信我，我依然像岁月一样辗转反侧、
年复一年咀嚼着这苦涩的食物；
没有一个凡人，从摇篮到灵柩、
消化这古老的酵母。
然而，人类无法停止咀嚼它，即使他必须为它咬碎所有的牙齿。”

但这还不是全部。

人类渴望幸福。他渴望得到至高无上的幸福，这种幸福能够完全

满足他，满足他最深切的需求。他在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的美好事物中寻找，但却没有找到。他努力追求幸福，却始终觉得自己是不幸的。只有人才追求幸福，只有人才不幸福。我们追求比我们自身更高的东西，但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所以我们不快乐。我们给有限的事物披上无限的外衣，但外衣却在我们眼前消融。我们谈论永恒的爱，谈论无限的悲伤，谈论不朽的名声，但这些不过是空谈罢了。我们无法在有限中找到无限。我们身处有限的世界，却在追寻无限。我们超越世俗和尘世，将我们的渴望带入无限的空间。我们追求上帝，以上帝为我们的至善，

——因为我们是为上帝而生；人对上帝的这种趋向是不可言喻的。然而，上帝在哪里呢？他迷失在朦胧之中。然而，另一种倾向又与前一种倾向相反，那就是使我们远离上帝。我们内心都暗暗与上帝作对，但我们是为上帝而生的！如果人是为上帝而生，那么为什么不为上帝而快乐呢？“Si l’homme est fait pour Dieu, pourquoi est si contraire à Dieu ? ”人啊，你在自己身上寻找解脱苦难的方法是徒劳的。你的最高智慧除了知道你在自己身上既找不到真理，也找不到真正的善之外，什么也不能达到。哲学家们向你承诺过真理，但却无法兑现诺言。然而，我们无法停止对它的渴望。我整颗心都在燃烧，想要知道真正的善在哪里。“为了得到它，什么代价都是值得的”。我们渴望真理，却发现内心只有不确定。我们追求幸福，却发现只有痛苦和死亡。我们无法停止对真理和幸福的渴望，却又无法获得其中的任何一种。

“欲望留给我们的唯一目的就是惩罚我们，告诉我们从哪里堕落”。然而，人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能感受到自己的苦难。“人的伟大在于他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幸；他之所以不幸，是因为他确实是不幸的；但他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幸。除了被废黜的国王，没有人会因为自己不是国王而不高兴”。因此，我们的内心存在着欲望与成就之间的矛盾。是欲望让我们不快乐；然而，正是这种欲望是我们伟大的标志，但却是失落了的伟大。这个谜底在哪里？

不仅是我们的知识和情感，我们的意志也与自身相悖。因为人有对真理的渴望，也有对真善美的追求，有对道德的向往，有对道德自由的渴望。然而，人喜欢不道德。他的意志向着崇高的方向升腾，它超越了普遍的道德标准，却又不断地被自己的力量所压制。歌德曾夸耀席勒，说他把束缚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倾向抛在了脑后。当然，席勒充满了崇高和高尚的愿望。但是，难道只有他一个人摆脱了凡人的共同命运，摆脱了对我们道德本性弱点的哀叹吗？在道德和圣洁的道路上取得了最大进步的人，难道不是最常为自己与目标之间的距离而叹息吗？这是所有人都必须共同发出的感叹。我们都必须体验激情的力量，体验它是如何不仅欺骗和说服人的理解与认知，而且欺骗和说服人的意志。意志是人类最深层、最高级的能力，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足以点燃整个世界；然而，它又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在诱惑面前，它往往是多么软弱无力！它与心灵的对抗是多么无力！罪性的倾向、习惯、

欲望和弱点是多么的束缚！人所能说出的最崇高的话语就是：我愿意。但他很少真正立志！他很想立志，但却没有达到真正的意愿。人因拥有意志而成为有着神的形象的存在，但他又是万物的奴隶，是自己本性的奴隶。“骄傲的人，你要知道，你对自己来说是多么矛盾！”

正是感受到了这些矛盾，以及调和这些矛盾的不可能，诗人和思想家们才会在任何时候对人类生活的弊端、人类心灵的悲哀、等等发出如此多的痛苦哀叹。因为，人类时而骄傲地自我感觉良好，时而胆大妄为，向着星空进发，要在天堂掀起一场风暴；时而又躺在尘埃中，而且常常是在污秽中……！

古往今来的诗人都曾发出过这样的哀叹；这种哀叹也不仅仅是无病呻吟式的诗人病态文化的结果——它呼唤着它无法满足的欲望和愿望。恰恰相反，正是大众的语言本身，是大众自然精神的直接表达，弥漫着这种忧郁的抱怨。正是这种特质使它们如此动人。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那些天生忧郁的民族中，也出现在那些对生活有着最开朗的看法、对生活的乐趣和财富有着最大的承受力的民族中，尤其是希腊人。

在所有会呼吸的存在中，人是最悲哀的。

就连老荷马也抱怨说，“世间没有什么比人更可悲的了”。

我们最好从未出生，或者至少在出生后尽快死去，这句话以各种形式被反复提及。诗人们竞相描写人生各个阶段的弊病，从年轻时的嬉笑怒骂一直到悲惨的老年，“人生就像是一切弊病的聚集地；没有一个聪明人愿意重过这样的生活”。即使是普林尼，在描述人类的苦难时也变得简短有力。在普林尼看来，人类比其他所有生物都要不幸。因为大自然为其他生物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但就人类而言，我们无法确定大自然是他更好的母亲，还是更邪恶的继母。人以最无助的姿态来到这个世界，他以眼泪迎接自己出生的日子，他生来就承受着一切可能的痛苦。没有什么比人更可怜，同时也没有什么比人更傲慢。在如此之多、如此之大的弊病中，最好的事情就是他能结束自己的存在”。

那么，自杀是最高的智慧吗？死亡是所有谜题的解答吗？这怎么能满足我们的理性、而我们的道德意识却谴责它？而死亡本身就是所有谜团中最重大的谜团，它又如何能解决所有谜团呢？死亡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谜团，而这些更多的谜团其实是最大的谜团。因为死亡是最确定的，所以它也是最不确定的事件。借用帕斯卡的话来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很快就会死去；但我最不知道的就是死亡；尽管如此，我却不知道如何逃脱死亡”。

然而，它同时也是我们面临的最庄严的事件。因为它是永恒的开始，无论是毁灭还是未来的生命。在“我必须死”的确定性中蕴

含着一种令人震撼的庄严；我们死后还能活着吗？我们必须知道这一点。如果我们活着，那将是怎样的生活？我们必须知道，因为这关系到我们的永生。这个问题如此重要，与我们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一个人如果对它漠不关心，就一定会失去所有的感情。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将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如果我们对永生抱有希望或没有希望。因此，除非我们从这一观点出发，否则就不可能深思熟虑地决定我们的人生道路。

总之，所有的存在都是一个问題。

总之，所有的存在都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因为它是我们生命的问题。答案一定就在某个地方，而我们一定有能力找到它。我们要想获得和平与安全，就必须确定这个答案。世界不可能是答案。将宇宙作为原则的宇宙观不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宇宙本身就是一个谜。人是斯芬克斯之谜的答案吗？但如果人自己成了斯芬克斯，那么谁来解开这个谜呢？基督教的宇宙观认为，当它把我们引向上帝，引向上帝永恒之爱的旨意时，它就拥有了谜底。我们能在这里找到我们所正在寻求的真理吗？

如果我们想找到它，我们就必须寻找它；要正确地寻找它，我们就必须愿意找到它。

如果对所有其它可能的探究和现象都感兴趣，却对这最伟大的探

究却不感兴趣，那么，这样的轻率态度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可能安稳的。因为我们为真理而生，“真理是精神的养料”。正是这一点构成了我们的伟大。“即使她的大门依然对我紧闭，我也宁愿在那紧闭的门前坐下来，在内心的忧伤中；至少这种忧伤可以证明我觉得自己是为真理而生”，而不是漠不关心地停止对她的探究。但是，仅仅对知识的表面略有涉猎，而不深入其深处，并不能称之为对知识的兴趣。培根在谈到哲学时说，“哲学的少许思索，会使人的思想倾向于无神论；而哲学的深度则会使人的思想倾向于宗教”，这句话也适用于对所有真理的认识。因为真理居于深处，上帝居于深处。他就在事物的背后。探索的途径有很多，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他就是真理。但我们必须追寻真理。为什么我们不能这样做呢？就因为路上有迷障？我们何时才能摆脱它们？我们不是生活在神秘之中吗？生命本身，生命的概念，除了黑暗的神秘之外，还有什么呢？如果现实充满了晦涩，那么我们的知识又怎么会没有晦涩呢？我们有哪一个真理体系不是晦涩难懂的？歌德说：“我们的研究越深入，我们就越接近不可探索的东西”。难道不是研究越深入，谜团越多吗？我们应该在研究课题和问题时稍作停顿，让它们对我们产生影响，而不是匆匆忙忙地从一件事转向另一件事，对任何一件事都不作深入研究。我们必须愿意找出事情的真相，而不能让自己的想法干扰我们。毕达哥拉斯认为，对真理的认识始于沉默，即安静而真诚地顺从真理，而不是争论或怀疑。的确，有一种怀疑会导致探究，它可能会使上帝对真诚者的许诺恰如其分；但也有一种爱怀

疑的人，它不断学习，却永远无法认识真理。这不是理解力的问题，而是意志力的问题。没有人会怀疑数学命题。为什么？因为没有人有兴趣怀疑它们。但是，上帝的存在——有人可能有兴趣怀疑这一点。我们的思想与我们的愿望和倾向，简而言之，与我们的整个道德状况的联系，远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紧密得多。帕斯卡说：“心灵具有理解力一无所知的理由”；著名哲学家费希特说：“我们的思想体系往往不过是我们心灵的历史；信念源于喜好倾向，而非理性，心灵的改善会带来真正的智慧”（《哲学史》）。

不是我们的生活符合我们的观念，而是我们的观念符合我们的生活。我们与真理的关系不仅是智力上的，更是道德上的。我们对真理所持的道德立场决定了我们的观点。道德的堕落往往伴随着智力的衰退！理解力是卑劣的，可能会受到各种动机的诱导而顺从内心的愿望。真理是一件伟大而庄严的事情。要承受它的目光并不容易。当它第一次穿透心灵时，它是责备和谴责；它随后的后果是照亮和提升。我们必须忍受它的最初作用，才能体验到其后的益处。

总之，对真理的感知是一种道德行为，是意志的行为，而不主要是理解的行为。因此，我们需要的是愿意了解真理的意愿。

既然基督教宣称自己是真理，那么每个人都必须对它表明立场。这是无法回避的。我们可以反对它，我们可以憎恨它，但我们不

能无视它，因为它挡在每个人的面前，迫使人们回答它提出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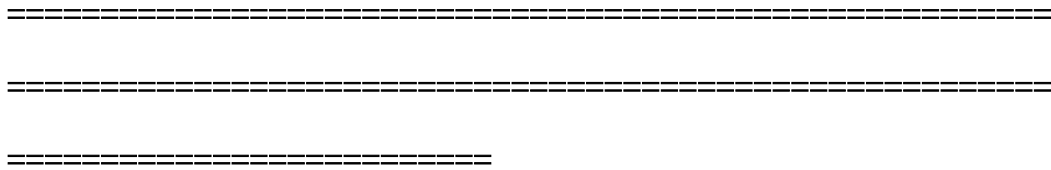
事实上，我们经常被告知，基督教是一个美丽的理论，但它只不过是一个理论。它太理想化了，它不适合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变化、人类的重大任务、艺术和科学、贸易和工业等等——所有这些都与基督教格格不入。基督教无法真正适应这些实际情况。它与我们的整个生活过程格格不入。它是诗意的，而我们的生活是平淡的。它来自另一个世界，而我们却不得不在这个世界中度过一生。它把我们的思想引向另一种生活，而我们和我们的所有能力都属于这个世界。它与我们的自然情感和思想背道而驰。这是对人类的否定。基督徒充其量不过是骑在飞马身上的天使。基督教不够人性化。我们该如何对待它呢？我们无法利用它得到属世的私利好处。对许多看重属世利益的人而言，它不可能是我们寻求和需要的真理。

我们该如何回答这一切呢？我们首先要诉诸事实，我们要援引历史的见证。基督教已成为最主要、最富有成果的思想力量，这难道不是事实吗？即使是基督教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如果他们不是被迫承认其力量和影响的真实性，并被迫在他们所采取的每一步行动中，无论是在外部生活领域还是在知识生活领域，都感受到这种力量和影响，他们就不会如此激烈地反对其真理。因此，基督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和一首诗；它是一种实际的力量，

实际上是最伟大的力量。基督教的后继时代难道不远远超过它的前继时代吗？人类的时代直到基督教之后才开始。因此，它必然适应人性。

它在艺术和科学的每一个领域都开辟了新的感情和智慧深度；它在社会生活的每一种关系中都带来了迄今为止无与伦比的善良和温柔。因此，它不可能是对人类的否定，它必然是人类生活的真相。事实上，历史证明基督教就是真理。但它的真理必然是自证的。我们要说明的是，基督教的基本真理是心灵的直觉真理，而这正是以下讲座的主题。然而，基督教的整个真理体系是建立在上帝存在之上的。基督教的第一个词就是上帝。我们所需要和寻求的真理就是上帝、活生生的、有位格的上帝。这是真理，是基督教世界观的基础。

这是基督教宇宙观的基础。



第三讲.

有位格的上帝

没有比上帝更重要的研究课题了。它决定了其他所有课题，并影响着我们的整个人生轨迹。一切都取决于对“到底有没有上帝”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以及我们生活的总趋势，都将与之相一致。因此，它必须是在所有问题中最重要、最首要的问题，其利益也是至高无上的。令人完全无法理解的是，为什么其他一切可能的探究都会吸引人类的注意力，而这个问题却被漠然置之。即使是最崇高的艺术或科学探索，最崇高的思维锻炼，最有尊严的、人类可以献身的事业，与这种探索、这种兴趣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我们怎么可能只沉迷于那些事业，而忘记了这个至高无上的问题呢？这个问题与其他任何问题都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事实上，在所有激荡人类心灵的问题中，我们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与其他任何问题都密切相关。这不是学者的问题，也不是政治家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实际上是整个人类的问题，是人的整个精神和道德生活的问题。

如果这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那么它的答案也必须关乎全人类。不仅是思维能力和感知能力必须对此做出决定。这些并不构成一个完整的人。这涉及到一个深刻的、道德的决定。在这一答案中，并非只有头脑，还必须心灵和良知。因为心灵和良知比理解力更能感知上帝。如果上帝是基本原则，那么确定上帝的存在首先

就不是“反思”能力的事，而是直觉的事。因为基本原则建立在直觉信念之上，而教条则建立在推论之上。没有什么其它问题，能够像人类对上帝的存在有着如此直观的信念。

否定上帝就是否定我们心中的信念，因此就是不适当出现的精神错乱。聪明睿智的自然哲学家利希滕贝格在他著名的预言中描绘了这种失常：“我们这个世界将变得如此精致，以至于相信上帝就像现在相信鬼魂一样可笑”。然后，他继续说，“世界将变得更加精致；那时，我们将只相信鬼魂。我们自己也会变得像上帝一样”。

此外，圣经还说（诗篇14：1）：“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

人的心灵中存在着对上帝存在的直觉信念。我们无法摆脱上帝的概念。我们在思考自己、思考世界时，都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上帝。我们的思绪越过可见和有限的事物，匆匆奔向至高无上、无形和无限的存在，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们不得不思考上帝。对上帝的意识就像对世界的意识或自我意识一样，是我们心灵的基本要素。上帝的观念是心灵的内在需要。利希滕贝格说：“当心灵升起时，身体就会跪下”。异教徒道德哲学家伊壁鸠鲁说：“如果我是一只夜莺，我将通过歌唱来完成夜莺的使命；如果我是一只天鹅，我将通过歌唱来完成天鹅的使命。但既然我是一个通情达

理的人，我的使命就是赞美上帝。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完成它”。人的最高思想是关于上帝，这是一种必然的思想。那么，其内在的必然性岂不是迫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它的主体、上帝自己，在我们自身之外有一个实际的存在？这种推论确实是不可避免的。想到上帝，就意味着确信上帝的存在。我们不能不想到上帝，也不能不想到他的存在；这是我们理性的必然。当然，这种对上帝的意识是主观的；但我们内心的所有直觉真理和信念也是如此。甚至自我意识也需要发展。那么，这种意识是后天获得的，还是先天接受的呢？上帝的意识也是如此，它先验地是我们精神生活的必要元素。

西塞罗说：“没有一个人是如此野蛮——即使不了解神的本性——以至于不相信有神”。这句经典名言表达的只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自西塞罗时代以来，许多个世纪的经验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们发现，对上帝和宗教的敬畏无处不在。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上帝意识。无神论者一直希望发现一个持无神论文化的民族，但他们的努力是徒劳的。非洲的黑人、黑暗的新荷兰人、美洲的野蛮印第安人都认识到了更高的存在。哪里有人类，哪里就有宗教。即使在最初认为情况恰恰相反的地方，人们也发现这种假设只是肤浅观察的结果。事实上，宗教的外在形式千差万别，在许多地方只能找到宗教的微弱痕迹或狰狞的漫画。然而，即使是在这样的畸

形中，也能辨认出其原始特征。尽管一个民族或种族可能已经堕落到近乎野蛮和愚昧的地步，似乎已经完全抛弃了人性的高贵，但即便如此，人们对上帝的记忆并没有完全消失。然而，这种普遍性、所有人都同意的东西不可能是虚假的——西塞罗早就提出了著名的论点。因为其原因必然在于人的本性。前几个世纪的辩士们一再向异教徒们提出的真理是：“我们在自己的灵魂中见证了自己的本性：我们在自己的灵魂中为上帝作证，我们不能不认识他，不能不意识到他的存在”。

这种对上帝的确信确实可能被否认，甚至被那些无法摆脱这种确信的人否认。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说服自己，他无法知道的东西就是他唯一不知道的东西。无神论不是理性的必然，而是一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任意的意志行为。通常为其辩护的理由只是为了掩盖其真正的起源。印度教徒以看不见上帝为由，与传教士争论上帝的存在！传教士回答说，他也看不到对方的理解力。我们每个人都坚信上帝的存在，但我们必须让这种信念得到公平的对待。

它不是一种建立在强迫理解力同意的证明之上的知识，而是一种内在说服力的知识；对上帝的信仰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美德。它的确定性不是源于思考，而是先于思考。不是理解说服人心，而是人心说服理解；正如在道德真理上，不是理性的证明说服良心，而是良心说服理性。上帝存在的信念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因

此也存在于我们理性的思想中。帕斯卡说：“上帝喜悦神圣的真理不是通过理解进入心灵，而是通过心灵进入理解。因为人类的事物必须被了解才能被爱，而神圣的事物必须被爱才能被了解”。利希滕贝格认为，“如果没有心灵，单纯的理性能否照亮上帝是个问题。只有在心灵认识上帝之后，理性才会寻找上帝”。理性无处不在地寻找上帝，在自然中、历史中、心灵中寻找上帝的踪迹。追寻上帝的踪迹是人类心灵最崇高的工作，也是其尊严的主要证明，这样，理解力才能获得心灵已经直观拥有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完全独立于思想所要求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不是来自思想，而是传递给思想的。

上帝存在的证据在任何时候都会被提出来。这些证据甚至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的前基督教哲学中也比比皆是。基督教士们的神学和推测只是采纳并加以扩展。它们并不是为了向我们证明我们还不知道的事物，而是为了向我们的推理能力证明我们的直觉信念是正确的，引导我们去寻找散落在各处的上帝的踪迹，因为我们已经在心中感知并认识了上帝。

我们周围的一切自然都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诗篇19：1、2）“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这一思想贯穿了整本《圣经》，并在我们心中找到了回声。大自然的景象会不由自主地唤起我们对无限的感受。克劳狄乌斯在他的《咏

叹调》中说：“尽管没有人会说我是一个哲学家，但我在穿过森林的时候，从来都会想到是谁让花儿生长的；然后，一个关于伟大的未知者的美好而遥远的概念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的心如此虔诚，却又如此愉悦地激动着，我敢打赌，那时我想到的就是上帝”。我们周围的一切都散发着上帝的气息。在他里面，我们生存、运动、存在。“离开你的灵，我还能逃往何处？”当上帝的无形的灵创造出有形的表现形式时，就像人的看不见的灵魂在人的面容上创造出看得见的表情一样，大自然——它本是上帝的面容——也会显出居住在它里面的隐藏的精神。然而，除非我们带着上帝的概念，否则我们会发现大自然只是哑巴。自然就像一份只包含辅音字母的书面文件。我们必须自己提供元音字母，才能破译它。但另一方面，我们心中的音调也需要大自然同类音调的帮助，才能成为清晰的语言。当然，自然本身并不能揭示上帝。上帝隐藏在大自然的必然规律之后。自然既隐藏上帝，也彰显上帝。她是面纱，但却是透明的。万事万物都隐藏着一个谜，诱惑着我们去揭开它，而最终的谜底就是上帝。但要找到他，就必须寻找他；要寻找他，就必须认识他；要认识他，就必须爱他。不想认识他的人，在自然界中找不到他，相反，自然界为他们提供了怀疑的机会。

首先，世界的存在本身就宣告并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世界是存在的，因此世界的创造者也是存在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清楚无误地看到了上帝不可见的本性，他永恒的力量和神性；使徒保罗

宣称，那些不在他的作为中认识他的人是没有理由的（罗马书 i. 19、20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甚至希腊和罗马的异教哲学家也坚持这一论断。这是正确的，因为这是一个必然的推论。世界是存在的。它是如何产生的？它自己吗？那些认为世界是它自己的创造者的人，不知道有比世界更高更远的东西。世界的创造力在哪里？我们发现的每一种力量都是有限的力量：那么，没有一种力量是创造性的。那么，它是各种力量的总和吗？有限的积累不可能产生无限。每一种力都受到其他力的限制。有限力的积累不可能产生一个没有限制的力。我们在行动中看到的所有原因都是次要原因；没有任何一个原因是终极原因、最高原因、创始原因。任何次要原因的积累都不可能产生第一原因。因此，我们必须寻找一种至高无上的力量，即伟大的第一因，这个由有限的事物和力量组成的世界就是通过它而存在的，它超越了所有有限的事物、力量和原因。我们的理性、本能、意识都要求这样做。我们周围的万事万物都从自身出发，超越自身；每个事物都只是一个指路牌，指引我们超越自然，走向超自然。而我们在世界之外寻找的、世界指引我们去寻找的这种超自然的东西，除了上帝、有位格的（能听、能看、能作为的）上帝、超越世界的位格力量之外，还能是什么呢？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的一段精彩文字中说道：“我问大地，大

地说，我不是他；其中的万物也做出了同样的承认。我问大海和深渊，以及所有在其中活动和生活的东西，它们回答说，我们不是你的上帝，你去找更高的吧。我问风，但空气和它的所有居民都回答说，我不是你的神。我问天、日、月、星，它们回答说：我们也不是你所寻找的神。我对环绕我的万物说，你们曾告诉我，关于我的神，你们不是他，那就对我说他吧。他们都大声说：他造了我们。是的；万物都有一种我们能够理解的语言，这种语言就是它们对造物主上帝的见证。”

从世界的存在中推导出的证据已经用各种形式表达出来。世界所表现出来的运动需要一个最高的动力；所产生的效果需要一个最终的作者；仅仅是可能的存在，需要一个必然的原因；——这就是哲学推理的方式，甚至在前基督教时代也是如此，从世界的存在发展，要求上帝的存在。最近，这一系列的推论又有了新的发展，有人说，实际存在的生命向后指向其自身之前的永恒生命。有机生命在地球上有一个开端，因此需要有一个创造这个开端的人。同样，世界由物质和精神组成，因此需要一位上帝。因为物质和精神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各自都是对方的对立面和限制，因此各自都是有限的，都不可能是对方的起源。物质自然不可能产生人的精神，人的精神也不可能产生物质性的自然。认为意识起源于物质是愚蠢的，认为物质世界是由人类精神形成的则也是疯狂的。简而言之，世界的存在需要上帝的存在。

同样，在这有限的洪流中被吞没的又会是什么样的生命呢？一定有一种永恒的生命超越了时间的变迁，超越了事件的潮流，它就是存在，是万物的原因和起源。我们的心灵和理性都需要一个终极的、至高无上的、永恒的存在——上帝。

世界对目的适应也不比它的存在更能证明上帝的存在。就连古代人也乐于把上帝视为世界的设计者和安排者，以及宇宙的艺术家。当然，世界是一个宇宙，一个和谐的整体，一个由真正和谐的部分组成的奇妙大厦，其中最小的部分与最大的部分相连，最大的部分与最小的部分相连，最遥远的部分是整体的必要组成部分，每一部分都必须以令人钦佩的互惠关系为另一部分服务。没有什么多余的，没有什么是不恰当的。事实上，这种目的性的论证有可能因为将其落实到琐事上而降低其价值。

这种观点认为，上帝让软木树生长在非洲，就是为了让它来制作瓶塞。但是，无论是对这一论点的滥用，还是它所引起的讽刺，都不能撇开整体及其组成部分的这种和谐和相互关系所提供的直接证据；人类的思想越是深入到创造所体现的设计之中，他们的耳朵就越能完美地感知到整体的和谐，由属于天地万物的无穷无尽的声音所组成的宇宙的雄浑合唱就越能在他的感官认知中迸发出来。

这种和谐从何而来？如果我们说源于偶然，这不过是试图用一个

毫无意义的词来解释一个事实罢了。偶然性可以使事物发生变化，带来奇特的巧合；但它缺乏理性，不能产生理性所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而这种相互依存关系表明，有一种客观的理性、一种明确无误的智慧在支配着万事万物。我们不仅仅相信这一点——我们不能不这样做；而且，我们的信念得到了实际经验的证实。正是这种信念推动了调查，而调查又证实了信念。只有相信智慧指引着我们的太阳系，开普勒才能做出他的伟大发现；林奈在他的植物学世界中承认，他在其中看到了上帝的踪迹。

认识世界的相互联系和适应需要智慧：难道不需要智慧就能形成这些联系和适应吗？

用自然法则和自然力代替上帝也是不可能的。自然力是一种力量，它盲目地作用，产生结果；但它不是一种智慧，后者自由地作用，安排联系。自然法则是决定事物进程的规则，但不是指定事物结局和秩序的智慧。我们不可能假设一种无意识的智慧，因为这是自相矛盾的；我们也不可能谈论无意识的观念，因为观念需要产生它们的有意识的推理原则。

如果一个人在荒岛上遇难，发现沙地上有一个几何图形，他难道不会由此推断出有人类居住，并为此感到内心充满喜悦和对上帝的感激吗？虽然，世界不仅仅是一个几何图形；但是，我们的灵魂难道不应该充满喜悦和感激之情，因为我们可以如此清楚地看

到一个更高更神圣的智慧主宰着这个世界吗？否认这种智慧不仅是认识上的错误，更是心灵上的过失。

即使是前基督教世界也能感知到大自然中存在着设计；但基督教时代的特征是在历史中认识到神圣的管理，并越来越多地追寻其踪迹。因而钦佩之情与喜悦之情与日俱增。总体而言，基督教通过人类合一和上帝合一的理念，首次提出了人类历史是统一、联系和进步的理念。这种观念在基督教之前的世界并不为人所知，但在我们这里却已成为一种潮流，而且是一种与西方天才思想非常相近的观念。此外，它还是人类最崇高的思考主题之一。还有什么比地球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更错综复杂、形式多样和反常的呢？乍一看，它似乎是人与行为的纠缠。其次，它似乎是不断的重复，民族的兴衰，国家的盛衰，同样的事件以不同的形式不断重演。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历史是由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线索组成的一个奇妙的组织，这个组织根据固定的道德法则不断延伸，不断前进。正义控制着它，道德政府主宰着整个历史，它一步一步地走向既定的终点。正是在使徒保罗的著作中，我们发现了这一人类历史普遍观点的最初痕迹。但是，这并不需要大量的基督教知识来理解和贯彻。即使是莱辛（Lessing）也能理解并教导我们，历史应被视为对于人类的教育。

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个伟大的时间转折点，所有前代人都在这里相遇，所有后代人都从这里出发，他是解开世界历史之谜的钥匙。

约翰-穆勒（Johann v. Muller）特别指出，这一观点首先为他提供了对历史的解释。事实上，无论我们如何看待耶稣基督，我们都不能否认他在历史上的这一地位。即使是像费希特这样的、不承认有位格的上帝的哲学家，甚至是故意的、坚定的非基督徒施特劳斯，也坚持耶稣基督对世界的道德管理。但这只是关于上帝的另一种说法。因为按照道德法则进行无意识的治理是根本不可能的。

然而，我们不需要投身于历史的海洋，追寻历史的谜团，就可以找到上帝：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事件中发现上帝的领导、管理和供应之手，只要他不故意闭上眼睛，只要他愿意相信他所看到和经历的一切，而这往往是他自己的耻辱！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上帝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完全按照他的特殊需要来引导他。

我们在世界、世界的存在、世界的设计、世界的历史中发现了上帝，同样，我们也可以在思想中发现上帝。

我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发现关于上帝的思想，正如我们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发现其他终极真理一样。我们并没有在自己的头脑中产生“善”、“真”、“美”等观念，我们只是在思考它们。

它们不是我们的作品，而是真理本身的作品。客观理性产生了它

们。正是它反映在我们的头脑中，它的神圣之光通过我们的理解这一媒介被分解成各种颜色。但什么是客观真理，它又在哪儿呢？我们拥有的最高理念是上帝的理念。它包含了所有其他观念。它是真理中的真理。不是我们自己产生了它，而是客观理性在我们的理性中产生了这种观念。我们想到上帝，只是因为他的存在。上帝本身就是我们对上帝的观念的创造者。

我们对上帝的直觉观念的事实就是神存在的证据。我们不能不同意笛卡尔的观点。事实的性质也不比事实本身更能证明这一点。因为我们的思想不是被一个单纯的观念所占据，而是被一个真实的上帝所占据。我们无法以其他方式来思考他。这样想他是我们理性的需要。不把他当作现实，就等于根本没有思考过他。因此，从我们对上帝的思考中，我们必然会推断出他的存在。这就是安瑟伦著名的本体论证明。

康德的确反对说，不存在从思想到存在的推论，不存在从思想世界进入现实世界的桥梁，他争辩说，正如对一百个王冠的想法不能证明它们的存在或对于它们的拥有一样，对上帝的想法也不能证明他的存在。但是，我们必须区分仅仅是任意的观念或想象，还是理性所必需的观念。必要的观念是现实的表达。如果这种思想与存在之间真的没有桥梁，那么我们的思想一般来说就会与存在的事物完全脱节，也就不可能有客观的真理和思想的确定性。如果这种必要的思想欺骗了我们，那么我们所有的思想也都欺骗

了我们，我们的思想也就可以停止努力了，因为它所有的思考都是徒劳的。但是，感谢上帝，事实并非如此。必然的想法与真实的存在之间存在着联系。因为我们所思考的事物本身就是存在，而我们理性的思想所关注的正是现实。

康德否认了这一推论，但至少承认甚至证明了另一个推论，即道德意识的推论。上帝是道德意识的前提，是良知的要求。

我们最确信的莫过于良心。否认它就等于推翻了一切确定性的基础，也就等于摧毁了以它为基础的整个世界的道德构成。把良知解释为心智训练的结果，既愚蠢又徒劳。它可能犯错，它也经常犯错。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它通常是一种错误和欺骗呢？最崇高的真理恰恰是最容易被滥用的真理。它需要发展，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它是后天习得而非原创的呢？难道一般人的思想不需要发展吗？但是否由此就可以推断它本来不存在吗？如果我们试图否认它，那么它存在的事实就会与我们相矛盾。同样，如果我们试图否认良知，它存在的事实也会与我们相矛盾。没有人可以凭良心否认良知。即使在我们试图否认它的时候，它也会通过内心的责备让我们感受到它的存在；如果我们不否认它，我们就无法欺骗自己。良心无疑是事实。

但良心也是一种权威。所有人都在它的力量面前俯首称臣。我们可以无视它的要求，但我们必须倾听它责备的声音。我们可以对

它的责难拒不接受，但我们无法消灭它。良知独立于意志。它不受我们支配。不是我们命令它，而是它命令我们。我们不纠正和引导它，而是它纠正和责备我们。我们不是在它之上，而是在它之下。它不在我们的权力之下，却拥有支配我们的权力。由此可见，它并非源于我们的意志或理性。它不是我们自己思想的产物。它（良心）是超越我们自身的道德精神的产物，它通过良知向我们发出声音。良知是一个最高和最终的上诉法院，是所有情况下的最高道德标准。因此，它是最高立法者的最高思想的产物，是绝对道德意志的产物。

良心的主题也是对上帝的见证；因为这包括它见证了道德律是上帝的旨意，我们的意志应该服从上帝的旨意。因此，就连西塞罗也说：“所有真正有智慧的人都认为，道德律不是人制定的，也不是国家制定的，而是永恒的律法，全世界都必须遵守。它的最终基础是上帝，是上帝的命令和禁止。这一法则与上帝的思想一样古老。因此，作为一切义务之基础的法则是真正的、至高无上的神的思想”。

康德证明上帝的存在，是因为美德与命运、义务与喜好倾向之间必须调和，因此必须有一种最高的调和力量；而它们两者之间（即美德与命运之间；义务与喜好倾向之间）往往是对立的。

有些人从这一论点中发现了一种低级的道德观；他们认为，为了

美德而追求美德，既不期待也不希望得到任何特殊的回报，这是一种更高的道德立场。【但康德的推理所依据的真理是正义的观念。正义是存在的，因此报应也是存在的；我们认为它是最高智慧的证明’ Ohne Wahl vertheilt, die Gaben Ohne Billigkeit, das Gluck’ 】。

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最深层的道德意识对这种想法（即那种低级的道德观）深恶痛绝。存在的最高境界是内在真理与外在现实相互协调。尘世的存在充满了真理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我们不能不要求，这些常常如此痛苦地激起我们道德意识的矛盾，应该在某种和谐的道德存在状态中得到解决。这是我们无法割舍的希望和信念。

通过所有这些不同的途径，我们来到了上帝面前，并不得不承认，我们的整个存在要求上帝作为我们存在的真理和目标。在任何尘世环境中，我们都无法找到安息或完全的满足，因为上帝就是我们的安息。在任何其他思想中，我们的心灵都无法得到安宁，因为只有对上帝的思念才能满足我们思考的心灵。我们无法在我们的道德努力中设定任何能够满足我们意志的目的，因为只有与上帝的交通才能缓解我们道德本性的渴望。上帝是我们整个存在的真理和目标，同样也是我们自身之外一切存在的真理和目标。在我们自身之外的一切存在中，我们都能看到上帝的形象——它们如同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上帝的独一本质被分割成各种光

线，这些光线都指引我们找到它们的本源。在所有的生活关系中，我们都能看到向更高关系发展的趋势；即使是人类存在的最高形式，也都指向远在其之上的至高存在。它们可以作为我们超越自身、迈向上帝的阶梯。上帝是宇宙存在的真理和目标。只有当我们感知到上帝的存在并认识到上帝的形象时，我们的尘世生活才能达到其真正的目的或最高的崇高境界。无论我们的世俗财产有多少，严格来说，这些都不是我们的，而只有那真正的目的或最高的崇高境界才是我们自己的。

因此，否认上帝不仅是错误、因为我们的理性需要上帝，而且会让我们陷入极端的贫困；因为这会让整个世界变得死寂、冰冷和空洞，让我们周围的一切失去灵魂和真理。简而言之，上帝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他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没有他，其他一切都不可能存在，而且，若没有他，任何事物都将是没有价值和不真实的。我们最深的信念就是：上帝是存在的。

这种直接的意识植入了每个人的心灵。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一个与人类本身相关的事实。

诚然，是基督教恢复了人类对其心灵组成部分的意识。对上帝的意识就像一口淤塞的井，基督教把它重新挖了出来。但它只是挖出了已经存在的东西。它提醒人们一个伟大但被遗忘或误解的心灵真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保罗在亚略巴古（《使徒行传》第

十七章第 23 节) 面前宣讲了雅典人无知地崇拜的那位未知的上帝；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在无意识地寻找和追求着这位上帝，而整个异教徒世界仍然在无意识地寻找和追求着这位上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最初几个世纪的辩护士们提醒和呼吁异教徒们他们对上帝的直接意识，并使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深信不疑。

“人类的灵魂啊，——良心感叹道：你天生就是基督徒！”于是，上帝的存在是确定无疑的。但上帝是什么呢？谁能描述他？上帝是无边无际、深不可测的海洋，谁能用语言来描述他的无限？上帝是一个谜——谁能表达他的秘密本质？

但上帝向人类的意识彰显了自己，因此人类至少可以现身了解隐藏的上帝本体。此外，他还在基督耶稣里显明了他最深处的本性，这样，在他身上，我们就可以窥见上帝的内心，知道他对我们来说是什么。

上帝是一切存在的力量；因为他是永恒的生命，自源自足。他是他自己永恒的行为；因此，他也是一切被造物的起源和终结，是世界的主宰，主宰一切，统管一切。上帝是圣洁的，是完全自洽的。他是无垢的光和完美的善；因此，他也是一切道德秩序的起源，是我们自身道德意识的创造者，是唯一能满足我们道德存在的部分。最后，上帝是爱，他永远希望我们属于他，并在他里面找到我们灵魂的平安。受造之物质世界教导我们上帝的大能，我

们的良心见证他的圣洁，但他的爱首先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真正的彰显。异教徒对上帝的大能有先见之明，对他的圣洁几乎一无所知，而对他的爱更一无所知。我们对上帝之爱的认识完全归功于基督教、耶稣基督。

然而，这正是我们最需要的知识；因为若我们仅仅了解上帝的能力和圣洁，他与我们之间的鸿沟就无法填平。我们由此获得的自我认识使我们与上帝保持距离；它使我们在他面前谦卑，但也使我们保持距离。帕斯卡说：“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位上帝，我们接近他而不骄傲，在他面前我们谦卑而不绝望。同样，认识上帝而不认识我们的苦难，会使我们骄傲；认识我们的苦难而不认识上帝，会使我们绝望；认识基督则将两者结合起来，因为在他那里，我们既找到了上帝，也找到了我们自己的苦难，因为我们找到了使我们与上帝团聚的爱，这是上帝之启示所教给我们的知识，我们的心灵和良知都会说‘是的，阿门’”。

但泛神论却说：不。泛神论否定了基督教的上帝，并在他的位置上另立了一个东西。

事实上，泛神论是一个哲学问题，本讲座无意进行哲学探究。但这也是一个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的问题，因此不能完全忽略。因此，我将尽可能简单扼要地讨论这个问题。

泛神论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它只有一个基本概念：

根据泛神论，在这个世界的无限多样性及其个别现象的根源中，有一个构成其统一性的共同原则，而这个共同原则就是“上帝”。然而，这并不是有意识的、“有位格的”、能听、能看、能作为的“上帝”；它不过是生活在万物中的共同生命，是万物中的共同存在，或者说是万物中的理性。我们只是称它为“上帝”。这个上帝没有独立的存在；他只存在于世界之中；世界是他的现实，而他只是世界的真理。

这种泛神论存在于基督教之前的时代。在它的基础上，产生了异教徒的宗教，那些对自然狂热的宗教；它产生了印度哲学中梦幻般的、充满想象力的观点；它还在希腊创立了一个哲学流派——埃利亚特派，但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却教导人们一个有位格的、能听能看能作为的上帝。

斯宾诺莎在基督教时代是泛神论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在它（泛神论）似乎被遗忘了很长时间之后，莱辛在其著名的《与雅各比的对话》中重新引起了人们对它的注意。此后，它又被谢林重新唤起，并由黑格尔发扬光大，从那时起，它就经常，而且实际上比人们所知道或怀疑的还要经常，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的一部分。

斯宾诺莎认为，“一切存在的基础是一种永恒的物质，它在思想和空间物质的双重世界中实际存在。个体形式从这一物质的子宫中产生，并在永远肥沃的生命之流中再次被吞没。就像大海的波浪起起落落一样，个体生命也是这样产生，然后又沉入共同的生命中，而共同的生命正是所有个体存在的死亡”。

“永恒的绝对存在”，谢林在他的早期说过，“在心灵和自然的双重世界中不断分离。它是贯穿所有自然界的同一个生命，并将自身掏空给人。它是同一个生命，在树木和森林、海洋和水晶中活动，在自然生命的强大力量中工作和创造，并在人的身体中产生心灵的思想”。

黑格尔说：“绝对是普遍的理性，它首先在自然界中埋葬并迷失了自己，然后在人身上以自我意识的心灵的形式重新找回了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绝对在其伟大的过程结束时再次回到自身，并与自身合一。这个思维过程就是上帝。人对上帝的思考就是上帝的存在。上帝没有独立的存在或存在物，他只存在于我们之中。上帝并不认识他自己，而是我们认识他。在人类思考和认识上帝的同时，上帝也认识和思考他自己并存在着。神是人的真理，人是神的真实”。

因此，人成为了神。

不可否认，泛神论是建立在一种伟大的思想、一种崇高的情感之上的；而且这种思想、这种“情感”是真实的、即存在着一种统一性，我们的生命与我们周围的宇宙生命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大自然的生命唤醒了我们内心的共鸣，呼唤出相应的倾向，这本身就证明了心灵与大自然之间存在的关系。在自然界和心灵世界中，心灵所认识到的是其自身的规律，我们在其中发现了与我们的主观理性相同的客观理性。但是，我们周围的这种集体生命，以及反映在我们精神中的客观精神领域，是终极的、至高无上的、真正的上帝吗？泛神论的错误就在于，它的思想和情感被固定在这个中间地带并受其限制，而不是穿透这个中间地带，直达万物的伟大第一因，直达绝对理性，直达上帝。

对泛神论的驳斥首先体现在其实际结果上。

泛神论消灭了宗教。因为它的上帝并不是我可以与之建立个人关系、我可以爱他、我可以信任他、我可以向他祈祷、我可以接近他并把他当作我的朋友的人格化的（即能听、能看、能作为、有自我认知和自由意志的）上帝；而只是我必须俯首称臣的必然的力量，是我可以在其中迷失自我的普遍的生命。泛神论废除了道德的基本假设；因为所有善恶的区别都不过是一个绝对原则的不同表现形式。因此，它们不再是实际的道德对比。我们称之为恶的东西，其实与我们称之为善的东西一样，都是必要的；那么，我们怎么能谴责必要的东西呢？泛神论摧毁了希望。就像花朵在

秋天凋谢，再也不会绽放一样，人也在生存的洪流中被吞没，再也找不到了；他的一切都结束了。花可以放在标本馆里，人可以活在后人的记忆中，但一切都结束了。泛神论者回答说，只是你的利己主义使你不愿意彻底结束。但是，无论如何，是上帝自己把这种“利己主义”放在我们心中的，它不能不说是真理。

这些结果本身就足以驳倒泛神论。但有人可能会反对：我们不应该根据结果，而应该根据事物本身来判断。的确，从结果中可以看到事物本身；但让我们忽略这些结果，证明泛神论本身就是对它的驳斥。因为它是三重矛盾：它与我们的理性、良知和心灵相矛盾。

它与理性相矛盾，因为它说到上帝，却又否认上帝。泛神论的上帝是“无限者”，但这个“无限者”只有在“有限者”中才实际存在，这等于说“无限者”本身并不实际存在。因为无限怎么可能与有限相同呢？如果有限是它的实在，那它就不是它的本质实在，因而也就不是无限本身。因此，泛神论既承认又否认无限。同样，有限怎么会等同于无限呢？我们被告知，人死了，其有限性就被取消了。但这实际上只是为了让位给同样有限的事物。因此，我们永远无法超越有限的事物，进入无限的世界。无限无处可寻。

泛神论的上帝是一般，不断变化为特殊和个别。通过什么规律呢？斯宾诺莎回答说：‘神圣的必然性’。这是什么话？普遍的物质并

不能独立地产生特殊的形式；因为普遍的物质是按照必然律行事的，而个体的形成也是以自由律为基础的；因此，这两个对立面必须结合起来才能解释实际存在的东西。泛神论的上帝要么是自然产生心灵，要么是心灵产生自然。然而，自然是无意识的，心灵是有意识的；那么，本身无意识的东西怎么会产生有意识的东西呢？这是一条古老的逻辑规则，即果不可能包含任何在因之前不存在的东西。现在，意识对于无意识来说绝对是新的；那么，后者怎么会成为前者的原因呢？黑格尔认为，泛神论的上帝是绝对思维。因为人认识并思考绝对者，即上帝，所以上帝认识并思考他自己。但我对上帝的意识怎么会是上帝的自我意识呢？如果人对上帝的意识不是与绝对者相对应的现实，而后者又如黑格尔所要求的那样是主体，那么它就必须具有比人的思想更高的现实性，必须是比人的主体更高的主体，是超世俗的主体。

一个超世俗的主体，一个超人的意识，一个自我意识的、位格化（即，能听、能看、能作为、有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的上帝，凌驾于一切世俗存在之上。位格化的趋势贯穿整个世界。从最低级的存在开始，生命就在努力获得位格，并在人身上成为人格。如果世界的原则是非位格的，那么所有生命中的这种位格化倾向又从何而来？整个人类结合成上帝之国的单一有机体，而上帝之国又反过来寻求自己的个性，从而在绝对的个性中达到高潮，在上帝——每一个被造物的冠冕和顶峰——中达到高潮。因此，理性要求绝对者的位格，而泛神论（由于其“上帝”是没有“位格”的）

是与理性对立的。

这种（泛神论）体系也同样与良知对立。我们的良知要求道德律的至高无上，而道德律的至高无上则要求有一个位格化的上帝。因为只有上帝才是最高的法律制定者，只有上帝才是最高的法官。人们普遍相信，道德律法必须建立在超越人的权威之上，也就是建立在至高无上的神的权威之上。事实上，民法可能是人类意志的产物，是易变意志的产物。但道德法则则是永恒的，有一个永恒的起源，一个超人的作者。它不可侵犯的权威仅取决于这一点。只有上帝才是最高的法律制定者；只有上帝才是最高的法官。我们需要一种最高的正义，与人类的正义不同，它不会犯错，有罪的人也无法逃避。必须有一个最终的上诉法庭，无罪的人可以诉诸它，有罪的人也无法逃脱它。有人说，良心是法律的制定者，也是法官。它可能被遮蔽、削弱、发育不良、残缺不全；它可能保持沉默，或者我们对它的指令充耳不闻。那么，作为人类生活基本法则的正义何在？如果说它不过是良知，那么它就一定是无懈可击、不可抗拒、不可避免的、“超然良知”，也就是说，是绝对的良知——上帝，世界的最高良知。

我们的良心需要一个上帝，但我们的心灵对他的要求也不低。我们为奉献、信仰、爱、希望、幸福而生。世界能成为我们信仰和爱的对象吗？世界是短暂的、易变的，我们如何在其中找到安宁？信仰和爱是人與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是为人與人之间的关

系而生的。但是，帕斯卡说过，他随身携带的一张纸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一个人拥有对自己的爱是不对的：任何人对我产生依恋都是不对的，无论这种依恋是出于何种自愿；我只能让那些被我唤起这种感情的人失望，因为我不是任何人的目标，我不能够满足他们。没有人能够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绝对的满足，甚至每一个人的兄弟姐妹总是也会死去”。在《笔谈》中，他是这样表述自己的：“说我们应该得到他人的爱、渴望得到他人的爱是不公正的”。

当然，相互关爱的力量是人类最好和最高的特质，但这种最好和最高的特质只是更好和更高的东西的预言。只要爱是真实的，我们所爱的人就超越了那人。海洛伊斯所爱的阿伯拉尔，培养和美化了她的心灵；教她翱翔于高空的，不是阿伯拉尔，而是比阿伯拉尔更高的东西。所有世俗的爱都超越了自身。人是如此崇高的存在，只有上帝的爱才配得上他，也只有上帝的爱才能满足人的心灵。对上帝的爱要求上帝具有位格（即上帝能听、能看、能作为、有自我认知与自由意志）。如果我们摒弃了上帝的位格，我们也就摒弃了人格、人性中所有最美好、最崇高的东西，摒弃了信仰、爱和希望；我们得到的交换条件是顺从，不是温顺、耐心地顺从上帝的旨意，而是那种哑巴式的、冷酷的顺从，因为它必须顺从，它不是向爱屈服，而是向权力屈服；当它闭上眼睛时，就会陷入永恒的死亡，我们最美好的特性——我们的人格——就会消亡。“泛神论通过消灭上帝的位格来消灭人的人格。它的上帝本

身就不是真正的生命，不是活人的上帝，而是死人的上帝”。

总之，泛神论与我们的内在本性、内在真理和内在渴望绝对相悖；它与我们的理性、良知和心灵相悖。承认有人类这种存在的人，就不得不承认有上帝；承认有上帝的人就不得不承认有上帝的位格，也必须说，上帝啊，你是爱；他的整个思想倾向将由这一承认决定。

=====

=====

=====

=====

=====

第四讲.

世界的创造

我们对上帝的看法将决定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如果上帝是一位永活的、有位格的上帝，那么世界就是由他创造的，创造是他的能力、智慧和爱的自由行为。这就是基督教世界观的基础。然而，我们一进入这个话题，就会遇到物理科学和自然主义世界观对宗教观，尤其是对圣经观提出的反对意见。这引起了一系列的探究

和怀疑，占据了许多人的思想，并常常使他们感到不安。

物理科学与宗教世界观之间的冲突是现代的产物。它与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和地质学最近取得的巨大进步有关。自从迄今为止未知的世界被揭示出来，——赫歇尔和罗塞的望远镜将遥远的星云解析为恒星系统；艾伦伯格发现一英寸的三叶草中的微观世界；以及含有多达四万万个加利奥内利的硅质贝壳化石；——人们对这个可见的世界有了新的认识，人类的头脑中已经有了一种更强大的意识，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人类现在相信，空间和时间都不再是封闭的。由此获得的知识开始形成一种自然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以其对事实的诉求和对有形证据的要求而引人注目；因为有形的东西自然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一方面，宗教信仰不会把它的影响局限于智力生活的某一领域；它会熏陶心灵的每一种思想，并使所有思想都与自己和谐一致。然而，思想的本质是不能容忍彼此截然相反的观点的。因此，现代思想生活中经常出现分裂，随之而来的是一种不舒服的犹豫感和不确定感，即是否应该做出让步或做出怎样的让步，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恢复心灵世界失去的和谐。

施莱尔马赫已经开始担心科学发现的结果，这不仅是为了神学，更是为了整个基督教。“我担心，”他在 1829 年给吕克的信中写道（《神学研究 with 批评》，ii. 489），“我们将不得不学会放

弃许多人习惯于认为与基督教密不可分的东西。我说的不是创世纪一章中关于六天的工作，而是整个关于创造的概念：它还能坚持多久？在建立在科学结论基础上的世界观面前，它（关于神创造世界的观念）还能坚持多久？还有我们的《新约》奇迹，因为我说的首先不是《旧约》的奇迹：它们还要多久才会再次倒下，而且这次是在比以前更庄重、更有根据的前提下，在膨胀的自然百科全书的时代？那该怎么办呢，我的朋友？我将活不到那一天，但我可以安详地睡上最后一觉。但你和你的同代人打算怎么办呢？你们会把自己筑在这些防御工事后面，任由科学包围和围攻自己吗？难道历史的死结就要这样解开，基督教就要与无知结盟，科学就要与不信结盟？”

施莱尔马赫如是说。好了，他已经安息了，吕克也安息了；他给吕克确实写过这样的信；但我们在这里，要做他们没有做完的工作。我们该说些什么呢？危险真的像他（施莱尔马赫）描述的那样大，也像许多人现在似乎认为的那样大吗？

当以色列人到达应许之地的边界时，他们派出探子在前面探听有关这个土地及其居民的信息，并将有关情况带回给他们。这些探子沮丧地回来了，他们的报告使其余的人心灰意冷。只有迦勒和约书亚两个人保留了勇气，劝勉他们相信上帝和他们的事业，继续前进。上帝在他自己的时代悦纳勇敢的人，让胆怯的人羞愧。

施莱尔马赫也是如此，他在科学领域做了一次短暂的旅行，却带回了一颗绝望的心。难道我们要因此而气馁吗？我认为，事情还没有发展到这种地步。

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纷争不是由于边界被打破而引起的，许多复杂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严格维持边界来解决。

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也是最必要做的，就是严格划定并保持两省之间的边界线。这样，我们就能获得最重要的东西。宗教和神学所涉及的真理，科学一无所知，因此也无权否认；而另一方面，科学所涉及的知识圈，宗教与之无关，神学也无话可说，即使两者（科学与神学）涉及的是同一个主题，也是其完全不同的两个侧面。宗教告诉我们，上帝赐予我们日用的饮食；科学告诉我们，玉米是如何从地里长出来的。为什么有人会说，在这两件事中，一件事发生了，就注定另一件就没有发生呢？宗教和科学都有自己的权利，但各自都有自己的领域。承认它们各自领域之间的界线是维护和平的途径。在这个问题上确实可能会出现不确定性，并由此引发争端。但这些争端应通过更严格地界定和维护边界来解决，而不应被视为争战的原因。这样的安排可能会花费我们很多时间，需要我们付出劳动和耐心。我们也可能不得不暂时搁置某些问题。但我们可以展望未来，做出我们尚无法做出的决定。

这个问题就是创造本身的问题，也是我们现在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中，严格区分两个领域尤为重要。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我们对其他问题的看法。不过，这个问题属于宗教范畴。因为创世观念属于宗教而非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确可以为我们提供关于世界外部历史的信息，但必须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世界这一事实的不是科学，而是宗教。关于这一事实，科学从其自身的资源出发，无法告诉我们任何信息。因为无论科学如何逆向而行，如何探究万物的起源，它最终都会被物质、生命和规律所束缚。科学完全无法告诉我们这些物质、生命和规律的来源。因为她总是假定物质的存在，她的一切努力都是从物质开始的。

关于物质起源的问题，离开了感官现实的领域，就进入了猜测或信仰的领域。在这一点上，自然科学就不再是自然科学，而变成了哲学或宗教。无论我们承认物质是上帝创造的，还是认为物质是自在和永恒的，抑或我们根本不关心物质起源，——对于以物质存在为出发点的自然科学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科学与信仰之间既不存在冲突，也不可能存在冲突。如果有冲突，那也是两种截然相反的世界观之间的冲突，而这两种观点最初都是从其他来源接受的，都是信仰问题，无论这种信仰是宗教的还是哲学的。乍看之下，这似乎是与科学的冲突，其实是与科学的拥护者所接受的哲学的冲突。

那么，这种冲突是什么呢？

世界是一个事实。它从何而来？它要么是自我存在的，要么是造物主的杰作。后者是《圣经》的教义。除了启示和《圣经》之外，在古代世界中找不到所谓创造的概念。要么像西方哲学所认为的那样，世界是从永恒的物质中产生的，也许还加上了一种神圣的智慧，其职责是塑造已经存在的物质；要么像东方幻想的那样，世界是从神性中流淌出来的。这两种观点都有各自不同的错误，然而，这两种观念都与关于上帝的真正观念背道而驰。后者要求世界的存在是神的自由行为所导致的。然而，如果世界是神的全能意志的自由行为的结果，那么它是“无中生有”的，……也就是说，它的存在并不以物质的存在为前提；而是，形成世界的物质本身首先是由神创造的。毫无疑问，“无中生有”是正确的，因为一切有形之物都以某种存在为前提；而这种存在最终只以上帝的意志为前提。然而，存在的起源超越了我们所有的想象力。生命的起源仍然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任何事物是如何产生的，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我们也永远不可能获得这方面的知识。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完全理解原始物质是如何存在的呢？正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 1、3 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的确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不是靠感官，而是靠信心来理解世界是由上帝话语的精神力量所创造的。因此，世界的创造是宗教信仰的一条重要真理，也是具有

深远宗教影响的一条重要真理。换句话说，个人宗教的整个上层建筑都建立在创世学说之上。如果说世界有一个起源，那么它也有一个指定的终结，其历史的中心点就在耶稣基督身上；因此，对历史发展的所有真正的理解都建立在创世说之上。诚然，这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学说。

它的对立面是泛神论和唯物主义的教义。

泛神论教导“绝对”或“理念”不断地、自发地向现实过渡。但这只是说说而已，因为没有一个泛神论者能够告诉我们理念是如何变成现实的。二者之间没有桥梁，只有飞跃，而且是不可能的飞跃，黑格尔学派的泛神论哲学在飞跃过程中摔断了脖子。

泛神论的结果是唯物主义，即认为物质性是一切的一切，只有物质性才可以说是存在的。唯物主义否认精神的存在，否认绝对和神圣，也否认被造物 and 人类。唯物主义试图仅仅从物质以及与之相关的运动能力来解释世界和人类的存在。就前者而言，它可以被称为物理唯物主义，就后者而言，它可以被称为心理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早在古希腊哲学中就有了，尽管它还只是以一种简单而自然的形式存在。大自然的谜团一直激发着人类头脑中的研究本能。万物的起源来自水、空气或原始混沌中。然而，另一些哲学家，即所谓的原子论者，如德谟克利特，则把原子放在物质的位置上，即物质不可分割的微小部分，虽然它们本身确实不可

改变，但通过它们在空间中的各种组合和分布，产生了世界的各种现象。如果要问是什么使这些原子运动起来，并使它们结合或分离，答案是必然性或偶然性。事实上，希腊更深邃的哲学思想认为，为了解释世界所表现出的智慧，必须承认有一种至高无上的智慧，它即使没有创造、至少也能塑造宇宙。从阿那克萨哥拉斯（Anaxagoras）开始，希腊的伟大哲学家们都主张这种观点。然而，伊壁鸠鲁又回到了原子论，认为世界及其所有形式都起源于原子的偶然结合。因此，他推断感官是真正的、最确定的知识工具，人生的目的不是完成道德任务，而是幸福，即快乐，尽管是一种高尚而适度的快乐。这些格言已经包含了现代唯物主义的所有要素。当基督教及其世界观征服并统治了人类的心灵和思想世界时，唯物主义观点曾被搁置了很长时间，直到近代才再次盛行或得到许多追随者。

上个世纪在法国盛行的对历史上、尤其是教会发展的一切观点的反对（那些法国人反对历史上的一切，尤其是反对教会的一切），产生了《梅特里》（La Mettrie）和《自然体系》（Système de la Nature）一以贯之的唯物主义。“除了物质什么都没有，没有脱离物质的精神”——这就是它的基本格言。这些观点在费尔巴哈（L. Feuerbach）、沃格特（K. Vogt）、莫尔斯肖特（Moleschott）、比希纳（Büchner）等人那里得到了大量不切实际的支持，而在其他科学研究者那里则得到了更为谨慎和深思熟虑的拥护。这些人认为，尽管费尔巴哈提供了哲学证明，但问题并不在于科学理论，

而在于一场决定性的实践运动。至少那些坚定而公开的唯物主义者希望废除目前社会稳定所依赖的知识基础，特别是道德和宗教基础。最重要的是，唯物主义否认教会存在的权利，并致力于破坏教会的基础。例如，K. 沃格特在圣保罗教堂就公开宣称（他以其惯用的鲁莽大胆的方式宣布），总有一天，被称为教会的东西必须从地球上消失。

这些唯物主义者认为，物质就是一切，除此之外别无其他：物质是永恒的、不朽的，是“一切存在的主要原因；一切生命和一切形式都不过是物质的变体”；只有形式才是易朽易变的；原子现在进入这个组合，然后又进入那个组合，从而在感官所能看到的物质的无数不同形式中进行着持续不断的变化。“植物从碳酸、腐殖酸和氨中得到的碳和氮，先后变成草、苜蓿、小麦、野兽和人，再次分解成腐殖酸和氨。这就是循环的奇迹。”——莫尔肖特在《生命的循环》第 84 页中如是说；换句话说，他认为自己的最终归宿是有朝一日变成粪肥。

根据这一教导，物质是第一要素。但物质从何而来呢？我们只是被告知它的存在。但这不是回答问题，而是禁止提问。有人说，物质是永恒的。这是怎么知道的呢？可以说，这是一个必要的前提，因为没有这个前提，就必须承认有一个创造者，而唯物主义者并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绝对永恒的特性怎么会存在于物质的本质之中呢？力是与物质结合在一起的。那么，力从何而来？

物质既不能从力中产生，力也不能从物质中产生，因为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力也不能从自身产生，因为它没有独立的存在，而是与物质结合在一起。唯物主义试图解释存在之谜，并从两个无法解释的、谜一样的“量”开始。据说，物质由无数原子组成，即由不可分割的物质部分组成。这个旁证法从何处获得原子？从经验中吗？不，因为它们是不可感知的。基本粒子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被看到。但是，沃格特说（《Köhlerglaube und Wissenschaft》，第 107 页），“感性经验的界限就是思维的界限”。然而基本粒子单元却在经验的范围之外！还有人说，这些原子以各种形式结合在一起。根据什么规律呢？有人回答说，是选择性亲和力法则。那么，没有任何属性的原子能拥有电亲和力吗？即使能，这些原子的运动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因为物质本身是不动的，它的每一次变化都需要外因。有人说，运动源于吸引力法则？是什么使运动变得如此有规律、有条不紊，以至于不断产生出各种形式，这些形式本身和谐一致，并且始终符合它们的原始类型？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要求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将物体置于相互吸引的关系中，并要求有一种智慧的意志按照规律和秩序来调节物质所呈现的各种形态。

而且，唯物主义的观点被“组织”这一事实彻底摧毁了。

如果只发现机械的组合，我们也许会满足于接受单纯机械的力量。但是，是什么产生了有机体呢？试图把它们归结为单纯的物理过

程是完全徒劳的。无论我们对原子的概念是什么，它们都不足以解释“组织”。晶体的形成与有组织生物的形成有着本质的区别。有机体的区别在于其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生命互动，以及它与周围物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有机体的存在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它不仅是原因的世界，也是目的的世界。在自然界中认识到适应目的的规律，是对自然的最高看法。这就引出了最高智慧。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和现代自然科学已经开始向这种“目的论”思想开战，“有人说，试图根据自己的目的论来判断无限的自然界是‘蜉蝣’、‘渺小的人’的错觉”。但是，设计的法则是我们精神构成的法则，因此我们在外部事物中也会寻找和发现它，我们在最微小的细节和一般事物中都会遇到它。每一个有机体都建立在一个想法之上。事实上，整个有组织的自然界都受该高级智慧理念的支配。正是由于即使在细节中也普遍存在着支配整体的观念，所以居维叶才能够从几根骨头中确定原始动物的结构。这种思想适用于未来。眼睛是为光而生的，耳朵是为声音而生的，等等。但眼睛是在黑暗中形成的，耳朵是在寂静中形成的。然而，它们一形成，就立即与光和声音发生了关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设计机构，它超越了一切外因，回到了一个创造和设计的心灵。即使在最微小的细节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思想的盛行，难道它不也在影响着整个世界吗？整个世界都建立在一种智慧思想的基础上：从最低级到更高级，直到最高级，都有一个计划和逐步实现的过程，因此，整个漫长的发展过程都受最高级思想的支配。最后一个先于第一个存在，整体先于个体存在，即作为理念存在；

因此，单一理念的力量支配着整体和每个个体的发展。如果我们只承认物质和力量，或无意识作用的自然，而不承认创造世界的智慧的创造力，又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呢？

即使我们可以想象这种观点足以解释自然界目前的作用，我们又该如何解释有机生命的起源呢？难道有机生命可以由无机物产生，有生命的可以由无生命的产生吗？事实上，施特劳斯为了摆脱人类被创造的观点，让人类像绦虫一样起源，根据他的观念，绦虫通常有 20 英尺长，即所谓的 *Generatio æquivoca*，即在没有任何生命体介入的情况下，从纯粹的物质中独立起源。然而，严格的自然科学并不知道此事。

只有生物才能产生生命。但有人说，在原始时代，这一切都不同。那时，物质拥有自发生成的力量；而现在，超朽世界的力量已经耗尽。然而，这些不过是痴人说梦。生物只产生于生物；生命只产生于生命。我们可以永远诉诸化学和物理的力量，把大自然描绘成一个巨大的化学实验室；但是，尽管化学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了巨大进步，它还没有、也永远不可能产生一个有生命的细胞；浮士德的瓦格纳还得等待同形体从化学甑中出来。即使我们承认大自然是一个伟大的化学实验室，甚至能够产生生命，但我们仍然会问：在这个实验室里，化学家在哪里工作？

总之，唯物主义就像薄冰，我们在上面每走一步，它就会碎裂，

不能作为构建世界观的基础。

但是，有人回答说，即使摒弃了唯物主义，基督教的世界观也会被天文学和地质学的事实所推翻。

人们反复说过，天文学是对基督教的驳斥，哥白尼体系使基督教的观点完全站不住脚，而更多的现代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

基督教的观点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宇宙的中心；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终极创造者；上帝之子在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实现了救赎，其结果与宇宙同在，宇宙的未来命运与人及其世界的未来命运息息相关。

与此相反，哥白尼体系认为地球只是宇宙中的一个渺小的点，是一个最不重要的太阳的最小行星之一；无限的空间充满了太阳系，与之相比，我们的太阳系微不足道。仅银河系就有两千多万个太阳！而银河系本身不过是宇宙大海洋中的一个小岛！最遥远的距离充满了世界。那么这些距离是多少呢？虽然光的传播速度是每秒 20 万英里，但是最近的一颗固定恒星（即半人马座，距离我

们 200 多亿英里) 的光到达我们这里需要将近四年的时间, 银河系最遥远部分的光到达我们这里需要 8000 年的时间, 而最遥远的可见星云的光到达我们这里至少需要 2000 万年的时间。至少可以这么说。一列火车以每小时 32 英里的速度日夜不停地行驶, 需要三百四十二年零三个月才能到达太阳; 由于最近的恒星比我们远 269420 倍, 我们不可能在少于九千二百万年的时间内到达它。那么, 地球——宇宙之海中的一粒沙子——怎么能被视为宇宙的中心呢? 我们不得不承认席勒在他的诗作《创造的伟大》中的艺术; 我们不得不与席勒一样认识到宇宙的无限性:

“你的航行是徒劳的——返回!
在你的道路之前, 无穷无尽!
你也徒劳无功! 在我身后, 无限向你展开!
折起你低垂的翅膀,
哦, 思想, 俯冲的雄鹰!
哦, 幻影, 起锚! ——航程结束了;
受造之物, 狂野的水手, 流向无岸!”

有人说, 基督教必须与古老的托勒密体系共存亡。然而, 托勒密体系在哥白尼体系之前就已经衰落了。人类智慧的辉煌胜利, 真理终将得到胜利的崇高证明。古老的神学家们在为哥白尼辩护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罗马教会在谴责伽利略的命题并迫使他放弃这些命题时是始终如一的。但这是徒劳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回答呢？哥白尼体系当然是真理，是智慧的胜利，难道它与基督教不相容吗？至少哥白尼不是这样认为的。他在圣约翰教堂的墓碑上刻着一句话，可以翻译如下：——

“我不渴求保罗所得到的恩典，
也不求你对彼得的恩宠：
唯有你赐予十字架上的盗贼的恩典，
唯有那是我所恳求的。”

开普勒和牛顿，这些科学领域的巨人，也都是谦逊而热心的基督徒。

但是，可以说，这些现代天文学的伟大奠基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重要发现所带来的后果；因此，我们必须提出实际的理由。

那么，我们首先要回答的是，数量并不是质量的标准。难道最小的空间不常常包含最伟大的奇迹吗？如果说望远镜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世界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沙子，那么显微镜则向我们展示了几乎每一粒沙子中都蕴藏着一个新世界。一个物体的重要性并不取决于它的外部大小。数量和质量往往是截然相反的。《诗篇》第八篇就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耶 和 华 我 们 的 主 阿 ， 你 的 名 在 全 地 何 其 美 。 你 将 你 的 荣 耀 彰 显 于 天 。

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或作神）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脚下。耶和華我們的主阿，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在上述这篇诗篇中，人与宇宙万物相比就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但却被描述为上帝选中的工具。最微小的有机体凌驾于最大的无机体之上；山谷中的玫瑰凌驾于裸露的花岗岩的高山之上；心灵凌驾于整个物质宇宙之上；因此，心灵达到成熟的地方凌驾于最广阔的地区之上，而这些地区只不过是心灵发展的初级阶段。我们的地球为这一论点提供了最有力的佐证。地球的本意肯定是人类的居所，而不是鲸鱼的居所；然而，地球的三分之二都是水。此外，在剩下的三分之一中，有很大一部分由于寒冷、炎热、风沙和沼泽而变得不适合人类居住，或者至少是这样构成的，就好像大自然会像赫尔德在谈到艾斯基摩人的寒冷地区时所说的那样，大自然似乎要在最不利的环境下考验人类的发展能力。

而且，为什么人类甚至必须与猛兽和爬行动物分享自己的那部分世界，而它们要与人类争夺这世界的所有权呢？的确，判断重要性的标准并不是外在的数量！空间的大小对心灵的表现绝对无关紧要，心灵常常选择在尽可能小的空间里创造最伟大的奇迹。人类的渺小身躯并不辜负精神的伟大，因为精神可以环绕整个世界；地球虽然在宇宙中相对较小，但也不妨碍上帝在其中彰显自己。或者说，一个星球的体积必须得有多少倍的四万亿英里，才能使全能者的化身获得应有的荣耀？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至少就我们所能判断的而言，我们的地球确实我们的太阳系中占据着中心位置，这不是外在的和数学上的，而是本质上的、就其状况而言的，因此，它虽然不是太阳系的物质中心，但肯定是太阳系的生命中心。因为在我们的系统中，没有任何其他天体像地球这样适合作为有机生命的栖息地。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将地球与其他行星进行比较；因为后者不仅与前者遵循同样的法则，而且正如天文学和物理学告诉我们的那样，它们的组成物质与我们这个世界的组成物质相似。另一方面，有机生命、心理生命和精神生命，这些条件要么在其他星球上完全不存在，要么存在的程度远远低于我们地球上的完美程度。首先，太阳的密度是如此之大，引力也因此大得多（28 倍），以至于正如梅德勒所说，“即使不是太阳的炽热状态立即排除了居住和有机生命的一切可能性，我们的萨姆森人被传送到太阳上也不过是体弱多病和悲惨的弱者”。然而，同时，我们离太阳越远，物质

的一般条件就越不适合人类的生存（18）。撇开海王星这颗最遥远的行星不谈，我们会发现，天王星距离太阳有 1.8 亿英里之遥，从这个光源接收到的光线一定非常微弱，以至于人的眼睛必须像夜鹰的眼睛一样，才能在晦暗的黄昏中看到任何东西。上帝也许真的乐意按照这样的模型来构造眼睛，但即便如此，太阳在那里也会显得如此渺小，几乎只有木星在我们眼中的三倍大，以至于它几乎会消失在其他恒星之中。在那里，由于太阳光的威力和亮度只有它在我们地球上的三千分之一，所以那里的昼夜、晨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万物都会一直笼罩在单调晦涩的朦胧之中。在这样的世界里，诗意必然不复存在，真正的情感也不可能产生。

另外，天王星的轴心向太阳的倾斜度为 90 度，因此天王星的北极在一年中的二分之一时间（= 42 个地球年）里必须在太阳的照射下，而在另一个二分之一年的时间里必须没有太阳的照射！土星的四季条件确实更有利（因为它的轴线倾斜了 40 度），太阳在这里也会比在天王星上显得更大；但这颗行星很可能只是由水、冰和雪组成，因此不可能有类似人类的生物在上面生存；此外，它的密度只有地球的十分之一，大约是软木的两倍，因此其内聚吸引力非常微弱。此外，环绕它的星环在 15 个地球年的时间里给土星风雨飘摇的一半时间中投下了数百万英里长的阴影，因此它的居民必须每隔 15 年移民一次。木星的轴线几乎是垂直的，因此没有季节的变化，如果没有季节的变化，我们就无法想象真正的肉体存在，以及相应的职责和工作。如果环绕木星的星带运动是木星大气中云层的变化——虽然还不能确定，但已经有了猜

测，——那么我们就必须推断出风暴的存在，其速度为每秒 7000 到 11 000 英尺（而我们地球上已知的最猛烈的风暴的速度只有每秒 60 英尺），所以在这样一个风暴肆虐的地区几乎不可能有任何东西存在。小行星不过是更大行星的碎块，吸引力非常小，在这里足以抬起脚的肌肉力量，在那里却能把我们带到最高的建筑物之上，因此可以省略。在火星上的生存是最舒适的，但这只是因为它更像地球，而不等同于地球。金星的状况与地球非常相似；但金星的轴倾角为 72 度，四季变化极为突然。根据金星大气层的无云性推断，金星没有水，因此不适合有机生命的生长。水星的表面积只有地球的九分之一，对人类来说太小了，“他的祖国必须更大”。只有在地球上，我们才能看到可居行星的概念得以实现。其他行星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连续渐变：地球是最优秀的行星，是行星系统的目的论中心，就我们所能判断的而言，地球是太阳系中唯一适合高级有机生命发展的天体。

我们对太阳系以外的恒星世界知之甚少。我们可以假定，我们的世界属于一个庞杂的系统，我们的银河系以一些明亮区域为边界，其中心被梅德勒确定为昴宿星团，实际上就是阿尔西昂星。我们的太阳系恒星系统位于银河恒星世界中恒星较稀少的区域，其位置就像海洋中的一座岛屿——实际上并不在它的中心，但仍然靠近它，在这座巨大的世界之城的集市上占据着一席之地，与我们地球在太阳系中的位置并无二致。我们的恒星系统之外还有其他世界，但谁能探索它们或确定它们的界限呢？我们的确可以大胆猜

测，但仅此而已。

在现代，天文学所揭示的广袤空间与地质学所要求的广袤时间是并行不悖的。如果这种平行关系是公正的，那么我们可以问，既然各种地质构造的无数岁月在人类身上找到了适当的终点，那么宇宙中不可估量的空间不也同样指向人类的居所吗？人与时间的关系如此，人的居所与空间的关系也将如此。那么，影响整个宇宙结果的历史为什么不能在这里找到它的适当位置呢？如果上帝的主权在这里可以受到质疑，那么，反过来，它难道不应该也可以在这里得到伸张吗？如果这里需要仁慈的启示，那么它难道不应该在这里发生吗？此外，在这里进行的事情是为整个宇宙进行的，决定着宇宙的命运，因为它是上帝的行为，从根本上影响着万物。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这一事件的内在含义，而不是其发生空间的外在范围。

天文学无法从自身的资源中为这种观点做出贡献；而另一方面，她不仅没有反对这种观点，反而证实了这种观点，并提供了有利于这种观点的最有力的推测。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地质学。

首先，让我们来断言它的事实。地球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现在的样子，也不是一直是现在居住在地球上的生物所居住生活的样子，

而是逐渐形成的。这是地质学最确定的事实。因为无论我们根据冥王星理论把地球看成最初是一个炽热的球体，在逐渐冷却的过程中表面变硬，并被水覆盖；还是根据海王星理论把地球看成原始状态是含水的，并从中结晶，开始自我分离；它的原始状态仍然是一团混沌，但逐渐分解成其组成部分，并被植物和动物生命所覆盖，这些生命从低等生物发展到高等生物，直到最后形成“组织”以人类的出现而告终。

岩石和地层相继形成的顺序，部分是由其沉积的地点决定的，部分是由其包含的化石决定的，这些化石提供了逐步发展的大量证据。原始岩石不含化石。化石首先出现在所谓的过渡岩中，尤其是煤层。在这些岩石中发现了最早生物标本，如甲壳动物三叶虫、双壳贻贝、类植物放射虫、昆虫、鱼类、爬行动物等。但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其非凡的植被。石炭纪地层中埋藏着由巨大的马尾藻、树状蕨类植物，特别是棒状苔藓组成的整个植物世界。这种植被所覆盖的广阔空间，从水的饱和作用所形成的巨大煤田中可见一斑。仅英格兰东海岸就有 338,500,000 克拉的煤炭。此外，萨尔和鲁尔的大煤区、美洲的煤区，以及最近在俄罗斯发现的更为广阔的煤田，都是如此！这里被埋葬的世界植被该有多么丰富！相反，这里的动物遗迹却很少。石炭纪之后是三叠纪地层（变色砂岩、麝香白垩岩和变色泥灰岩）、侏罗纪地层和白垩纪地层，所有这些地层都被称为次生地层，在这些地层中也发现了植物化石，而动物遗骸则要多得多。这些动物主要是水中的居民

和两栖动物，即软体动物、鱼类、爬行动物，特别是有尾兽类，以及一些鸟类。哺乳动物在此之后才出现，主要局限于所谓的第三纪，并逐渐接近现存物种。熊、鬣狗、马、獾等是这一时期仍然存在的物种的主要代表，已被转化为泥炭的大片森林是这些物种被埋葬的纪念碑。第三纪分为冲积时期和后冲积时期，在后冲积时期，地球形成了现在的形态，并接纳了现在的居民。直到最后一个时期才发现猿类，然后才发现人类。

这就是地质学发现的一个非常概括性的概述；我们不仅不得不承认地质学家的勤奋、毅力和洞察力，而且不得不承认地质学所描述的地壳历史的主要特征可以被视为一个确定的事实。然而，《圣经》的叙述却看似与此明显对立，它表达的看似是对原始时代的“幼稚”看法，它让上帝像地球上的建筑师一样，建造了一个又一个部分，一块又一块，直到整体完成，而科学却向我们展示了一幅完全不同的图画。在这里，通过固有的力量和规律，从大自然的子宫里孕育出了逐渐上升的形态；而在地球达到目前的完美程度之前，已经经过了数以百万年计的无限漫长的时期。关于各个时期的所有巨大变化，以及变化多端的动植物群，我们从《圣经》中一无所知。

有人认为，这种矛盾必须得到承认。那么，如果推断连《圣经》的第一页都包含看似如此明显的“错误”，还值得翻开后面的几页吗？

那么，地质学和《圣经》真的如此对立和不可调和吗？

如果我们在一位久经考验的老朋友身上发现了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东西，或者听到了一些我们无法理解的关于他的事情，我们是立即断定我们错认了他，并谴责他；还是暂缓我们的判断，等到以后也许会为我们提供必要的解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圣经就是这样一位久经考验的老朋友。如果我们在那里遇到我们无法解决的谜团和矛盾，我们难道不应该谦卑地等待未来的解释，而不是草率地谴责它吗？而且，当我们认为某种含义必然与之相联系时，我们就能确定我们的理解是正确的吗？现在，这种反对声音被压制住了，在哥白尼之后的基督教信徒眼中，《圣经》与哥白尼之前的《圣经》一样真实。他们已经意识到，《圣经》的职责不是教导天文学，而是教导救赎之道；《圣经》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根据外貌来讲述天体的运动，这是普通人唯一能够理解的语言，而且至今仍在日常使用。那么，当哥白尼提出“天体运动”的概念时，难道没有其他的误解吗？

我们对《圣经》意思的错误看法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而不会损害其内在价值。因此，一方面，我们不应对我们的《圣经》抱有偏见，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必对科学研究产生不必要的、焦虑不安的不信任，也不必认为我们必须以《圣经》话语的外在权威来压制科学研究。探究和研究是人类思想的必然，也是上帝

的旨意。历史告诉我们，即使被禁止，人也不能停止这样做；历史还告诉我们，知识确实在进步。只要本着谦虚坦诚的精神进行探究，就不会得不到上帝的祝福。上帝喜悦真诚的人。人类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确实会遇到谬误。这一点不能也不必否认。自然科学领域中最深奥的研究者总是最愿意承认，许多现在被认为是确定的东西迟早会被证明是错误的。只有肤浅的人才会把一闪而过的观点当作定论；而把科学的实际或假定结果伪造成攻击宗教的武器，则是对科学极不道德的滥用。科学本身及其真诚谦卑的拥护者对这种行为是无罪的，只有那些走在把科学当宗教的道路上的人，才会试图这样做，而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埋下伏笔、反对启示的真理。

我们越是熟悉地质学研究，就越会发现各种假说、悬而未决的问题和不一致的观点。利希滕贝格曾说过，在他所能列举的有关地球形成的五十种假说中，十分之九属于人类思想史而非地球史，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所有人都必须承认，一种试图解释的假说甚至在几年后就被另一种假说所取代，而且即使在基本问题上也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和观点的多样性。下面仅列举几个最重要的问题：居维叶认为，地壳的构造、不同地层的错位、地表的隆起和凹陷、高度和深度，只能用地球剧烈旋转的理论来解释；——与此相反，莱尔学派（其权威性现在为大多数人所效仿）则认为，目前正在运行的同样的规律和原因从一开始就是如此，因此需要大量的时间，才能以如此温和和渐进的方式完成许多巨大

的变化，而这些变化的痕迹就在地球的怀抱中。——又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无法从这些不可估量的时间和持续不断的原因中找到任何宏伟的东西，他们要求迅速而剧烈的灾难和快速的发展，就像人类个体在出生前后几个月中所发生的那样，在这几个月中所取得的进步要比后来整整几年，甚至几十年所取得的进步还要大。有些人，如达尔文和他的追随者，坚持认为我们周围多种多样的有机体的发展是在不可估量的时期内，从一种或几种基本形式逐渐变化而来，直到人类为止；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观念只是一种“武断的”和“不科学的”假设，事实并没有对其提供足够的证实，他们认为，恰恰相反，有机生命的领域中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式。几年前，根据地质学研究的结果，大洪水看似发生在地球目前的状况之前，也早于人类的出现，与《圣经》中叙述的、各民族传统中提到的、但没有得到科学证实的大洪水似乎毫无共同之处，这似乎已被一些人宣布为既定事实；但是，现在人们相信，在阿比维尔和其他地方的砾石床以及在奥里尼亚克和其他地方的骸骨中的发现，迫使我们承认在以前的大洪水时期就有人类存在；因此，这些传统得到了证实，只需将其归结为更早的时期。

关于这一时期，人们仍然犹豫不决，以至于当库维埃满足于五六千年时，怀茨却在他博学的著作《民族人类学》第一卷第 336 页中，让我们在五千万年和九百万年之间选择地球上是否存在人类？这些例子充分说明，在他们的科学与《圣经》接触的那些方面，地质学家们自己离得出普遍接受的结论还有多远。然而，在

得出这些结论之前，无法对科学与《圣经》进行明确的比较，而每一次贸然试图协调两者的做法都很容易弊大于利。因此，我们将局限于目前科学水平所能做到的事情。

首先，一切都取决于正确的观点。《圣经》不是天文学或地质学手册，而是我们宗教信仰所依据的记录；《圣经》的作用不是回答科学探索，不是为我们省去科学研究的麻烦，甚至不是为科学研究提供便利，而是为了满足宗教兴趣。因此，在谈到世界的创造时，《圣经》给出的不是“科学”的描述，而是“宗教”的描述；我们最好不要在《圣经》中寻找不应包含的内容。

它的第一条真理是：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地质学的开端是一片混沌。关于这个混沌的起源，地质学什么也不能告诉我们。《圣经》比地质学的混沌更久远，它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了最初的物质本身，世界及其所有的秩序和美都由此逐渐产生。这是一个地质学根本没有触及的事实，因为它超越了科学的界限，地质学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否认它本身的资源；但这是一个对宗教具有最高利益和根本重要性的事实。

其次，《圣经》告诉我们，地球上的生命，植物和动物的世界，都有一个开端，而且是在大自然的力量和上帝的创造力的“合作”下开端的。上帝说：“地要生出来”，“水要聚起来”，“上帝创造了”。科学也告诉我们有机生命的开始，并且否认——至少

开明的科学否认——它的“自生”；除了承认更高的创造性力量之外，没有任何解释其起源的能力。

第三，《圣经》告诉我们，世界是在一个逐渐上升的系列中形成的，从一般到特殊，从不完全性到完美性，从无自由到有自由，不断向人靠近，直到在人身上达到其形成的目的和高潮。这也是一个具有重要宗教意义的事实，因为它表明，人作为上帝创造的目的，也是上帝特有的、最后的，因而也是他首先想到的——上帝自始至终都重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于这一点，作为一个纯粹的宗教问题，科学既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任何事情；但科学以最惊人的方式证实了这一结论所依据的前提，即有机生命形式向人类的逐步发展；科学研究的增加与这种证实的增加成正比。当《圣经》说地球最初被水覆盖，描述山丘和旱地当时出现，随后被植被覆盖；告诉我们水中有鱼，空中有鸟；陆地动物随后出现；创造行为以人类结束时，——这就是大致的特征和轮廓，其中只提出了主要的情况，而省略了附属的细节，这与地质调查所揭示的发展过程是一样的。

的确，有人对光的创造先于太阳，而太阳本身看似又被描述为在地之后产生的这一事实提出了异议。但是，科学在这些问题上所获得的常识——这些常识充其量只是猜测——至少可以说是有利于圣经记载的可能性。现在，光确实只来自太阳；但人们承认，在各种情况下，比如两种元素快速而强烈的化学结合，或者通过释放

电能，物体也会发光。

我们不知道这种原始光的性质，但我们知道没有太阳也可能发光。关于天体的形成，只有一种理论，即所谓的星云理论，它是由伟大的赫歇尔（Herschell）提出的，拉普拉斯（La Place）在太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巨大的独立蒸气球是由散布在朦胧太空中的大量气态流体形成的，之后这些气态流体被塑造成球体；我们的太阳系就是这样一个气态球体，在这个气态球体中，首先形成了外行星，然后是内行星，最后才是太阳，所以太阳肯定是在地之后才变成实体的。至于恒星及其形成过程，则无从谈起。所有这一切都与《圣经》的记载完全吻合。

只有一件事是科学所必须的，那就是，科学需要宽广的时间，这样她才不会被限制在也许只有六日，每天二十四小时，这是不可能的。罗杰斯（H. Rogers）称，仅在北美洲就有 6250 平方英里煤矿，在萨尔布吕克（Saarbruck）地区达到海平面以下 1.9 万到 2 万英尺；还有晚期的泥炭地，在特兰西瓦尼亚发现了一棵巨大的柏树树干化石，那里有 13 层泥炭层层相叠，据哈蒂格估计已有 3100 年的历史。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认为，上帝在创造它们的时候，只是给它们留下了逐渐形成的表象，这样我们的研究就可能被蒙蔽和欺骗，因

为我们能够说服自己，它们一定是逐渐形成的。当然，当我们考虑到这些情况和其他情况时，我们确实需要，即使不是莱尔学派所说的数十亿年，也需要极长的时间，而这正是地质学所要求的。至于我们如何理解“日”，即使是正统的神学家也没有一致的意见，因为“日”是在太阳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它们是否表达了漫长的时间，主的一天如同一千年，因此不是根据人类的计算来指定日子，而是根据宇宙的比例来衡量日子；或者我们是否应该把日子仅仅看作是一种形式，为了使主题更接近人类的理解力，否则人类的想象力可能无法理解那些创造的行为，而给它披上了一层外衣，——这一点是肯定的，在每一天的工作中，主要的问题不是日子，而是工作。因为宗教的旨趣不在于时间，而在于事实，即在于上帝以自己的意志和自由的爱创造了世界；他将世界塑造成一个不断上升的独立形态，直到人，在人身上达到了他创造工作的目的，并与人建立了精神交流的纽带。

如果说整个世界都是为了人类而创造的，那么它就不是与我们格格不入的东西，而是以与我们相似的生命与我们相遇，并唤起我们的共鸣。我们只能感觉到，没有我们，它的生命是不完整的；我们就是它的谜底。因此，大自然的所有声音都能在受造之人的口中找到回音。

人是宇宙精神的体现，人是宇宙奥秘的表达。那么，人在表达他的精神所感知的语言时，难道不应该是对世界之造物主的赞美

吗？

第五讲

人

《圣经》告诉我们，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这是上帝的能力、智慧和爱的自由行为；上帝在创造世界时是以人为本的。上帝关注的不是植物或动物，而是人。人是上帝特有的思想，是主宰整个造物神圣理念，是上帝本质旨意的实现。《圣经》表达了这一概念，它描述了上帝与自己的商议，而这种商议导致了人的形成。这里还涉及一个事实，即人的出现是一种新的事物；他与他周围的其他肉体生命有着特别的区别；它们对他来说只是初步的，而他是创造之工的最终目的和高潮，因此也是创造的终结。人就是这样出现在圣经中的。然而，现代科学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其中主要涉及人类的古老性、起源和统一性。

1. 目前，有关人类古老性的问题正引起人们最强烈的兴趣。根据《圣经》，人类的历史估计约为六千年，而现代科学的计算则是数十万年。当然，如果莱尔正确地断言，地球目前的形态是由目前正在运作的力量以无限缓慢的速度产生的，而人类属于地球形成的较早时期；或者达尔文坚持认为，人类只是由低等形态的极度逐渐改进而产生的，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把我们这个种族的起源移到一个创世以后的极其遥远的时代。据说这样的推论得到了一系列新发现的证实，现在人们认为，人类与穴熊、穴鬣狗、猛犸象等动物同时生活在地球上，而这些动物迄今为止一直被归入第三纪，即地球最后一次形成时代之前的时期。最近在比利牛斯山脉北坡的奥里尼亚克（Aurignac）发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洞穴。在这里发掘出了一个埋葬地，里面有 17 具人类骸骨、简陋的武器和装饰品，还有在那里举行的原始葬礼的痕迹。然而，与这些骸骨一起被发现的还有上述已灭绝动物的骸骨，因此，我们可以追溯到人类肯定还在与这些捕食野兽共同生活的时代。然而，问题是我们是否必须思考，是人类的存在更古老，还是这些动物的存在更古老？答案是毋庸置疑的；堆砌物提供了答案。

1853-54 年的冬天，人们在苏黎世湖中首次发现了建在水中的古代木桩建筑遗迹，此后每年都有类似的新发现。我们从这些遗迹中可以窥见我们大陆上最古老的文明。石头和骨头是欧洲第一批居民制造武器和器皿的材料。后来似乎出现了其他民族，凯尔特人用自己的钎子武器成为了原始居民的主人。这些建筑群中的居

民是在什么时候生活的呢？最近，在这些建筑中发现的黄铜甚至铁器越来越多。因而，即使在罗马时代，它们也仍然存在。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告诉我们，色雷斯早在公元前 500 年就有了桩基建筑；爱尔兰在中世纪也就有了桩基建筑；而在婆罗洲、幼发拉底河等地，即使在今天也有这样的住宅。此外，石制武器的使用一直延续到使用金属的时代。即使在公元 1066 年的黑斯廷斯战役中，盎格鲁-撒克逊人的长矛和箭上也有石尖。此外，与波罗的海（琥珀）和亚洲的交往痕迹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所有这些情况中得出结论，所谓的石器时代不会远于公元前一到两千年。因此，《圣经》中所说的大洪水时期之后，欧洲的第一批居民才从亚细亚移民过来。他们确实来自亚细亚，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事实中清楚地看出来：在这些堆积建筑物中发现的器具是用一种非常坚硬的石头——软玉制成的，这种石头只有在亚洲才能找到，甚至现在中国人还把这种石头高价卖给南洋的毛利人，他们的首领拿着这种石头制成的斧头作为与众不同的标志。

人们还尝试了另一种方法来获得人类古代化所需的几十万年的时间，在某些冲积层中发现的人类遗骸的年代是根据其在现有环境下沉积所需的时间推断出来的。例如，在密西西比河口的柏木层中发现了一个头骨，根据地质学计算，这个头骨的历史可追溯到 5.7 万年前。然而，没有什么比这些地质计算更不确定了。不久

前，在石勒苏益格东部海岸的桑德维特泥炭沼泽中发现了一艘载有许多古物的船只。根据地质学的计算，这艘船应该有数千年的历史，而在船中发现的某些硬币则表明，这艘船最早沉没于公元300至400年。冲积物的沉积速率是如此的不同，以至于它们嘲弄了所有这些计算；只要这种观点没有比它们所能提供的更可靠的证据，它就可以被视为一种完全未经证实的假设。此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各民族的传统和历史意识并不能追溯到公元前两千年。如果人类的历史是十万年而不是六千年，这可能吗？这是Cuvier的论点，至今仍未被驳倒。

所有的研究都证实了人类是所有生物中最晚出现的这一事实。然而，人类不仅仅是其世界的终结者，同时也是一个新世界的开端。人是心灵和意识世界的开端。这就赋予了人类相对于所有其他生物的地位，在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划出了一个本质区别。

2. 然而，与此相对立的是现代人提出的一种理论——达尔文及其学派的所谓嬗变理论——它把人与在他之前的生物，即高等动物种族，置于这样一种直接的关系之中，使人与被造物之间的区别不是本质上的，而是一种短暂的暂时区别。因为，根据这种理论，正是从一种或少数几种基本形式开始，整个植物和动物有机体的上升系列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通过渐进的方式产生。人类代表了有机生命发展的最高阶段。我们物种的这一谱系，逆向穿过动物世界，一直追溯到最卑微的植物，使类人猿成为人类的直系祖先，

也许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口味；但是，我们被告知，这种问题不能根据我们的口味来决定，因为我们的机体组织中也有许多东西可能并不完全符合我们的观念。我们确信，在人体的形成过程中，甚至在大脑的组织结构中，都找不到与动物机体之间的本质区别；甚至人类的机械本能也是野兽所共有的；全部区别在于大脑的某种更高的发展能力，通过这种能力，人类变得具有自我意识，因此，可以说，人类拥有了自己。

那么，我们是否已经到了需要认真讨论人与动物之间是否真的存在本质区别的地步了呢？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本身不就是一种区别的最有力的证明吗？人的思想不可能出现如此大的偏差，除非人的思想是如此“高级”，思想生活是如此自由，以至于能够沉沦到如此愚蠢的地步。

科学问题是物种多样性的问题，即在动物界和植物界的各种形态之间是否存在本质和固定的多样性。《圣经》将这一思想放在了叙事的首要位置，它在创世史中十次提到上帝按其种类创造了万物。达尔文假说不得不否认这种种类的多样性，否则，差异极大的植物和动物不可能相继从一个胚芽起源。然而，现代自然科学的所有重大研究都是建立在物种基本多样性假设的基础上的，观察告诉我们，大自然谨慎地维护着物种的基本多样性，以确保原始物种不因杂交种的贫瘠而退化。就我们的知识范围而言，不同的物种一直是不变的。埃及墓穴中的动物木乃伊，最古老的纪念

碑上的动物形象，与现在的形态没有丝毫差异。尼尼微废墟上描绘的骆驼和单峰骆驼就是今天的动物。地层中的发现也丝毫不能支持达尔文理论所要求的物种的逐渐过渡和分支。因此，即使是达尔文的追随者，如赫胥黎和他的译者布朗，也不得不承认他提出的证据不足。但是，除了自然科学的所有问题（这些问题必须由自然科学的教授们来决定）之外，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千差万别的有机体组织的生物都是通过纯粹的外部原因和盲目的机遇从一个假定的原始细胞中产生出来的，这怎么可能让任何有思想的人感到满意呢？根据这样的原则，又如何解释这一系列生物中普遍存在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呢？然而，比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道德方面的考虑。我们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用一个孩子的话来代替我自己的话。也许你们对已故普鲁士国王的轶事并不陌生：他在鲁根逗留期间，习惯于与孩子们一起娱乐，向他们展示各种物品，如石头、水果等，并问他们分别属于哪个王国（动物王国、矿物王国或植物王国），直到最后，他指着自已说：“那我属于哪个王国呢？”被问到的孩子回答说：“天国”。这就是区别所在。人属于天国，动物不属于天国。这就是它们之间的具体区别。人知道他的上帝，人有宗教信仰、和主，并向他祈祷。他的思想和意志应献给上帝；他的生活应为上帝服务。

动物只是感性的。人的存在虽然是肉体的，但却过着属灵的生活；虽然是短暂的，但却与永恒有关系；人在地上的时候就应该在与

天上交谈。

我们所反对的观点确实主张一种真理，即一切“存在”的联系——“存在”的体系。但这一真理也是《圣经》及其观点的概念，从《圣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人之前的一切不过是向人迈进的一系列初级阶段，因此，整个地球上的造物达到了统一。然而，在向人的这一上升过程中，《圣经》看到的是上帝的创造性行为，而不是单纯的自然发展。

3. 根据《圣经》，人是作为一个整体被创造出来的，并达到多重性。圣经的观点建立在人类统一性的基础上。自英国自然神主义时代以来，人们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各种反对意见，而最近又接受了多个创造中心的观点。

我们最深切的利益要求人类的统一。首先，基于宗教理由。人是上帝的思想的结果。但是，上帝不会让人以动植物的方式存在；他不会让人类有多个单个个体，而是让人类作为一个有机体存在。人类的一个大家庭——这就是种群的目标，也是种群历史的目标；但只有当种群的起源是单一的时候才是如此。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人类的历史才能有一个单一的中心。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唯一中保；他是人子，在他自己身上包含并代表了人类；他是历史的转折点，所有过去的历史在他身上终结，新的历史从他开始。但是，除非承认整个种群的统一性，否则他不可能成为人

类的中保和代表，他的工作和位格也不可能是对所有人的唯一救赎，罪也不可能是所有人都会继承的罪恶。

但这也是出于纯粹的人性理由和考虑。每个人的胸中都有一种直观的感觉，即所有人都是彼此相关的，都是兄弟：家庭纽带的要求无处不在。诚然，这种感觉最初是由基督教激发出来的，但这只是唤起了人类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其实是人类早就知道的，尽管他并没有有意识地承认这一点。人与人之间所有的相互虔诚和仁慈，所有不分彼此、视彼此为兄弟的真正人性，都是建立在这种同属一个大家庭的意识之上的。除非我们承认人类的统一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历史的统一性，否则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历史。如果我们接受（例如阿加西兹的观点）人类创造中心的多重性，相信人类是同时或先后在地球的不同地方产生的，就像松树在森林里、小草在草地上、蜜蜂在树干上、鲑鱼在鱼群里、水牛在牛群里一样，我不知道该如何理解人类的统一性这一概念，而它正是我们思想和道德生活的根本利益所在。

阿加西兹的这一学说不过是回到了古老的“自成体系”

（Autochthones）观念，即各民族起源于其所在的不同国家，这种观点的自然后果是民族的突然分离，而基督教通过教导人类的单一起源和开始，废除了这种分离。因此，这里讨论的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类利益与宗教利益同等重要的问题。

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问题虽然还没有失去它的重要性，但已经被那些关于人类的古代性和起源性的问题所激发的兴趣抛到了九霄云外。

特别是自从英国自然神主义时代以来，种族的多样性被作为反对物种统一性的论据。人们主要讨论的是头骨形状和面部角度的差异，从 90° 或 80° 到 70° 不等。所有其他的种族差异，看似都与这些头骨形状和面部角度差异有关，并依赖于这些差异；这些差异不是由于偶然的特殊性，也不是仅仅由偶然的外部环境（如热量等）引起的，而是似乎相互之间有着共同的联系。因此，某些种类的特殊性总是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人类种族的各种类型。因此，问题在于：人类是一个物种还是多个物种？换句话说，人的各种族之间的关系是否与马的各品种之间的关系相同；或者，他们是否像马和驴一样彼此不同？

人们从纯粹的科学角度提出了支持人类物种统一的有效论据；其中最重要的论据是，不同物种的动物混合产生的杂交种——例如驴和马——总是不育的。骡子不能繁殖，但这一点普遍不适用于人类的混血种族。因此，人类的不同种族并不像马和驴那样形成不同的物种，而只是形成不同的品种，就像马的不同品种一样，可以随意杂交。人类同一种族的这些变种的差异只是外在的。它们只涉及毛发、皮肤的颜色和头骨的形状；而这些只是外在的东西，环境可能会改变它们，而且可以证明它们已经改变了。例如，现

代和古代的白发德国人在外表上就有很大的不同！现代马扎尔人也尽可能地不同于他们的祖先古代匈奴人；匈奴人在我们的印象中是如此可怕，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现在的马扎尔人与他们毫无相似之处。只有“在匈牙利的一些偏远地区，人们才会看到匈奴人特有的丑陋”。此外，文明甚至改变了身体结构，这是不争的事实。智力的提高会带来身体的改善，反之，人甚至会在身体结构上退化。与这一切相关的事实是，任何一个种族的特征都不是该种族的基本特征，也不是该种族独有的特征，而是短暂的，只有通过中间的程度才能形成对比。无论是明确的头骨和骨盆形状，还是头发和眼睛的颜色，或是任何其他具体特征，都不专属于任何一个种族；而在同一个种族和同一个民族中，往往存在着最大的差异。德国男性头骨与女性头骨在大小（水平周长为 100.97，脑腔大小和重量为 100.90）上不同，在典型特征上的差异也更大，其程度远远超过不同种族头骨之间的差异。然而，所有这些细微的差别，实际上远小于同种动物之间的差别，如马和狗等。身体的内部结构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完全相同的。尽管白人和黑人在其他方面可能各不相同，但在这一点上却完全一致。最后，他们的心理结构也到处相似。在任何地方，我们都能发现相同的性情、相同的心理素质、相同的激情；所有人都相互依存。的确，人和动物的智力水平并不相同；但是，“动物和人在生理方面的差异是本质的和具体的，而人类种族之间的差异则只是量的差异”。

图森-奥维杜尔 (Toussaint l'Ouverture) 的例子足以证明，即使是黑人也有智力天赋；谁会认为莎士比亚笔下的奥赛罗

(Othello) 是一个不可能的人物呢？那么，仅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至少必须承认人类统一的可能性；而一系列最著名的自然哲学家，如哈勒、林奈、布冯、居维叶、布卢姆巴赫、鲁德、瓦格纳、安德烈-瓦格纳、A. 瓦格纳、洪堡 (A. Von Humboldt) 等都承认了这一点。比较语言学至少正在接近这一结果。这里仅举一个很好的例子：印度-日耳曼民族起源的统一性已被印度-日耳曼语言的同一性所证实，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他们各自的语言结构是相同的，而且存在大量的共同词根。历史调查也向我们展示了相距遥远的民族在传统上的惊人巧合。原始时代的圣经传统在北美印第安人的传说中重现。美洲和南洋群岛在地理上肯定给传播造成了巨大的困难。但就在这些困难最大的地方，即南海群岛，我们却发现了语言和地理上的关系。至于美洲，北亚和北美洲的部落之间仍然保持着活跃的交往，跨越阿留申群岛——这两个大陆之间的桥梁。

有人从道德角度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种观点推断出了兄弟姐妹的婚姻，使人类历史从乱伦开始。但这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原始家庭不仅代表家庭，也代表种族。因此，它不仅包括亲人圈，同时还包括所有的差异，这些差异在发展过程中被分解和扩散，是完美婚姻的先决条件。因此，我们不必把第一个家庭的感情拘泥局限于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如果这个家庭代表了人类，那么它

的怀抱中就包含着人类的感情，这种感情包含在相识、友谊和婚姻的纽带中。这些都是造物主从一开始就植入人类胸中的，并将逐渐发展。只有当家庭发展成为种族时，这些关系才能根据其多样性加以区分。直到那时，兄弟姐妹之爱和夫妻之爱之间才会出现割裂，而现在，如果不违反自然法则，就无法逾越这道鸿沟。

然而，有人反对说，人类不可能在《圣经》所假定的那么短的时间内变得如此广泛，例如，在亚当和挪亚之间，以及在挪亚和亚伯拉罕之间，这种反对意见首先是一种相对次要的反对意见，因为它仅仅涉及到一个年代问题，就所涉及的基本利益而言，是需要相隔一千年还是一万年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其次，对繁殖可能性的计算可以反驳这一观点，计算表明，即使经过 16 个世纪，一对夫妇的后代也可能达到十亿，而目前人类的数量不超过 13 亿。美国进口的家畜也从单个或少数标本开始大量繁殖。

4. 根据圣经的观点，人是身体和灵魂的结合体。我们是有肉体的生命，这是直接经验的事实；我们拥有灵魂，是我们生命中的精神力量，这是直接感受的问题。圣经将身体描述为最初存在的，是最基本的。每个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就身体而言，人属于肉体世界，是肉体世界的终极者。他的身体是物质自然的再现，物质自然的各个部分在这里以更高的等级重复出现，并结合成一个完美的生命有机体。圣经观点的特点是，虽然它没有把身体作为人的本质，但却把它视为人的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在以

下两种观点之间占据了中间位置：一种观点认为身体是人的全部，因此死后的生命就像荷马所说的那样，退化为一种忧郁的、影子般的存在，其必然结果就是箴言“让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我们就死了”；另一方面，柏拉图的唯灵论观点认为，身体是监狱和枷锁，从身体中解脱出来，进入纯粹的存在状态，这就是人的幸福，也是一种不能太快实现的圆满——这种学说的直接后果就是自杀的委曲求全的智慧。根据《圣经》的观点，肉体对于人的完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对于人现在或将来的完整幸福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的完全分离，以及因死亡而沦为纯粹的精神存在，是人类最病态的状态，只有当灵魂与肉体恢复真正的和谐时，人类才能重新获得真正的健康。

然而，身体对于人来说并不仅仅是必不可少的，它还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整个精神生活都植根于这块肉体土壤，并以身体机体为工具。精神没有独立的作用力，它只能通过身体并在身体中发挥作用。它只能通过其必要的工具——身体——来表现自己。因此，身体的每一次紊乱都会通过反作用力在精神习惯于表现自己的方式上产生相应的紊乱。我们所说的精神疾病，因为心灵的表现方式似乎受到了干扰，但实际上是身体的紊乱。正是其肉体工具的失调让心灵显得紊乱。当乐器的琴弦失调时，尽管乐曲是正确的，演奏者也能准确无误地演奏，但演奏出来的效果却是不和谐的。因此，我们必须理解老年人的智力迟钝。这是身体机体拒绝履行其职责，而心灵在其外在表现上受到阻碍，便退回到自己的秘密

世界，透过身体的面纱，我们几乎看不到它的存在。它并没有真正萎缩或减少；出错的只是身体机体的外在表现和工具。

圣经的观点承认唯物主义思维模式的部分真理，同时另一方面又表明自己绝不是唯灵论的。

5. 但圣经对灵魂的论述肯定不亚于对人的论述，灵魂是人身上独立的精神原则，而不仅仅是身体器官的功能；人也是通过灵魂与上帝建立关系和联系的。自古以来，最简单的观察得出了这一学说。因为人有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外在的、感性的、表象的；另一个是思想和情感的内在世界，它超越了感官的领域，使我们感知到人与超感性的心灵世界的联系，而心灵世界的中心就是上帝。灵魂存在的学说是一切宗教、一切道德，乃至一切崇高的、智慧的人类生活观的必要前提。如果人没有灵魂，那么人类生活也同样没有灵魂，没有诗歌的灵魂，没有每一种崇高情感的灵魂，没有心灵相通的灵魂，没有道德意识和道德努力的灵魂，最后，也没有在上帝里面和为上帝而生活的灵魂。总之，整个世界不过是一个鲜花盛开的墓地。然而，我们的感觉直接保证，我们确实拥有灵魂，即独立的精神生活原则，它确实与身体原则紧密交织在一起，但既不与纯粹单独的身体原则完全相同，也不与纯粹单独的精神生活原则完全相同。

灵魂与肉体交织在一起，但既不完全相同，也不仅仅是肉体的表

现形式。

但有人说，这一切都是错觉，除了物质生命之外，不存在其他生命。毫无疑问，你们还记得鲁德-瓦格纳（Rud. Wagner）对唯物主义观点的攻击所引发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激烈争论。尤其是瓦格纳对唯物主义观点的抨击，以及卡尔-沃格特在大约九年后的回应所引发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激烈争论。让我们静下心来思考一下这种心理学上的唯物主义！

灵魂的概念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它存在于所有民族和所有文明阶段。因此，它是一个必然而非偶然的概念。那么，如果它不是相应现实的表达，它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没有什么比灵魂的存在更让我们确信无疑了。我们确信灵魂的存在，就像确信上帝的存在一样。试图否认它是完全徒劳的。我的怀疑和否认本身就彰显了我内心的思想力量，因此也彰显了思考的精神原则。正如有人曾试图否认我们无法不认识的上帝一样，有人也曾试图否认灵魂的存在。这种否定成为了完全物质世界观的出发点。

但是，这种在上世纪末复兴的观点，是古代世界早已熟知的观点。它建立在感官主义的基础之上，即建立在把感官的知觉作为一切真理的基础的哲学之上。

——它建立在感性论的基础上，即把感官的知觉作为一切真理的

基础的哲学，并提出了一个普遍的格言，即只有感性的现实和真理，因而也只有感性才是一切真理知识的源泉。

感知论、感性论，——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给这些观点赋予了一种连贯的哲学形式。自然科学领域的唯物主义鼓吹者们只是对费尔巴哈的命题进行了再呼应；在所有这些学者的著作中，几乎找不到一个命题是费尔巴哈以前没有品评过的。这些观点的总原则是否定超感性，正如维尔肖等人所承认的那样(Archiv. f. Pathol. Studien, ii:)。一个自然哲学家只知道身体、和身体的属性；超出身体、和身体属性的东西，他都称之为超感性，并将超感性视为心灵的偏差。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我们所谓的心灵不过是物质的中介；所谓的灵魂不过是神经过程总和的统称，正如一位生理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一堆尘土，就像被扫到一起一样，又重新散开了，“它本身实际上就像它作为其功能的器官一样是物质的和必死的”；思想是大脑的产物，大脑的质量决定思想的性质。儿童的大脑尚未发育成熟，因此他的思想也是如此；老年人的大脑已经萎缩，因此他的思想也是如此；妇女的大脑周长和重量较小，因此她们的思维能力也不如男性。影响大脑的疾病也会影响理智。大脑生病就是精神疾病。当动物被剥夺了大脑的单个部分时，它们也就随之失去了部分智力，因此也失去了灵魂，就像被零散地夺走了一样。因此，我们所说的思想、灵魂、心灵只是大脑的产物，就像胆汁是肝脏等的产物一样。大脑是思想的秘密，大脑中的磷就是思想。没有磷，就没有思想。因此，一切都取决

于物质质量，而质量则取决于大脑的营养，也就是一般的食物。

“人吃什么，就长什么样子”。人是父母、乳母、地点、时间、空气、水、声音、光线、食物和衣服的总和；人的意志是所有这些原因的必然结果，并受自然法则的约束。思想是运动中的物质，是大脑物质的位移；甚至意识也不过是物质的一种属性。罪是不自然的，而不是选择作恶（莫莱肖特）。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罪，因此也就不存在惩罚的公正性。理解一切，就意味着原谅一切。”因此，道德不复存在，伦理学也变成了票据。

的确，有个别唯物主义的拥护者反对唯物主义的最终结果。维尔肖和伯迈斯特等人认为，他们可以把道德自由和责任与这一学说结合起来。但是，尽管这种不一致让他们感到光荣，却并没有因此而解决根本问题。只要对超感性的信仰被视为心灵的失常，那么任何试图摆脱唯物主义原则结果（即，道德不再有隽永终极的价值）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这些观点（即，唯物主义体系中对于道德隽永价值的否定）比人们想象的更为广泛。它们与时代的倾向不谋而合。不可否认，以自私自利为动力的功利主义是当今世界的统治原则，而唯物主义正是这种原则的科学依据，因此，它们如此一致并不奇怪。

唯物主义从两个基本概念出发，即一切知识源于感性认识，以及我们所谓的心灵等是物质的一种机构。然而，这两个命题都是轻

率的断言。

如果说所有思想都是感官印象的产物，那么就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思想，而只有概念。然而，我们甚至对那些不是感官对象的事物也有思想；我们有与任何物质无关的观念，这些观念具有纯粹的理智性质；不，我们有绝对的思想，在这种思想中，我们完全离开了事物和感官的世界。我们形成的判断和结论显示出一种独立的心智能力；不，我们对感官上显而易见的事物进行批判，从而在内心产生与感官印象相反的信念。此外，我们不仅思考作为感官对象的事物，我们也思考我们的思想本身，而这些思想对于感官来说当然是不显而易见的。因此，思想不仅仅是感官印象的结果，也是独立的精神原则的结果。

接着，唯物主义又说，我们所谓的思想、灵魂、理性等等，都是大脑的产物；思想的质量取决于大脑的质量；灵魂只是肉体机体的一种功能。好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思想都是必然的，而我无法改变我的思想，就像无法改变我的大脑一样。那么，我们也必须停止让一个人改变他的观点或让他有更好的思想的一切努力，因为他的思想不可能与他头脑中的物质大脑的思想不同。因此，我们很难理解，如果我们的思维不可能违背大脑的指令，唯物主义者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机写书来说服我们接受他们的观点！他们当然应该用一些截然不同的方法来引导我们进行更好的思考。但是，我们要问，难道逻辑对所有人、在任何情况下、

在任何气候下、在任何生活方式下等都是是一样的，因此是一种与大脑质量无关的思维行为吗？难道真理和知识与年龄无关，与大脑的发育或萎缩无关？难道宗教和道德真理在人生的各个时期不都是一样的吗？不，我们知道，在极度衰老时，甚至在临死时，当大脑已经完全萎缩，开始拒绝行使其职能时，思想却可能会发生最显著的提升；历世历代的人们都赋予临终遗言以特殊的重要性，这就是灵魂与大脑功能并不相同的明证。

当然，大脑是思维的器官，是心灵的工具。但是，每件乐器都需要一个演奏者，否则，即使所有的和声都包含在它的琴弦中，而且它能够表达所有的音乐思想，它也只能是无声的。唯物主义混淆了活动的必要条件和原因。大脑是思维活动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其原因，不是思维原理本身。这种学说的基础就是把精神活动的器官当作精神生活本身的原因。因为我只有通过大脑才能思考，所以就推断出是大脑本身在思考。李比希在他的《化学书信》中特别指出了这一“谬论”。然而，唯物主义学家沃格特却感叹道：“你能不能让我们看一下灵魂！”。那就让他（沃格特）也给我们展示一下他的理性吧。没有显微镜能让我们看到心灵，难道这就是心灵不存在的理由吗？我们怎么知道显微镜下的世界就是整个世界？为什么非得要显微镜是我们认识心灵的媒介？难道人与人之间没有依恋、忠诚或友谊，没有情感或情绪，——就因为解剖学家的手术刀在人体中发现不了这些难以察觉的力量？我们有什么权利把通过显微镜和手术刀得到的感性认识作为一切事物的

唯一标准？

将一切理论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是当今的合理努力之一，正是这种努力在法国催生了一种特殊的哲学，即奥古斯特-孔德 (Auguste Comte) 所谓的实证主义。而且，这场运动在世界各地都有追随者，尽管不一定有这个名称。人们只承认事实，而普遍摒弃早期的空想理论和抽象推测。然而，事实的范围超出了感官所能看到的范围。有些事实的确定性并不亚于感官经验；有三种事实对唯物主义观点具有彻底的破坏性，它们是精神、道德和宗教意识的事实。

第一个事实是思维的事实，尤其是自我意识的事实。如果所有的思想都是大脑自身的产物，那么它又是如何让自己思考的呢？大脑只是一个器官，是谁让这个器官运动起来的呢？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本身并不是感官所能感知的。这种动力必须是一种与其效果相应的动力，也就是说，它必须是一种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力量产生的最高效果就是自我意识。既然这是人的一种精神行为，在整个地球上的其他造物中完全是无与伦比的，怎么能说这只是大脑的作用呢？即使在动物中也能找到类似于思考和判断的东西；但自我意识，即人将自己与周围的一切分离开来，并在与自己的合一中理解和思考自己的最纯粹的精神行为，是一种特殊的行为；它是一种绝对崭新的原则，它使人类远远超越了其他所有生物。这种自我意识在人类可能发生的一切变化（无论是外部变化还是内部变化）中都保持不变。把从所有物

质中抽象出来的东西称为物质的产物是荒谬的。

第二个事实是道德意识；因为我的良知或道德意识就像我的身体一样是一个事实。它不是劝说、教育或培养的结果，而是一种内在的道德声音，它能感知地回应来自外部的每一个道德证词。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能在人的身上发现这种道德意识。它可能被掩盖或被扭曲，但它仍然存在；它仍然是一切扭曲中的基础。

宗教意识——人对更高力量的内在吸引力，由他的意识所反映和证明——这种证明既无法反驳，也无法回避，无论人存在于何处——也不失为人的精神生活中的一个事实。即使宣布它是错误的，也必须承认它存在的事实，并解释它的可能性。然而，如果除了物质的产物之外什么都不存在，那么它就是不可能的。

人类的整个高级生活正是依赖于上述这三个事实。然而，唯物主义否定了这种更高层次的生活，却给我们换来了人性的野蛮化，认为人类把自己高高地凌驾于野蛮的造物之上，不过是一种骄傲的自以为是。

6. 圣经对人的本质和命运的看法是何等的不同！圣经认为人是他的世界、即尘世造物在更崇高意义上的再现。人一直被称为一个微观世界；这在物质上是真实的，在精神和智力上更是如此。生命充斥着整个自然界，但它在人身上达到了最完美的程度。人是

自然界前面所有层次的目标，因此也是它们的决定性法则。人是所有等级所依据的先存理念，在不断上升的系列中接近人之后，最终在人身上得到实现。因此，所有较低的等级都被储存在人体内。

正如《圣经》告诉我们的那样，创世神工的前半部分是以植物世界结束的。在这个世界里，大自然第一次获得了有机形态和发展。前半部分结束时的植物与后半部分结束时的人类相呼应；人类的身体，这个最高级的感官有机体，是第一个生长的有机体——植物——的更高级的对应物。即使人的身体也显示了他的崇高命运。其奇妙的结构处处证明，他注定要过最崇高的尘世生活，过精神生活；他的外在形态处处体现着心灵的存在。他傲然挺立，以大地统治者的姿态踏上大地。他脚踏实地，却昂首向天；他的目光眺望远方，掠过广阔的地表，直达匆忙的云端。在他的面容上，有一个无形的思想，并赋予它千变万化的表情；在他弯弯的眉毛上，有思想在支配着，在他变化的嘴角上，有感情在嬉戏着，而从他的眼睛里，则说出了一个隐秘生命的秘密。这种精神生活甚至表现在身体的各个部分；有人公正地指出，他的手显明了地球之王。在地球上所有的肉体形态中，没有任何一种形态的结构在奇妙性和重要性方面能与人类的身体相提并论。人的生命在他体内激荡，并产生了他肉体存在的各种活动，是所有不断生长的肉体生命在更高程度上的再现。

动物界出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即感官和本能、感情和欲望的世界。而这整个感官世界，这种感觉和本能的生活，在人类身上也得到了和谐的融合。那些在动物世界中被分割和分配给个体动物的品质，在人类身上得到了和谐的融合；人是动物界更高尚的对应物，不过，他被提升到了精神自由的领域。他的所有感官、本能和情感，无论其本质多么感性，都被灵性化、高尚化，摆脱了对必然性和激情的服从，升华到自由的领域。虽然它们（人的肉体属性和品质）不再是统治者，而变成了臣民，但它们丝毫没有失去力量和活力。恰恰相反，正是它们屈从于心灵的力量，才使它们变得更加崇高和脱胎换骨。

但是，人之所以是动物世界更高尚的对应物，只是因为在他身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原则，使他远远超越了动物生命的最高阶段。人有一个理性的灵魂，即人格。这在整个有机生命圈中是全新的。人的精神禀赋和力量世界是统一的，一方面，这些禀赋和力量植根于感性有机体，另一方面，这些禀赋和力量又统一于一个内在的点，在这个内在的点上，合一生命与自我本身形成了内在的统一。环绕在自我周围的天赋和力量构成了它的合一有机体，也就是由自我操控的多器官工具。自我是统治者，作为一个自由的全权代表和发令者来支配身体中的一切。在“自我”中，人与自己同在，并从“自我”中展现自己。这个“自我”的基本表现形式是有意识的思想和自由意志。

人拥有思想。拥有思想，使他是神性的一部分。动物有感觉、观念、冲动等，但思考，也就是所谓的思想，只属于人类。一切存在都建立在思想之上；因为正是上帝永恒的思想在这个世界上展现。因此，人也是按照神的样式拥有思想，并能够实现这些思想（圣经告诉我们，人在宇宙万物中是最特殊的，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正因为人有思想，所以人也有语言。因为他说话的事实就是他思想的外在表现。思想是心灵的内在语言，它以语言的形式表现出来。动物不会说话，因为它们不会思考。它们的语言只是对感觉的一般表达，因为它们的灵魂生活并没有超越感觉，而人类的灵魂生活则延伸到了思考。然而，人的思维不仅仅具有个体意义，而且在他的思维中蕴含着普遍真理。逻辑真理是普遍有效的。在逻辑真理中，人将自己的精神生活从个体提升到集体，在与集体精神生活的联系中过自己的精神生活，对集体精神生活进行推理，并用逻辑真理表达集体精神生活的基本规律。但是，人不仅要思考一般精神生活的这些形式法则，还要思考它的物质真理——真、善、美的一般观念。人知道、并思考着思想世界，它起源于上帝，并在这个感官世界中得以实现；这表明他的家园不仅是这个世界，还有一个更高的世界。他想到了永恒；他想到了上帝——这表明他注定是永恒的，是属上帝的。因此，人类的思想从最低级到最高级，同时又与自身保持一致，并与自身结合成一个统一体。人思考自己，从而使自己的存在成为他意识中的事实。

人有思想——对至高者的思想和对自身的思想。这是人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人有自由意志。动物有本能，人有意志；换句话说，决定他的不是任何脱离他自身的东西，不是仅仅来自外界或他自身本性的影响，而是他的行为最终来自他自身。人的内心有一定的自由，任何外来的力量、人的本性的情感——不，即使是最强烈、最热烈的情感、人的个性特征的影响、习俗的力量，都不能侵犯这个自由，不能决定人的意志或行为，以至于他在做什么事情时都是不能不这样做（即，人在一定范围内有着一种不可侵犯的自由，可以选择做或不做一些事）。尽管人可能会受到外在环境、内在情感或推动动机的影响，但最终做出决定的还是人自己的决心。他自愿行动的能力证明了他的自由，即使他允许自己在行动中受到动机和环境的引导和决定，他的自由也不会改变。因为并不是这些动机和环境替他决定；否则，他的所谓“意愿和行动”就仅仅只是必要性法则得以实现的形式。

他是通过自己的自由自决行为，使自己的意志适应环境，而不是从环境中抽离出来。他的行为的最终原因是他的决定；不是他必须、不得不做，而是他愿意；不存在“被迫愿意”（es gibt kein Wollenmüssen）这回事。在个别情况下，他甚至可以立志；他也可以立志不做；他可以选择。意志意味着作出自由的决定；而这种自由意味着能够作出该决定的力量，即选择的力量。所有的责任和道德义务都取决于此。我可以不做我所做的事，我也可以做我不做的事；我的行为是我自己的自由选择。在这一点上，人

与上帝相似。因为上帝的最高境界就是，他是自己的主人。人也是如此，他是按照上帝的样子造出来的，他通过自己的意志成为自己的“主人”。

现在，这种自由意愿最需要的是“意志”的力量。光有思想和丰富的智力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意志的力量。意志薄弱是一种不幸；当它成为一个时代或一个种族的特征时，它就是公共的不幸。“只有在意志中才有帮助”。因为意志是行动的力量，只有行动才是真正的生命。意志的力量必须得到教育和培养；在我们这样的时代，这一点加倍必要，因为“思想的苍白”会使生命变得病态；而另一方面，不断进行的批判性思考则会像锈一样紧紧抓住意志的金属，夺走它所有的锋芒，——当追求千变万化的智力享受使意志消沉，使意志失去精力充沛的行动所需的专注力时。但是，仅仅意志坚强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意志的独立性——这种意志既不屈服于、也不毫无抵抗地暴露在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影响之下，不屈服于时代的趋势、时代的观点，甚至不屈服于自己的本性的力量。一个人必须是他自己，必须有保持正直和忠实于自己的意志，换句话说，他必须有品格；因为品格是意志和行为中决定性的、深刻的自我一致性。然而，最重要的是品格的道德品质，人的上帝般的真理应该由此得到彰显和表达。正是这一点使人的品格真正具有道德性，甚至像上帝一样。我们可能会对前者感到惊奇，但我们只能爱和信任后者（即，人的优秀品格是罕有的，而神的圣洁纯全则可以让让我们永远倚靠）。在道德人格和品

格中实现了一种理念；而人所能实现的最高理念就是上帝对于他的理念。这种与上帝的一致性就是人格的真理，人的人格也在此得到完善。

这样，由肉体 and 灵魂、灵性的肉体机体和自由的人格构成的人就占据了双重地位：——他与上帝的关系，他与世界的关系。就世界而言，他是世界的主宰；就上帝而言，他是上帝的形象。

他是两个世界结合的纽带，——感官世界和超越感官的更高世界。

他是世界的再现，是一个微观世界，是自身的一个小世界；但他又是一个高于世界的综合体，是一个有个性的世界，因此也是世界的自由主宰和主人。甚至他的外表也在宣告他的统治权。人的实际状况确实常常是残缺不全，令人怜悯；但他的原始特征虽然已被毁容，却仍然可以被辨认出来，而这些特征显明了他潜在的属灵身份。诚然，我们依赖于自然的力量，在这些强大的自然力量面前软弱无能；但在我们所有的软弱和依赖中，我们有内在自由的意识；虽然被征服，但我们在精神上胜利；虽然被打倒在尘土中，但我们在精神上翱翔，超越星空。人是万物之主。他之所以是万物之主，首先是因为他的知识；因为知识是权威的标志和行使。通过我对任何自然事物的知识，我在内心深处成为其主人，使其成为我的财产和我的臣民。通过知识，人类在世界上占据了先知的地位。他的思想深入事物的本质，探究其最终原因。他将

世间万物—感官所感知的万物—转换成心象，在心象中，真理脱离了包裹真理的外衣；他超越感官的限制，进入心象世界，即感性事物的基本类型，从而抓住了蕴含在易逝事物中的永恒真理。

永恒的真理。这种知识目前还模糊不清，在生命中也只是片面的；但即使在我们目前所拥有的片段中，也能看到先知者的思想乘着思想的翅膀，以比光更快的速度，沿着这个世界的轨迹翱翔，飞出时间，飞向永恒。没有什么是他的知识无法触及的，也没有什么应该被排除在外。如果试图限制人类对知识的热爱，或为知识的获取设定界限，那将是对基督教和救赎的错误忧虑。使人骄傲膨胀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没有真正谦卑、自我放弃地热爱真理的知识。整个世界赐予人类是为了让他统治世界，而他统治世界的第一种表现形式就是他对世界的了解。

但他统治世界的第二种形式是，他应该让他的世界真正臣服于他自己。他的知识就是力量。他头脑中的知识必须成为他手中的权力之棒，命令自然界最隐秘的力量服从他的意志，把它们像训练有素的骏马一样绑在他的战车上，让他乘着战车凯旋而归，穿过整个地球，在穿过最偏远的草原，驯服自然界最顽强的力量之前，他不会停顿，也不会休息。就这样，他的理性和意志支配着世界，他的知识和力量征服着世界。他用知识和意志的力量征服了这个世界，同时它（自然世界）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反映在他的想象力中，再现于他的感情中。它（自然世界）作为一个图像世界、

一个声音世界、一个情感和感觉世界存在于他的内心。整个外部世界在内心的小世界中找到了回声，并以各种艺术形式再现于绘画、音乐和诗歌之中；作为世界的智慧反映，经过照亮、美化、灵化和幻化，超越了现实的外部世界。在模仿的过程中，人类与造物主相似，以肖像画的形式再现了伟大建筑师最初创造的世界。

正是通过这种知识和力量的多种形式，人类完成了他在尘世的使命。

但人类并不只属于这个世界。他的精神居住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边界上，这个世界投射到我们的今生，并拥有比我们的自然生活更多的美好法则。我们的目的地不是在今生，也不是在文化及其进步中达到目的。我们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地，只有在那里我们的灵魂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这个目的地指引我们超越时间和空间，指引我们走向上帝。可以说，更高的世界问题，超自然的问题，是这个时代的问题。但这个时代的趋势是否定它。这个可见世界向我们敞开了如此丰富的领域，以至于我们被诱惑，以为这就是存在的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但是，否定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就是人类的堕落。它剥夺了人的最高荣耀，因为人的最高荣耀在于进入那个精神世界；上帝是那个世界的主，耶稣基督是那个世界的启示。这种否定是对人的本质的误解。因为我们的本质就是内心永恒；我们为永恒而生。我们应该把这种永恒带入这个易逝的世界，并给它留下深刻的印记，使它成为一个装满永恒

宝藏的容器。我们虽然身处这个短暂的世界，却注定要进入永恒的世界，也就是上帝的世界，这是我们最高的尊严。我们是这个有形世界的先知者和君王，同时也是永恒世界的祭司；因为作为祭司，我们崇高而光荣的职责就是将我们先知所知道的、和君王所掌管的一切——我们内心世界的精神意象和情感，——我们用创造力将其塑造成美的形式、声音和语言，——献给上帝，因我们是按照他的样式被造的，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而被创造的。人与世界的真正关系在于人与上帝的关系。如果说人是一个小世界，那么人同时也是一个上帝，是上帝在世上的代表，将自己（人）和世界献给上帝，成为上帝和世界之间的活纽带。换句话说，人的最高归宿和真正的生命是宗教。而宗教的目的就是成为世俗生活的灵魂。

=====

=====

=====

=====

=====

=====

第六讲：宗教

宗教信仰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它在所有民族中都存在。无论多么

变态、异化、堕落，到处都有一种共同的冲动，一种普遍的本能，它在宗教形式和仪式中寻求满足、并表现出来。普鲁塔克说：“你可以看到没有城墙、没有法律、没有钱币、没有文字的国家与民族；但是，没有神、没有祈祷、没有宗教活动和祭祀的民族，是没有人见过的。”因为神的存在意识无处不在，人如果不把自己与神的某种关系归结为是属神，就不可能想到神；这就是宗教。宗教的普遍性证明了其内在的必然性。它不是人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的概念。他们不能不拥有宗教。它不是个人的发明，也不是别人说服自己信奉的。它就像吃饭、喝水、睡觉或说话一样，不能称之为发明。它是一种自然的、内在必然的东西，根植于人类的本源。

正如上帝的观念植根于人的本性一样，这种观念也必然预先假定了人与上帝之间的真实关系，人知道自己来自于上帝，也知道自己归属于上帝，并承认上帝是他存在的理由和目的；这就是宗教。宗教是人不可剥夺的固有财产。人的存在本身就预示着对宗教的渴求，对上帝的追寻。因为上帝将成为人的上帝，而人将成为上帝的人。上帝有一种内在的趋向于人的倾向；因为他希望人的存在：人是上帝最初和最后的想法，是他意志的体现，是他心中的挚爱。在人里面有一种向着上帝的内在倾向；因为人是从上帝的旨意中产生的，人是由上帝造的，也是为上帝造的。上帝的旨意是人存在的理由，也是人生活的法则和努力的目标。上帝是人最深切的需要，是人的最高目标，也是人不断追求的目标。人必须

奋斗。活着就是奋斗。不奋斗的人就不再活着。但人不仅要奋斗；他的奋斗必须指向他所能形成概念的最高目标。他所设定的目标的伟大，就在于人本身的伟大。只有他努力的最高目标，他的思想、意志和心灵的最高对象，才能配得上人，才能让人感到满足。上帝就是这个最高目标。我们灵魂的全部生命，我们心灵的全部力量，只有找到上帝，才能找到自己的目标，找到自己的真理。在上帝那里，心灵找到了幸福，理性找到了真理，意志找到了真正的自由。人的心灵在世界上永远是不安的；它无法在短暂的事物中找到安宁；它只能在伟大的心灵——在上帝那里找到安宁。我们的理性从特殊上升到一般，上升到绝对，上升到最高的理性，上升到最高的真理。我们所思考的、我们在思考时所追求的、这个最高对象，必须与思考的心灵相类似，它不是一个事物，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它本身就是一个能思考的心灵，一个绝对自我——上帝。赫尔德经常说：“给我一个伟大的思想”，“让我以此为生”。最伟大的思想，也是我们真正赖以生存的思想，就是上帝自己。意志追求自由，追求道德自由。它在道德的完善中，在道德法则的实现中寻求自由；只有在有限意志与最高意志、与上帝的结合中，它才能找到自由，从而找到真理。总之，人追求无限，但无限只有在上帝那里才是真实的。人是为了上帝，并趋向于上帝。与神相交是人的真理，宗教是人的真正生命。没有宗教，人就不能真正称为人。宗教植根于我们的本性，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纽带：一种“亲人关系”的纽带。正如血缘的印记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联系的纽带，“亲人关系”的纽带也是如此。

我们与上帝之间有一种吸引力，吸引我们的灵魂向上归向他。当外在生活的喧闹安静下来，当内在的声音沉寂下来，当我们的思想转向内心，我们会感受到这种吸引力。它不由自主地将我们引向至高无上的无限；我们内心都有一种向这位至高无上的存在者臣服的渴求；在他那里，我们可以首先找到真正的自我，但要经过净化，摆脱一切邪恶的品质。这是对爱的渴求，对亲人之爱的渴求，对友谊的渴求，对亲密关系的渴求，对上帝的渴求，对上帝的眷恋。正如眼睛寻找光明，而寻找光明是眼睛的天性和必然，我们的思想也在寻找永恒真理的光芒，寻找我们灵魂的太阳，寻找我们心中永恒的爱——上帝。正如吸引力的普遍法则遍及所有自然界，来自宇宙太阳；上帝的心意、道德和精神吸引法则也遍及心灵世界。就像铁趋向磁铁，河流汇入大海，石头被吸引向大地，灵魂也被吸引向上帝，那是它的起源，它的家园。我们可以抑制事物的趋向，但我们无法废除吸引力的法则本身。我们可以反对和阻碍我们的灵魂对上帝的追寻，但我们无法消除我们心中存在着的归向上帝的吸引力；它仍然是我们存在的法则。心灵可能会犯错，可能会自欺欺人，可能会选择不是属上帝的东西（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卑鄙的东西、易朽坏的东西，甚至是与上帝相对立的东西；然而，归根结底，它真正的目的是上帝，它在渴求上帝，只有找到上帝，它才会找到幸福。

上帝与我们之间的这种联系，灵魂归向于上帝的这种吸引力，是

一切宗教、一切积极的宗教、一切启示的基础。

这就是宗教在人身上的基础；我们将继续探寻它在人灵魂深处的居所。

宗教是人类生活中直接的、内在的事实。施莱尔马赫的行动就是要让他那个时代无宗教信仰的一代人相信这一真理，这一行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肯定的是，宗教存在于人的内心深处，先于一切思考，先于一切宗教思想和情感。它是点燃内在之火的壁炉；它位于人的存在的中心。宗教是所有智力和精神能力结合形成的一个直接统一体。宗教是知识的问题；因为认识上帝和基督就是永生（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 3 节）。自然世界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内心生活的关注点和最高利益（即，宗教信仰），也必须是知识的问题。但宗教并不仅仅是一个知识问题，因为那样的话，宗教就仅仅由可以知道的教义组成，而不是一种必须要过的生活。知识不会使人虔诚，正统教义也不会使人成为信徒。这是一个意志的问题；因为它必须是一种道德行为，而耶稣自己把愿意遵行上帝的旨意描述为通往真理之路（约翰福音第七章 17 节）。

但宗教不仅仅是愿意；它也是一种感觉；因为它是人的幸福（加拉太书四15），是人的喜乐——在圣灵里的平安和喜乐（罗十四17）。它既是知识，又是意愿，还是感觉；因为它是整个人的内在，是他个人生命的根源，无论我们称之为心智、天性，还是《圣

经》所称的“心”；因为《圣经》把宗教的居所和宗教生活的存在，转移到了内心。道必须穿透人心（使徒行传第二章第 37 节）；心必须向道敞开（使徒行传第二章第 38 节），必须向话语敞开（徒十六 14）；心是信仰的器官（罗十10）。在不同的情况下，这种我们称之为宗教的内心生活采取不同的形式：有些人更多地采取知识的形式，有些人更多地采取意志的形式，有的人多采取感觉的形式。但在所有不同的情况下，其本质，只要是真正的、真实的，永远是相同的。

那么，我们灵魂深处的宗教是什么呢？

我们不得不回答，它的主要形式就是信仰。所有的宗教都是信仰；因为信仰是一种精神行为，在这种行为中，我的整个内在，我的知识、情感和意志，都与我信仰的对象结合在一起。圣经将信仰定义为“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的确据”（希伯来书十一章 1 节）。因此，信仰不是单纯的观点或看法。

信仰的对象永远是看不见的；因为人所看见的不是信仰的问题，而是视觉的问题。但是，看不见却相信的东西，不仅被承认和推崇为真实，而且成为最坚定的信念。信仰就建立在这种确认之上；事实上，信仰不是建立在理智的证明之上，而是建立在直接的内在信念之上，通过这种信念，我对有关事物有了直接的感知，并获得了不可抗拒的印象。这种内在的信念和经验是一切真正信仰

的基础。如果我对一个人的友谊和爱如此确信，以至于对它感到安全，尽管别人可能会说什么，甚至尽管表面上与此相反，——那么，我对他友谊和爱的确信，正是因为我收到了一种内在的印象；这种印象产生了这种直接和自信的保证。我的信仰正是建立在这种内在的体验之上。宗教信仰也是如此。因为宗教信仰的对象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像人与人之间的爱情或友情一样真实。因此，我同样能够受到它的内在影响，能够直接体验和感受到它的影响和作用。关于以这种直接的方式成为我内心拥有的东西，——我可能，事实上也必须，能够通过合理的论证来证明它的正确性；但信仰最终并不依赖于这种合理的论证。

信仰最终并不依赖于这些理由和证明，而是内心生活的直接问题。在这种直接性中，感觉、知识和意志结合在一起。就像在人类的爱情或友谊问题上，我首先感觉到，也就是内在地感知到有人爱我，我的心因此而被触动；——宗教信仰也是如此，它是由永恒的世界之造物主、上帝本身产生的一种直接的感知和情感，因此也是一种感觉。但这种感觉同时也是一种直接的知识。与我的信仰对象有关的许多东西可能仍然是隐蔽的和未知的，但它的内在和特殊性质对我来说是直接明显的，当我内在地感知它并为它所感动时，它就成为我的知识的一部分。这是一种知识，其中蕴含着充分的说服力和坚定的保证，因为它是一种基于经验的知识。那么，我通过这种知识和确信所接受的东西，同时也就成了我的意志问题。因为这是我的意志行为，我衷心地与我所相信的结合

在一起，并使之成为我内心生活的一部分。信仰是一种自由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信仰是非自愿的；信仰者不能不信：可以说，信仰是强加给他的；他是被征服的，他是被迫信的。但同样，他的信仰也是一种行为，而且是他自己的行为；因为，正如费希特所说，信仰是意志让知识产生合法效果的决心。信仰不是建立在一种证明的基础上，这种证明迫使我同意，使我不能不相信，就像数学公理一样，而是建立在一种道德信念的基础上，这种信念使我愿意相信。不愿意相信的人是不可能相信的：上帝让他为自己缺乏信仰找到看似充分的理由和借口，这些理由和借口甚至掩盖了他不相信、不愿相信的最深层原因。信仰是一种自由的行为，因为它是一种道德行为；但它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倾向和任性的行为，而是一种在人的内心深处找到原因的行为，因为它是建立在我们的道德本性对我们所相信的真理和现实的内在信念之上的。

爱和希望与这种信仰结合在一起，并包含在信仰之中。因为没有爱的降服，就不会有信仰在人心灵中的占有。所有真正的知识都要求我们既热爱知识的对象，又被知识的对象所吸引。除非在我的内心深处有对于爱的臣服，否则我无法完全相信并接受他人的爱。因此，宗教信仰也离不开爱。爱是宗教的现世生活。这种现在的生活伴随着希望对未来的确信；因为上帝是一位未来的上帝，如果我不能快乐地确信在未来能享受与他的交流，我就不能在现在与他的交流中感到喜乐。爱和希望与信仰结合成一个和谐的整

体，我们称之为宗教生活。

这种生活的基本表现形式就是祈祷。

在地球上所有被造物中，人类是唯一会祈祷的。祈祷不仅是人的事，也是全人类的事。没有一件事比祷告更自然、更普遍，也没有一件事比祷告更让人类无法回避。孩子可以通过自学来练习祷告，而祷告所接触到的无形世界就像是孩子熟悉的家。当老人在周围的世界中感到孤独时，他就会进入祷告。祷告自发地从稚嫩的嘴唇中流出，而稚嫩的嘴唇几乎还不能轻声念出上帝的名字；祷告也自发地从垂死的嘴唇中流出，而垂死的嘴唇几乎再也不能念出上帝的名字。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就会在特定的时节和特定的环境下，带着发自内心的情感，举目、双手紧握、屈膝祷告。在所有民族中，无论是不知名的还是知名的，无论是文明的还是野蛮的，我们每到一处都会遇到祈求的行为和形式。没有人不祈祷，因为没有人没有宗教。祷告并不是由人的关怀而首先产生的；祷告并不是一个教导的主题，而是心灵直接和不由自主的表达，是人与上帝关系中直接和自然的一部分。因为这种关系并非没有交集（即，人与上帝的交通），而祷告就是这种交集的表达。事实上，正是在以色列，在启示的土壤中，这种关系达到了完美。只有在这里，才有孩童般自信的心灵——与上帝的交流。圣经中提供了如此多、如此有力的例子，这些例子必须成为所有时代的楷模。但即使是异教徒的世界也并非没有祷告，因为他们并非没

有意识到自己属于上帝。如果说异教徒的生活不像以色列的虔诚教徒那样是祈祷的生活，那么祈祷则至少也是一种表面的风俗，普遍存在于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所有行为之中，而且国家的地位越高，祈祷的风俗就越盛行。

在希腊人和罗马人中，任何公共行为都离不开献祭和祈祷，私人生活中的任何交易也都离不开献祭和祈祷，这应该让我们感到羞愧。他们的诗人、哲学家和政治家都同样劝诫人们祈祷、或实践祈祷；人们的习俗也与这一事实相一致。当尤利西斯的儿子忒勒马科斯带着他的随从来到皮洛斯拜访聂斯脱里德时，聂斯脱里德（Pisistratus Nestorides）对这位新来的客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邀请他首先向神灵祈祷，因为“凡人都需要神灵”。荷马也表达了他那个时代的宗教情感。色诺芬（Xenophon）也提到苏格拉底说，“因为神是和平与战争事务的主宰，所以他规定每项工作都要从神开始”。众所周知，虔诚的色诺芬本人非常重视祈祷，这一点从他的许多著作中都可以看出。柏拉图同样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通过祈祷和誓言，以及他所做的一切，不断地与诸神交流，是最好和最高尚的行为。在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中，无论是最小的事情还是最大的事情，都要首先祈求神灵。希腊和罗马的政治家们也经常祈祷。伟大的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以其智慧的力量而闻名于世，他在向听众发表演说时总是先向神灵祈祷。伟大的罗马将军科尼利厄斯-西庇阿（Cornelius Scipio）在穿上长袍之后，如果没有在朱庇特-卡皮托里纳斯（Jupiter Capitolinus）

的神庙中独处过一段时间，他就不会去做任何重要的事情。雅典最著名的演说家德摩斯梯尼在他的伟大演说中总是首先向诸神致辞；关于加图和格拉奇以及罗马所有演说家的记载也是如此，他们总是在演说开始时祈求诸神。在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中，没有什么宗教格言比一切都必须从神灵开始，也就是从祭祀和祈祷开始更有说服力了。每一次公共行为、每一次行军、每一次战斗、每一次担任公职、每一次司法程序、每一次国民大会、每一次政治条约等等，总之，政治生活中的一切事务都是通过祈祷来实现的。同样，家庭生活中的所有重要事件、婚姻和生育、青春期的开始、旅途的顺利归来、或免于危险也是如此。同样，人们的所有庆典活动、戏剧表演和竞技比赛，也都通过祈祷和祭祀获得宗教上的祝福。

总之，生活中的每一个行为都充满了宗教气息，并得到祈祷的支持和环绕。必须承认，古人的祈祷实际上只是在形式上履行宗教义务；最初，祈祷更多的是祈求，而不是感恩，而且一般都带有某种要求得到满足的诉求。但是，为道德利益的祈祷并非完全不存在；而且，无论祈祷的目的如何偏离其应有的目标，祈祷仍然是宗教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随着宗教的衰落，祈祷本身也衰落了，它的衰落是宗教的外部解体的先兆。因为随着祷告的消失，宗教生活的真正灵魂也随之消失了。当今的异教很难再被称为真正的祈祷宗教，因为祈祷已成为一种外在的机械行为，是对祈祷者本身的控诉与定罪。然而，即使在这种堕落的状态下，它仍然

见证了人类对祷告的需要。

那么，祷告是什么呢？它是与上帝交往的标志。祷告的人离开了笼罩着他的世界，离开了在他周围躁动不安的、外部生活的混乱焦虑和喧嚣，进入了他自己。我们的生活离不开我们自己，而在祷告中，我们诉诸于我们自己，进入我们存在体的最深处，进入灵魂最深处的圣所。然后，我们放下手头的工作、思想的工作，退隐到私密和寂静之中，寻找安宁，获得喘息的时间，真正与自己在一起；然而，与自己在一起只是为了与上帝在一起，因为上帝就在我们生命的深处。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与上帝同在，在我们灵魂的内在圣所。外在的人在世界之中：内在的人应该在上帝之中，上帝也在他之中。我们进入自己，是为了把自己交给上帝，把自己和影响我们的一切带到上帝面前。祷告是爱的渴望，是将一切倾倒在上帝的怀抱中。它是一种信靠交托的行为，将一切交托在神的手中。只要是对我们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没有什么是微不足道的、不能带到上帝面前。我们与上帝之间的亲密关系在这种祷告的交流中得到了证明和表达。没有这种关系，我们与上帝的关系就是死的。在祷告中降服于上帝，是爱的内在必要表达和证明。在祷告中，我们将自己和我们所感兴趣的一切交给上帝。这是最高的奉献。但这种最高的交予同时也是最高的接受；因为在祷告中，我们舍弃了这个易逝和短暂的世界，进入了永恒的世界，呼吸着它的气息。祷告就是灵魂的这种秘密呼吸。这种永恒空气的呼吸对于灵魂的生命就像呼吸我们所生活的地球上的

空气对于身体的生命一样必要。然而，上帝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和平与力量的世界，祷告使和平的精神弥漫在我们的生活中。灵魂在祷告中安息。心灵的激情随之安宁；风暴和它的忧虑和不安，它的痛苦、烦恼、哀伤也停止了。这样，我们的内心就会焕发出新的活力和愉悦。正如山间的清新空气使我们充满了新的力量感，我们在祷告中也会呼吸到神圣的鼓励，从与上帝交流的内在圣所中走出来，以新的姿态投入到外部生活中，投入到任务、职责、负担和世事忧伤中；然而，这样做的目的是，虽然我们仍处于日常工作的烦恼和动荡之中，我们的心却居住在安息和祷告的圣所中。生活是祷告和工作的复合体。它们并不像两个独立的机构，仅仅是外在的结合或相互交替；它们必须永远相互结合、相互影响。二者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需要。就像人的内在和外在，就像灵魂和身体。

灵魂和身体需要祈祷。

祷告需要工作，而工作必须是祷告的外在和可见的形式：祷告必须是工作的灵魂，是一般生活世事的灵魂；祷告不是在一个孤立的外在行为之外再加上另一个孤立的外在行为，而是每一个行为的永远存在的背景，它是我们每一个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渗透和支持，一切都必须从它出发，一切都必须趋向于它，这样，我们的整个行为就会成为一个具体的祷告。正是通过祷告，地上的生命才与永恒相连，沉入永恒之中，从永恒中生长出来。祷告的伟大

之处在于，它将时间短暂的生命带入永恒的领域，使其充满永恒的价值，并使之与上帝本身直接沟通。因此，没有什么比祷告更能使人高尚和荣耀了。一方面，它确实是人在上帝面前的卑微，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上帝对人的提升；因为人向上帝本身、至高无上的、绝对的心灵诉说，吸引他关注自己的特殊利益，向他倾诉自己的忧虑，甚至影响上帝的决定，这难道不是一种真正的提升吗？因为当圣保罗说“我们与上帝同工”时，他的意思是我们在上帝的工作中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是通过祷告来做到这一点的。

通过祷告，我们影响着上帝的行为和决定；不，我们甚至可以说，通过祷告，人参与了神圣的全能，并在上帝治理世界的过程中占有一席之地。因为祈祷是世界上的一种力量，上帝乐于将它纳入他的治理之网；上帝的爱让这种力量听命于哪怕是一声无声的叹息，这叹息是由他自己发出的。

而康德虽然承认有一位能听能看的上帝，却不承认人与他之间的真正关系，而是以服从道德律代替了这种关系。正如真的有一位活生生的、有位格的上帝，以及与他之间真正的个人关系一样，祈祷也确实自然和必要的，没有祈祷的宗教或虔诚的人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康德要求以服从道德律代替宗教，那么可以回答说，虽然宗教不能、也不应该离开道德而存在，但宗教本身并不是道德。正如圣约翰在他的第一封书信中所表达的，他在书信中

指出并提醒我们宗教与一般道德之间的联系（约翰一书iv. 20）：“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邻舍或弟兄无疑是道德的灵魂，也是对上帝的爱。

爱是宗教的灵魂。爱神、爱人，二者密不可分，正因为如此，二者才是同一的。康德的最大错误在于把宗教简化成了道德。将道德至少作为宗教的主要部分，而将宗教的另一部分，即教义，视为不那么重要和不那么必需的部分，这仍然是一个广泛传播的错误，是理性主义观点的结果。道德是人格的完善，是人与神的形象相一致；另一方面，宗教是生命力，是人与神的结合，是人与神的真正关系，通过这种关系，我们与神相交，并将万事万物归于神。如果我们称道德为宗教的果实，那么宗教至少应被视为根源。道德不能与宗教割裂开来，因为当上帝不再是道德的基础和源泉时，道德就会消亡；道德的权威、力量和生命力就会被摧毁。在个别情况下，它的确可以被暂时切断，就像树枝被砍断后，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青翠，但当它的汁液逐渐耗尽，就会干枯、枯萎，就像道德被剥夺了来自宗教的生命力一样。

那么，我们已经看到，对上帝的信仰和爱足宗教的本质，祈祷是宗教的表现和表达；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宗教在生活中占据的地位。

宗教常常被认为有损于自然生活、自然生活的任务和利益，因为它把我们引向一个看不见的世界，把我们的注意力从这个世界上移开；然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其中，我们的使命和责任也在其中。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宗教甚至是我们尘世生活的力量；因为宗教是与上帝的真正交流，而上帝是我们整个存在的泉源、根基和目标，宗教为我们开启了所有生命力的最深层源泉，并将其富饶的溪流扩散到我们的整个存在，甚至是尘世和世俗的部分。因此，宗教甚至是我们自然生命的力量。它不是扼杀生命，而是发展生命。在某些教徒中，宗教似乎确实起到了这种“弃世”作用；但这并不是宗教本身的过错，而是这些宗教教士的过错；产生这种效果的不是宗教的使用，而是宗教的谬用。当然，宗教要求人们放弃自然生活中一切罪恶的东西；因为宗教是来自上帝的生命，它否定生活中一切不敬虔的东西。但我们的自然生命本身，正如上帝所创造并希望它成为的那样，它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善和丰盛的祝福；它并不否认、而是认同，并完善此世生命的发展。宗教可以说是它的强制力（Triebkraft）。它就像夏日的暖阳，使花朵更加娇艳，同时，它又通过将世俗生活中的所有产品都归于上帝，使它们散发出更高尚的献身精神的芬芳。人类生活的最佳和最充分的发展要归功于宗教，这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宗教是我们所掌握的历史知识中最古老的一种生活。

我们所拥有的人类思想记录常常与宗教有关。宗教是人类整个智力生活的发源地。人类的所有高级文化都是宗教的女儿，她应该

是一个成熟的女儿，因为她有自己特殊的任务和使命；但孝道的纽带将一个成熟而独立的女儿与母亲联系在一起。我们应该认为，如果一个女儿对她认为自己不再需要其养育之恩的母亲缺乏孝道，那么她就应该受到严厉的道德谴责。精神文化与宗教的关系也是完全相似的。它现在独立地走着自己独特的道路。这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它轻蔑地割断了它与宗教之间的精神纽带——虔诚，它就犯了道德上的不公，也不会得到任何祝福。宗教不应对精神文化领域施加外在的影响，也不应规定其界限、尺度或范围，而应将其视为成熟的时代。然而，内在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存在的重要联系却永远不应停止。

精神文化与宗教的这种历史联系在各个领域都可以找到踪迹。最古老的文明史本质上就是一部宗教史。最初，文明实际上是由宗教构成的。宗教的守护者就是教育的守护者和载体。科学、法学、天文学、历史是祭司们的工作。艺术是在为宗教服务的过程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建筑从一开始就是造型艺术的皇后；其他艺术都依赖于她，它们只是逐渐才获得了单独和独立的存在。建筑主要是为宗教服务的。印度宏伟的岩石寺庙和佛塔、希腊壮丽的柱式建筑、基督教崇高的大教堂，无一不是这种服务关系的见证。其他造型艺术也是如此。希腊的雕塑以神及其崇高的形体为主题，然后才转而表现普通人的生活。最优秀、最丰富的绘画作品产生于基督教会，产生于宗教本身。音乐也是如此。在希腊和基督教德国，甚至戏剧最初也是一种崇拜。就连埃米尔-德夫里恩特(Emil

Devrient) 也将《奥伯伦默高尔受难剧》奉为未被超越的典范，它仍然证明了宗教与戏剧艺术的结合。我再说一遍，要求所有的文化、艺术和科学都是宗教性的，并以教会的宗旨来划定其合法性的界线，是愚蠢的。因为尽管它们是为宗教服务而发展起来的，但它们并不是宗教独有的产物，人类的自然心智才是产生它们的土壤，而宗教不过是将这些萌芽从泥土中汲取出来并使其臻于完善的太阳，因此，它们的花朵感激地向太阳开放。然而，这向我们表明，宗教是人类最初的家园和炉灶，是珍爱种族的圣火，是尘世生活的天赐之福。

此外，历史还告诉我们，所有伟大而富饶的时期都是宗教兴盛的时期，而宗教的衰落总是伴随着一个民族的衰落。当天上的露水和太阳的温暖与光辉随着宗教从人间生活的形式中消失时，就好像切断了生命力的供应。我们在《旧约》中的以色列民族及其历史中看到了这一事实上最有启发性的例子。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及其民族生活是建立在宗教之上的，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是这样。它（以色列）所有的外部繁荣、政治生活的稳定和民族的独立，都取决于它对宗教的忠诚。《士师记》的主题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以色列的先知们是民族精神和政治观点的保存者。他们所有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演讲的基本格言就是，宗教的忠诚是一切国家繁荣和独立的基础和灵魂。以色列的衰落和解体也是宗教衰落的后果和惩罚。我们在《圣经》中看到的关于这个国家的广泛而典型的叙述和教导，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在重复。希腊如此，

罗马也是如此。首先是宗教衰落，进而是道德沦丧；接着是公民社会的衰落，以及政治上的伟大和自由的丧失。德国的历史也为这一原则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而且，德国的历史比任何其他现代国家的历史都更能证明这一点。因为德国人民是一个比其他国家人民更有思想的民族，他们生活的基础，甚至是国家和公民生活的基础，都必须奠基于所有生命和祝福的永恒源泉的深处。曾几何时，德意志的利剑为世界带来了法律，德意志帝国是欧洲唯一的强国；曾几何时，宗教也是支配公众舆论的巨大力量，是唤醒民族生命的灵魂。我们称颂德意志人民最伟大的行为就是宗教改革——这是宗教与我们整个民族生活紧密结合的标志。如果我们不是先用宗教信仰换取了法国人的轻浮和不虔诚，我们就永远不会经历那段在莱普西血腥战场上结束的民族耻辱时期。这不过是“一个人的罪孽也是对他的惩罚”这一古老法则的新例证。同样，我们的民族复兴（几年前我们曾纪念过它）首先取决于宗教和道德的复兴。那个时代的所有伟大见证者都坚信，德国自由和德国伟大的基础必须奠定在德国人的内心深处，奠定在德国人的宗教信仰和道德复兴之中。那个时代的所有抒情诗都弥漫着这样的基调，它们如此有力地重新点燃了民族的热情。科尔纳（Körner）的战歌、申肯多夫（Schenkendorf）的振奋人心的民谣、鲁克特（Ruckert）的战争十四行诗、阿恩德特（Arndt）的德意志民谣等，都洋溢着这种宗教气氛。宗教界人士都与民族精神不谋而合，而民族思想家也都是虔诚的宗教人士。神学家施莱尔马赫用言行点燃了民族精神的火种；而热心的爱国者阿恩特是一位衷心诚意

的基督徒，对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他生命的灵魂，是他在苦难中的慰藉，是他在困难中的力量。他为赞美耶稣基督而创作的许多赞美诗现已被收入我们的教会赞美诗集。

我们目前的状况包含了许多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忧虑的东西；但在在我看来，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最不祥和最令人担忧的是民族运动和现代文化的发展与宗教及其某些倡导者之间出现的分歧和不和。

请允许我就这个问题说几句话。因为政治是这个时代的主要利益。我们并不为此感到悲哀，因为政治是严肃而庄重的追求，并提供了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的途径。但是，政治以及世俗生活中的其他一切知识产物，都需要与人类最深层的利益即宗教联系起来。如果说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之间的这种联系在任何地方都很重要的话，那么在德国就是如此。在这里，人民的历史和本性与宗教利益和问题的交织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民族运动与基督教的关系只能被视为民族的关键问题，是决定民族未来的关键问题。因此，两者之间的分歧和不和就变得更加不祥和重要。并不是说宗教规定了任何明确的政治信仰。当然，宗教情感与颠覆精神是直接对立的，甚至根据吉佐这样一位见多识广的人的判断，颠覆精神也威胁着我们整个社会结构的未来。因为宗教观点必然包括对法律的承认、而颠覆精神则是对法律的蔑视。然而，这不是政治上的对立，而是道德上的对立。在纯粹的政治问题上，宗教不属于任

何一个党派；它既不属于君主制，也不属于共和制，既不属于绝对制，也不属于宪政制。这是因为它只是宗教，而不是政治。但是，它是法律圣殿的守护者，是那些永恒的神圣约定的守护者，而这些约定构成了我们整个世俗生活和社会状况不可动摇的基础；它是那些永恒真理的倡导者，是那些永恒的道德原则和规则的倡导者，如果政治科学要形成一种政治信条，或者选择一种基于事实和正义的关系和必要性的程序路线，就必须以这些原则和规则为指导和启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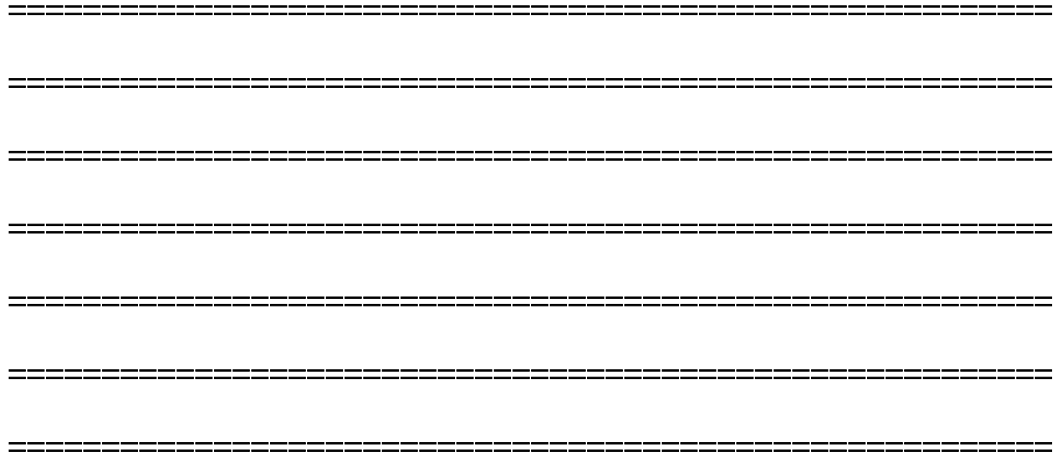
显然，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将中世纪打入了坟墓，无论现代与中世纪的差距有多大，这个新时代至少与它之前的出版自由、蒸汽机和电报时代的差距同样大。这种变化不仅扩展到外部生活的各个部门；它更是一种普遍的变化，因为这是时代精神的变化。但是，上帝的灵贯穿了所有民族和所有时代的历史，他在这场变革中掌权。因此，我们应该在不同时代的进步中认识到他的管理，以及他因此而赋予后代的更多责任。

同时，我们也不能闭门造车。并且，我们也不能对危险视而不见，因为这些危险有可能使过去的收获化为乌有，使现在的努力付诸东流。我们时代的危险是不可否认的。在当今时代的进步背后，潜伏着一种充满激情和怀疑的、不安分的、不快乐的精神，它将是未来的麻烦与猎物。征服它的将不是外力，而是智慧的力量，

尤其是最伟大的智慧力量——宗教；只有文化的进步才能成为人类的福祉；不是靠任何外在的制度，而是靠它所激发的精神，甚至是宗教的精神。我们的责任是将宗教注入当前的文化精神运动，从而将其与一种力量结合起来，这种力量既能推动其努力，又能使其成为世界的祝福。另一方面，现代文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该了解并牢记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这些进步以及所有自然发展本身都蕴含着死亡的种子（如果没有永恒的价值或真正的道德价值）；——除非与那些永恒的生命力量相结合，这些文化力量才能遍布世上凡人生命的所有变化，就像苍天遍布大地一样，而且这个文化生命必须从（宗教）中获得内在的力量和祝福。因此，我再再说一遍，宗教与现代进步的结合是当今欧洲，尤其是德国的重要问题。

宗教的地位和重要性就在于此。

因此，宗教的地位和重要性就在于，它是一切努力的灵魂，甚至是世俗生活的灵魂。它在任何时候都是如此，而且将永远如此。如果说其他宗教也曾拥有一种生命力，以至于它们的衰落也伴随着一个民族生命的衰落，那么基督教所固有的这种力量又是何等的强大，——甚至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即使他既不是基督教信仰的参与者，也不是启示录的信徒，也都不会不把这种力量推崇到高于世界上已知的其他任何宗教的地位。



第七讲

启示

所有宗教都诉诸启示。人类要求得到神的启示这一事实本身就显明了它的必需。

1. 我们首先要考虑启示的必要性。

启示是理性构成所要求的。这是一种双重需要——我们的思维的需要，以及道德本性的需要。

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思维的需要呢？

我们是为上帝而生；我们要寻求并找到他，与他相交。但是，为

了使我们能够接近他，他必须首先向我们迈进——必须为自己作见证，把自己给我们；换句话说，必须显明自己。诚然，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都有一种对他存在的意识，一种对上帝的自然认识，这种认识通过他在创造之工和天意中对他自己的见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是，除了这种自然的启示之外，还必须加上一种积极的、历史性的启示。

因为人类的心灵本性需要一个更高的权威，一个神圣的确证，来证明那些更高的真理，而道德生活的整个大厦正是建立在这些真理之上的。其他宗教通过佯装神圣的凭证，证明了它（神之启示）的必要性。神圣的确证也不仅是唯一需要的东西。我们对上帝存在的沉睡信念需要被唤醒，我们与上帝的亲密关系也需要通过上帝对我们的实际自我证明而加深。就像内心的良知只有在遇到外面的道德法则时才会变得活泼和积极一样，我们的宗教意识也只有通过宗教见证和宣告才会被唤醒并付诸行动。只有在上帝与我们相遇时：“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才会得到回应：“你是主我的神”——这样的回应才会在我们内心深处被唤醒。《圣经》早期的叙述蕴含着深刻的含义，它告诉我们，上帝与早期的始祖同行并交谈，就像父亲与子女交谈一样。就像在孩子胸中沉睡的语言，会被他周围听到的语言唤醒和唤起，同样，人被创造的目的——对上帝的认识，也必须通过上帝亲身的实际见证来唤醒和发展。对上帝的这种原始见证是人类对上帝的一切认识的基础，也是人类一切宗教的基础，甚至是一切腐朽和歪曲宗教的基础。古代宗

教史证明，所有宗教都建立在这种启示之上；因为在原始时代，宗教的地位比任何其他精神文化都要高得多。当异教国家在智力方面取得进步时，他们在宗教方面却在倒退。所有研究过这一问题的人都承认，我们越追溯到古代，就越能发现对上帝的认识越高、越纯粹；这一事实证明，原始宗教的拥有并不仅仅是人类自身精神活动的产物，而是上帝的启示和恩赐。所有的宗教最终都建立在原始启示的基础之上，这种信念一直延续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甚至西塞罗时代。

人类心灵的自然构造要求启示，但当我们考虑到人类谬误的力量时，启示的必需性就加倍了；不可否认，谬误已经强行进入了我们的理解力，败坏了我们对最高事务的所有知识和观念。如果我们否认这种谬误的力量的存在，那我们就真的是瞎了眼，因为我们天生就暴露在这种谬误罪恶力量之下。人类思想史充分证明了这一事实。没有一种愚蠢的东西没有找到它的拥护者；甚至在最大声吹嘘智慧的地方，在哲学家的学校里，我们也会发现矛盾针对矛盾，错误针对错误。古人费尽心机的长期推理，最终都以绝对的不确定性和可悲的怀疑而告终。人们普遍对真理的发现感到绝望。在柏拉图学派中，人们已经表达了需要神圣启示的信念。

《柏拉图对话录》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将等待一个人，不管他是神还是受启示的人，来指导我们履行宗教义务，就像《荷马史诗》中雅典娜对狄奥米德说的那样，来消除我们眼中的黑暗”。在异教的末期，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Porphyry）说：“那些

渴望真理的人祈求神灵显灵，让他们通过具有可信权威的教导摆脱疑惑”。西方的罗马也是如此。西塞罗在列举了一长串关于灵魂的各种哲学观点之后，以“这些观点中哪些是真的，只有神可能知道；甚至哪些只是可能的，也是一个难题”作为结束语。他还说：“一个人怎么能够知道并自信地谈论神的本体呢？这一切都充满了黑暗和困难”。苏格拉底在其他地方用感人的话描述了人类心灵在所有更高层次的问题上的不确定性；事物的模糊性使得苏格拉底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知。不只是他，德谟克利特、阿那克萨哥拉、恩培多克勒以及几乎所有的古人都承认，我们无法理解任何事物，无法领会任何事物，无法知道任何事物。正如德谟克利特所说，“我们的感官是有限的，我们的思想是软弱的，我们的生命空间是短暂的”；“真理是沉没在深渊中的，除了观点和习俗之外，什么都不存在；至于真理，没有任何空间留给它，最后，一切都被黑暗所包围。”这就是这位古代哲学的伟大学者和簿记员所得出的可悲结论。他也没有意识到错误与罪恶的联系。

“大自然赐予我们的不过是知识的微弱火花，而我们的不道德、过失和错误却很快将其腐蚀和熄灭，以至于大自然的光明和纯洁无处可寻”。连西塞罗都能感知到的东西，我们这些拥有基督教启示之光的人却不能不看得更清楚；因为人类黑暗的阴影在它（基督教启示）面前只会显得更深。这一点甚至也适用于道德学，因为道德学是知识中最有优势的学科。正是启示的道德首先净化、并强化了自然的道德判断，康德也承认这一点，尽管他的整个世界观都建立在道德意识之上。“我们完全可以承认，”他说，“如

果福音之前没有完全纯粹地教导普遍的道德法则，理性就不会对它们有如此完美的洞察力”。

但问题不仅仅在于一般的道德知识，而首先是关于救赎的知识。无论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在本质上多么崇高，他的赦免和使人成圣的恩典在本质上只能通过启示来教导我们。

这种观念不可能源于人类。没有人能把它教给别人；只有上帝才能成为我们的导师。只有他才能给我们这样的保证，使我们的信心得以安息，使我们的宗教生活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如果上帝没有亲口告诉我们，我们又从何得知上帝是仁慈的呢？上帝的大能的确是在创造中与我们相遇的事实，但他的恩典却是他内心的自由决心。这一点，我们只能从他自己那里知道；这一点，我们自己是不敢想象的。然而，确定这一点是所有事情中最必要的。因为若我们确信上帝的权能和威严，却不确信他的仁慈，这有什么用呢？

此外，上帝的仁慈是我们道德状况的需要。因此，上帝之启示是我们道德结构的需要，它不仅仅是我们理性本质的需要，更是解决我们意志变质和堕落的需要。

我们最好和最高的财富必须是来自一种恩赐，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席勒重申了这一观点：“一切最好的东西都是从天上

免费降下来的”；作为人性光辉的最高思想阶层的人也做出了同样的承认。如果我们单纯的智力生活尚且如此，那么与上帝关系密切的宗教生活更是如此！与上帝的交流必须是源自上帝自己的行为 and 恩赐。我们不能以他为我们的天父，除非他将自己给我们，除非他亲自打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的意志接受他。如果说这本身就是一件必要的事情，那么我们道德本性的实际状况则使其加倍必需。我们需要启示、甚至需要救赎启示的最深层原因是我们的罪。

罪

2. 请允许我就此谈谈罪。罪是一个事实，一个公认的事实。不仅《圣经》告诉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我们自己的良心也证实了这一点，每天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所有国家的声音都在哀叹这一点。罗马诗人的名言“*Video meliora proboque, deteriora sequor*”早已耳熟能详；另一句名言“*Nitimur in vetitum semper cupimusque*”也是如此。

人体内有一种激情的力量，它使人更好的知识变得无能为力，必须通过法律加以约束。普鲁塔克说：“激情是人与生俱来的，并不是从外面进入他体内的；如果没有严格的纪律来帮助他，人可能不会比最狂野的野兽更驯服”。类似的证据还有很多。康德诉诸于人的道德力量，认为责任感足以重新约束和支配一切相反的

冲动；然而，即使是他，也谈到了人的根本罪恶，这种罪恶根植于我们的本性深处，超越了我们自己的世俗意志。

可以说，一个人生活得越严格，道德感越强，他就越能感知到内在的这种对立力量；他越是认真地与自己抗争，就越要为之叹息。但是，只有基督徒才完全知道什么是罪。因为只有在债务得到宽恕之后，才会认识到罪的严重性，也只有在与罪的冲突开始之后，才会体验到罪的力量和暴虐。但是，除了基督教之外，还存在着至少近似于这种沉重的悲哀、这种罪孽意识的感觉。各国的思想家和诗人对人生悲哀的哀叹不绝于耳。当然，他们所哀叹的不仅仅是罪的悲哀、罪的罪恶感和罪的力量；他们哀叹的是整个人生的悲哀，是地球上所有的苦难，这些苦难在所有民族和所有时代的声音中都得到了如此动人的表达。然而，罪造成的悲哀、道德上的罪恶感和无能为力的痛苦感觉也是意在言外的。

诚然，希腊民族的生活和天性中弥漫着欢快的气息，这通常被认为是古代世界令人羡慕的特权。歌德在他关于温克尔曼的小册子中赞美了古代生活坚不可摧的健康；而我们现代的非基督教人文主义传教士，如大卫-施特劳斯，则赞美希腊世界盛行的健康感性，并将其作为“基督教世界未曾触及的理想”。但是，贯穿希腊生活的深沉忧郁，在希腊最优秀的艺术作品中都留下了痕迹，而这种希腊诗歌中动人的悲叹音调，却被现代人文主义者忽略了。这种悲叹的语调听起来像是在预言真正赎罪的时刻即将到来。这才

是真正的深度，正是这一点，真正构成了古代世界的深度、真理和伟大；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它才具有根本的魅力。

正因为古人还不了解赎罪，所以他们甚至在人生的悲痛之上也洋溢着欢快的气息，并在他们自己的眼中掩盖了悲伤。然而，哀怨的音调总是冲破这一切的遮蔽。从荷马开始，几乎所有的希腊诗人都称人类为最悲哀的生命，他们都在哀叹人类生活的苦难。许多希腊智者都曾说过：“最好不要出生；即使出生，也要尽快结束”。

希腊人的艺术不知道救赎主和他的光辉，因此他们如此热爱运动，却不知道悲伤的深渊。我认为这是古代感动我们的最大魅力，它引领我们轻轻地掠过它不知道如何安慰的悲伤。

同样，罗马人普林尼描述说，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人类“用哭声和泪水迎接自己出生的日子”——仿佛在期待着等待他的悲伤。在这些悲伤中，普林尼列举了激情，以及追逐人类的一般道德罪恶。“因此，”他又说，“每个人都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大自然赐予人类的所有好处中，最大的好处就是早死；而最好的好处就是，每个人都能为自己争取到早死”。米南德有句名言：“天神爱谁，谁就早死”。在希腊历史的开端者阿喀琉斯和结束者亚历山大身上，这句话都得到了应验。正如黑格尔精细而巧妙地指出的那样，在这两位英雄的身上，反映了希腊民族的整个生命和

本质，他们的形象都带有一种悲歌的色彩。就像希腊人一样，古代世界所有高贵的民族，尤其是印度人，我们都能在他们的脸上发现悲伤的印记。

然而，在所有这些对人生悲哀的哀叹中，却没有特别的刺痛。我们的道德感比古人更加敏锐。我们知道，生命中最主要的罪恶是道德上的罪恶。

然而，即使在古代世界，也并非完全没有罪的意识。“生命不是至善，罪恶才是至恶”，塞内加说：“我们都是恶人，一个人在另一个人身上所受到的责备，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怀里找到。我们自己是恶人，且生活在恶人之中”。

因此，罪恶是一个普遍的事实，是罪恶中的罪恶，它使生命本身不再令人向往。

这种罪恶的力量贯穿了整个人类历史，无论我们追溯到多么遥远的年代。邪恶的起源一直是人类思想的难题。《圣经》给出的答案是最简单的解决方案。罪不可能来自上帝，因为上帝既是圣洁的，又是仁慈的。它不可能产生于物质的性质、我们身体的性质或类似的性质，因为就连我们的肉体和感官性质也是上帝创造的。因此，它只能源于人类自身，源于人类自身的自由行为，源于人类从最初的纯洁和卓越中的堕落——我们已不再拥有这种纯洁和

卓越，尽管我们内心仍对它充满渴望；就像日光消失后的余辉，或对失去的幸福回忆，所有民族的传统都充满了这种回忆。我们随处可见关于幸福开始时的状况以及后来因人类的罪孽而失去幸福的传说和神话；几乎在所有地方，尤其是在东方，所有其他宗教观念都以这一学说为基础。

《圣经》的叙事描绘了我们第一个人的罪，先祖父母的罪是人类受到诱惑的结果，也是人类堕落的原因；这就暗示了一种外在的精神诱惑力的存在，这种观点后来在教义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新约》中具有突出的重要性。然而，现代意识对其他教义的偏见莫过于此。当然，当它被用来为迷信和狂热服务，或被歪曲用来减轻人类的罪过时，我们的道德感就会理所当然地对它产生反感。然而，将人视为受诱惑者，而不是罪的发明者和原作者，是符合人类利益的。

人不是撒旦。感谢上帝，他的救赎是可能的；他是可以被救赎的。他可以被从罪恶中解救出来。这一事实虽然不能减轻他的罪责，但却减轻了罪的后果，使罪本身显得更加严重，因为它向我们表明，罪并不局限于我们的内心，而是作为一种外在于我们自身的客观力量，在世界上行使着统治权，并在我们的内心生活中投下阴影。

有人反对说，《圣经》虽然把第一宗罪描述为外在的感性事件，

几乎是一种幼稚的行为，但却把它说成是给整个人类带来最严重后果的事件。但是，我们不应该纠缠于外在的情况，而应该穿透这外在的遮蔽，观察其中的道德内涵。这些都具有最深刻的意义。当我们看到人的心灵和意志与上帝保持着最初的幸福和谐时，却看到他误解了上帝的爱，怀疑上帝武断地、妒忌地剥夺了他的利益，而这种利益与他未来的幸福息息相关；然后拒绝上帝的诫命，将自己的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以不顺服上帝的方式为自己塑造未来——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心中对天父上帝的整个性情都是扭曲的；他已经背离了他与上帝之间孩童般的关系，与上帝分离了——就像浪子一样，在内心深处离弃了天父的家，进入了与天父疏远的遥远国度。那么，他所遭遇的苦难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外貌上，因为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而且是由第一个人的婴儿般的状况造成的，我们必须努力领会这件事的真正道德意义。这样，我们就会认识到、并承认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而且由于它发生在历史的开端，当时人类还处于年轻时期，其本性尚未定型，所以意义就更加重大。正是这一点，使这一事件具有全人类灾难的重要性。

起初的这一行为，就其本质而言，对整个人类种族都是致命的；因为这是他们的首领（亚当）的行为，而整个种族都在他身上得到了代表和体现。我们不能不感到，这与我们所有人都有关，这不是无关紧要或偶然的情况，而是与我们个人有关，就像在代表一个群体的人的交易中永久和无处不在的情况一样。此外，我们

还可以从它的实际结果中了解到这一事实确实与我们有关。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为此受苦。谁能否认，我们从一出生就有一种邪恶的倾向——这种倾向以多种甚至是非自愿的方式表现出其罪恶的根源？当然，孩子身上有一种天真无邪的东西——它的淘气往往几乎是可爱的；但在它的天真可爱之中，常常会看到一种不祥的背景。有一句古老的希腊谚语：“不挨打的人不会受教育”。谁又能不说，大自然不能任其发展，否则杂草会像良种一样大量萌发呢？因此，我们都承认，即使在年轻心灵的土壤里，也有许多杂草在蛰伏。我们在道德发展上走得越远，就越会体验到这种遗传性的道德败坏，直到最后，我们会觉得，没有什么罪恶不是在我们身上萌芽和可能发生的。

这种邪恶的道德倾向，正如道德学家康德所说的，这种根本性的邪恶，不仅仅是我们感性天性的力量：它是道德变态的精神力量；它是意志的邪恶倾向和趋势；——如果我们想用它最糟糕、最深刻的名字来称呼它。

我们必须说，我们从根本上都是自私的，只是这种自私的形式不同而已。它是一种自我追求的本性，甚至与我们最光明的美德混杂在一起，玷污了我们的美德，也许只有自以为是和自我夸耀才能超越它。

我们无法摆脱这种邪恶的性格。的确，我们内心有道德感，也有

道德意志力。但是，我们的道德感，即我们的良心，并不能使我们摆脱罪恶，而只能使我们对罪恶深知不疑；它可以斥责和惩罚我们，却无力帮助我们。我们意志的力量确实能让我们控制自己，这是每个人都必须做到的，但没有人可以免于此难（没有人能够不犯罪）；自我控制确实是一件伟大的事情，但它并不能改变内心的邪恶倾向。我们可以束缚自己，但这种束缚只会让我们成为道德律的奴隶，并不能赋予我们真正的道德自由。只有改变了内心，改变了意志的内在倾向，我们才能获得自由和幸福。康德满足于要求外在行为应与内在倾向相反。但这并不是道德的最高境界。席勒恰恰表达了相反的观点，他说：“战胜自己的心灵是伟大的，我敬佩勇敢的人；但在我看来，用心灵取胜的人更伟大。但为此目的，心本身必须正确地面对自己；这是无人达到的境界。”

席勒认为，美学或许具有这种力量；他将其置于康德绝对命令的位置：只有通过“美”这扇黎明之门，我们才能进入道德自由的国度。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种错觉。没有任何自然能力，没有任何人类心灵的力量，能使我们这些罪人成为一个完美者。只有上帝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谁能改变自己的心呢？如果我们的心要焕然一新，必须有更高的力量介入。我们完全无法做到这一点。救赎和更新我们的道德力量只能来自上帝。

所有前基督教道德的基本原则都是让人依靠自己的道德力量，而基督教则让人依靠基督所彰显的恩典。但前者的无能已被古代世

界的衰败所证明；而福音所宣告的恩典既更新了世界，也表明了它本身是能够克服人类生存中道德矛盾的唯一道德力量。

人类生活及其历史充满了本质上属于道德范畴的矛盾——内在生活中的要求与实现之间的矛盾，决心与成就之间的矛盾；外在生活中的矛盾，如真理与谬误之间永无休止的冲突，外部环境的不公正等等。对于这些矛盾，除了把生命分成两个不和谐的元素这一原始事实之外，别无其他解释。那么，从哪里开始补救和治疗这种状况呢？苏格拉底所认为的更好的道德知识，现在人们通常认为的教育和文明的进步，在这里都无济于事。因为即使是最好的知识和最崇高的智慧，在与内心的倾向相对立时也是无能为力的；随着心智的发展，邪恶也在发展。个人如此，人类历史也是如此。文明和文化可以改变罪恶的形式，但无法减轻其暴行或消灭其存在。文化可以让艺术取代自然。文化的罪恶更加精致，但并没有减少，而且往往在数量上增加，在质量上恶化。因此，人类自身的精神力量所产生的一切在这里都无济于事；上帝必须在人类及其事务中引入另一种更强大的力量，与罪的力量相抗衡。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理想，都有一种事物状态的概念和形象，在这种状态中，一切都如其所愿，只有上帝的旨意在不断地、欣然地实现，公义统治着大地，罪恶不再压迫良心，激情不再奴役理智和意志，我们自己也不再羞于或害怕出现在圣者面前。这就是我们的理想，是上帝的国度，是所有矛盾的和解，是历史的终极，是历史的动力和推动力。上帝的国度不是事件的自然结果。

我们不能从荆棘中摘葡萄，也不能从蒺藜中摘无花果。神的国度必须是神自己的行为，是神启示的结果。

因此，我们需要启示的最终原因在于我们存在的道德断裂，在于罪，如果我们要从中得到拯救的话。

3. 的确，人们对启示的可能性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但这些反对意见很容易被排除。事实上，看似有效的反对意见只有一个，那就是“没有上帝”。否认有一位活生生的神的人，不可能承认启示的可能性。然而，为了掩盖这个真正的、唯一的原因，他们寻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然而，对于那些相信有一位永活且能听能看的上帝的人来说，启示的可能性只是他存在的简单结果。因为作为生命的上帝怎么会没有动作，作为爱的上帝怎么会保持沉默？这与上帝的本性是相悖的。事实上，启示与上帝的本性并不矛盾，相反，没有启示才会如此。

当有人断言我们对上帝和神的概念更有价值时，有人提出了奇怪的反对意见。

如果我们认为上帝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没有必要通过启示来加以改进，那么我们就对上帝及其完美性形成更有价值的概念。就好像上帝的工作的改进，而不是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的需要，才是问题所在；但其实是我们的问题，上帝必须首先用他的恩典和

真理来接近我们，使我们可以到他那里去。或者，有人认为，启示使人的心灵陷于单纯的被动，这是不值得的，也不符合人的天性，因为人的天性是积极的，需要自我努力。恰恰相反，事实是，真正最好的东西，甚至是最好的思想，都是赐予我们的；而我们的职责是接受它们，并在它们像星星一样升起在我们精神生活的地平线上时，将它们付诸实践。如果说在所有事物中，我们首先是接受者，然后才是自愿的推动者，那么在涉及最高级的真理和与上帝的交流时，情况更是如此。

总之，无论我们看上帝还是看我们自己，我们都不得不承认，启示远非不可能，而是与上帝和我们自己的存在相一致，与我们的本性和需要相一致。

4. 即使承认了这一切，仍有一个现代思想无法逾越的绊脚石，那就是神迹。说到启示，就会说到神迹。但有人断言，神迹是不可能发生的。古代世界承认神迹的可能性，因此认为它们是真实的，并相信它们。我们很多现代人却认为它们是不可能的。古代人认为自己有义务以超自然的方式解释许多无法以自然方式解释的事情，因此他们开始承认奇迹的存在。今天我们已经更深入地探究了大自然的秘密，对大自然的规律和力量有了更广泛的了解。现代思想为那片神秘的原始奇迹之林投下了一束光，驱散了它的晦暗；那些尚未明晰的东西很快就会变得明晰起来。现代思想要求一切都应自然发生。奇迹与现代思想相矛盾，现代思想不得不宣

布奇迹以及超自然启示是不可能的。

当然，思维要求一切事物都是自然的、必然的联系。那么，万事万物都属于必然范畴吗？只要人是自然存在物，只要人是自然历史的对象，人就确实生活在必然规律之下。但人仅仅是自然存在物吗？他不也是有人格、有道德，因而也是自由的吗？难道他不也是伦理的对象吗？伦理的范畴高于物理学的范畴。如果说，人是自由的，因为他是有人格、有道德的存在，那么，上帝不也是如此吗？那么，上帝是否受其自身自然法则的约束而不能自由行动呢？如果我们否认上帝可以创造奇迹，我们就必须否认上帝本身。甚至卢梭在这个问题上也表达得如此强烈，他说，“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即上帝能否创造奇迹的问题，即使不是荒谬的，那也是不虔诚的；如果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惩罚他就太给他面子了；把他关起来就足够了。但有谁否认过上帝能创造奇迹呢？”他接着说，“为了确定奇迹的真实性，我们需要充分理解自然的法则和力量”。我们无法确定奇迹的真实性，这是对奇迹的可能性经常提出的反对意见。但这种为了逃避承认奇迹而诉诸未知规律的做法，实际上就是康德所说的懒惰理性原则。我们都很清楚，不可能有什么未知的自然法则能让一个死人重新活过来。如果奇迹的真实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得到证实，而每一个奇迹都可以归因于某些未知的自然法则，那么负面批判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机去争论一系列的圣经故事呢？对超自然的信仰的确是一切宗教的基础。难道我们不相信世界是被创造的吗？而创

造又何尝不是第一个奇迹？因为任何事物的出现，如果不是由现有的自然规律和力量造成的，这难道不是真正的奇迹吗？因为任何事物的产生都不是由现有的自然法则和力量造成的，或者至少不是完全由它们造成的，而是包括一些全新的东西，它们被引入自然的秩序，但又不是自然的结果，这难道不是真正的奇迹吗？从最高意义上讲，这就是创造的真实写照。人类的救赎，或个人因神恩而获得的内在新生也是如此。因为在所有这些情况中，都有一个新的事实，它不仅仅是先前存在的原因的产物。

这种自由和奇迹般的力量存在于上帝的本性之中；这是我们都不自觉承认的事实。我们祈祷。这又何尝不是在相信奇迹呢？因为我们以此表明，我们相信上帝是一个自由的主宰者，他不受制于事物的现有秩序，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引导它们。如果只是发生必须发生的事，而不是上帝选择发生的事，那么我们不妨停止祷告，停止对获得我们的请求的一切希望。我们赞美自己，赞美朋友，祈求上帝的保护；我们在危难中祈求上帝，祈求上帝消除灾祸，祈求上帝使病人康复，祈求上帝的帮助，等等。这一切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相信的是一位永生的上帝，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当然，他的旨意不是茫无目的的，而是更高的目的的结果；然而，他所做的是因为他愿意，而不是因为他必须。这对上帝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正如让-保罗所说，“地上的奇迹是天上的自然事件”。难道上帝会受到自然规律的阻碍吗？马蒂亚斯·克劳狄乌斯曾经说过（iii. 29）：“一个激动的灵魂的

祈祷是否能影响或产生任何效果，或者是否如一些医生所认为的那样，nexus rerum（即事件的自然进程）不允许这样做，我不想争论。我非常尊重nexus rerum，但不禁想到参孙，他让加沙两座城门的nexus完全没有被破坏，却把它们带到了山顶；简而言之，我相信雨水在干涸的时候会落下，只要有人真心祈祷”。但有人说，难道奇迹不会废除自然法则吗？那么，上帝不也是自然法则的上帝吗？难道它们只是上帝自由意志的产物吗？难道上帝不能让它们服从于更高的意志和目的吗？但奇迹并没有废除自然法则，它只是将个别事件从自然法则的控制中抽离出来，将它们置于更高的意志和力量之下。我们可以在较低的领域找到一些类似的例子。如果我的手臂将一块石头抛向空中，这就违背了石头的性质，而不是万有引力定律的作用；但引入了更高的力量和更高的意志，产生的效果就不是较低力量的效果了。然而，这些力量和法则并没有因此被废除，而是继续存在。因此，在奇迹的情况下，更高的因果关系介入其中，产生了并非低等因果关系的自然秩序所产生的效果，但这些效果随后又符合了这种秩序。

此外，这种高级因果关系的最终目的与存在的最高道德目标是一致的。为这些目标做出贡献是自然最美好、最高尚的职责。因此，如果奇迹与这一使命相吻合，如果奇迹的动机是道德的、而非茫无目的的，那么奇迹就不是违背自然及其目的，而是在最高意义上与自然及其目的相吻合。然而，最高的道德目标是神圣的爱。正是神圣之爱将力量纳入自己的服务之中；正是人类的救赎在造

物的土壤上创造了新的和更高的历史；正是在基督耶稣里的救赎才是奇迹的原因和理由，因为上帝的启示。

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相信神迹。因为耶稣基督就是神迹。他不仅仅是自然前因和条件的产物。无论我们用自然原因解释了多少，对于每一个真正了解耶稣的位格和历史的人来说，——或者即使他不是从正统的意义上相信耶稣，而只是在基督身上看到了宗教天才或类似的东西，但他仍然相信耶稣，——我们再说一遍，即使对这样的人来说，也仍然存在着一种无法解释的事情，这种事情不能被视为仅仅是自然前因和自然条件的产物，而是超越了自然原因的限制，通向一切高级生命的最高源泉，通向上帝本身，而且必须被视为上帝的一种新的、直接的行为和恩赐。

这就是奇迹的正确概念，即它是上帝的自由行为，不是源于自然界原有力量的合作，而是从上帝那里产生，并与它们发生联系。大自然的秩序并没有因此而被严重破坏，而是得到了与之最相适应的东西。当我们说基督是一个奇迹时，我们是在说他是一种茫无目的的权力行为吗？绝不是。历史已经到了需要耶稣基督的位格和救赎的地步。然而，历史无法创造，却必须接受。耶稣基督是道义上的必然，但却不是一个自然的事实，而是一个超自然的事实。不过，超自然的事实成为自然的事实，因为它是自然的要求。自然生命产生了需求，但没有供应。供应是来自上帝的直接行为；但由于它是对需求的供应，因此与自然完全一致。因此，

神迹不是自然秩序的中断，而是它的完成。

如果这适用于耶稣基督，那么也适用于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中的所有启示。因为耶稣基督在历史中并不是孤立的；他不是突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而是之前漫长历史进程的目标，他就是之前历史进程的最终结果。我们称这段历史为：神圣的历史，“启示”。基督是整个历史的主导思想，因为他从一开始就是历史的目标。因此，它与他的显现一样，都具有神迹的特征。而且，所有之前和之后的神迹都有其合理性，因为它们都与他有关，构成了以他为中心的启示历史的一部分。

这就是它们的道德条件。正是在这一点上，《圣经》中的神迹，与其他所有神迹的区别就在于此。在圣经的神迹中，完全没有其他（所谓的）神迹中存在的那种梦幻般的、虚构的或武断的因素。我们只需将我们的福音书、启示录、或将耶稣的生平，与穆罕默德的生平相比，就会确信它们与此类虚构事件的距离就像东方与西方的距离一样遥远。尼布尔的批判敏锐性是公认的，无人能及，他剔除了太多的罗马古史；但他承认，“就最严格意义上的奇迹而言，只需对自然界进行不带偏见的探究，就会发现这里所讲述的奇迹除了荒谬之外别无其他；只需与其他宗教的传说或所谓奇迹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着多么不同的精神”。

简而言之，奇迹不是茫无目的的行为，而是道德上的必然，是启

示的一部分。

那么，奇迹与启示的真正关系是什么呢？

首先，它们是最受欢迎的认证形式；它们一直被要求作为一种明显的证据，证明有一种更高的力量在这段历史中显现出来，并以拯救我们的灵魂为目标。此外，它们还是事物本身的外在表现：奇迹是将纯粹的精神主题转化为自然的象形文字。自然是一个象征的世界。奇迹是最高级的象征。瞎子能看见，瘸子能走路，聋子能听见，麻风病人得到洁净，等等，这就是耶稣给施洗约翰的答案。耶稣并不仅是为了医治瞎子、哑巴和瘸子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是为了用外在行为的预表性语言向目光短浅的凡人展示圣灵的奇迹、人的精神和内在更新的奇迹。最后，神迹是启示本身的基本要素。耶稣基督就是神迹，因为他就是启示。我们信，不仅仅是因为神迹，我们信的是他所创造的神迹；如果我们要得救，他本身所创造的神迹就是必要的。

而且神迹就是启示，启示符合上帝的本性和旨意，上帝就是生命和爱，也符合我们的本性和需要。

5. 但我们如何辨别启示的真伪呢？所有宗教都诉诸启示。那么，基督教又是如何证明，唯有它是建立在启示之上的？我们现在不是要将基督教与犹太教或异教进行比较。我们以后再谈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要探究的是，我们相信基督教是真正的启示真理的依据是什么？

那么，让我们召集基督教真理的各种见证人，听听他们的见证。我们有使徒们的见证。他们的著作充满了真诚的精神。至少，他们的本意是讲述真理。事实上，他们不可能对其他事情感兴趣。那些以讹传讹的人也不可能像他们那样说话。他们的清醒也非常明显。他们不是一群盲目的狂热分子和狂热爱好者，他们是有理智和坚强神经的人。

雷南称抹大拉的马利亚为“高高在上的人”，因为他无法理解人们对耶稣基督的如此虔诚；但即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加利利渔民（众使徒）是头脑清醒的人。现代人试图将圣保罗改造成一个神经质的空想家，简直是荒谬之极。首先，圣保罗说他自己行了神迹。在写给哥林多信徒的信中，他特别强调，“使徒的神迹”，是在他们中间施行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 12 节，罗马书第十五章 18、19 节）。然后使徒们同声说：“我们是他的见证人。我们所听见的，亲眼看见的，亲手所摸过的，都告诉你们。”圣路加不是目击者，但他向我们保证说，他写信给提阿非罗，是为了让他知道自己所受教导的那些事情的确凿性。

现在，他们共同见证的中心点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历史上没有比这更充分的证据了。事实上，勒南谬误地断言，我们将这一事

实归功于抹大拉的马利亚高度丰富的想象力。他感叹道：“哦！神圣的爱力量，神圣的时刻，一个感官被欺骗（hallucinée）的人的激情给世界带来了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上帝。”但我们要说，这些都是亵渎神明的话，完全不符合历史学家的身份。因为历史事实是不能被这种华丽的辞藻所掩盖的。我们知道，门徒们所期待的不是这件事。耶稣的死让他们悲痛欲绝，毫无希望。当耶稣复活的消息传来时，他们无法相信，也不愿相信。两个要去以马忤斯的门徒说：“我们同去的几个妇人，早在坟墓那里，就叫我们惊奇；她们没有看见耶稣的身体，就来了，说她们也看见天使的异象，说耶稣还活着。和我们同去的人中，有几个人到了坟墓那里，发现果然像妇女们所说的那样，但他们没有看见他”。妇女们的叙述使他们毫无准备，无法产生新的希望，这使他们几乎更加悲痛欲绝。直到耶稣亲自作了见证，他们才确信无疑。为了让所有的门徒，为了让多马确信耶稣复活的事实，他们需要耶稣的再三显现。基督也不只是向个别人显现；他被许多人看见，最后有五百人同时看见了他，其中许多人在圣保罗写第一封哥林多书信（林前十五 5-8）时仍然在世；他呼吁的正是这些活人的见证。因此，一切欺骗、幻觉、病态视觉等的可能性都被消除了。复活被称为“意识中的事实”，只是为了用一个词来掩盖这一事件本身所带来的困惑。即使是最尖锐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基督复活的事实。鲍尔（Baur）说：“除了复活的奇迹，没有什么能驱散那些似乎要把信仰本身抛入死亡永夜的疑虑”。

除了所有这些见证，圣保罗还加上了自己亲眼所见的佐证。因为没有什么能使他这个耶稣的敌人和教会的迫害者成为门徒和使徒；没有什么能使他在仇恨基督徒的道路上找到灵魂的安宁。任何解释都无法摆脱这一事实。这个事实太强大了。不能说他只是幻想自己看到了耶稣，因为没有什么比这更符合他的想法了。以他当时对耶稣的态度，他宁愿为自己辩护说这是一种错觉。他之所以顺从耶稣，是因为尽管他不愿，却不得不这样顺服。如果他可以不承认，他绝不会这样做。不能说这就如同奥尔良少女也相信她听到了圣徒的声音。她确实听到了，但那是因为她希望如此，因为她生活在圣徒之中，因为圣徒与她的存在息息相关。但在圣保罗身上，他所看到的却与他所有的想法和愿望背道而驰。他不是一个热情的女孩。没有人做过如此伟大的事情。西方教会的基础就是他（圣保罗）的工作；这是建立在他的皈依之上的上层建筑，建立在复活的救赎主向他显现之上的上层建筑。有人会断言，有人会认真地断言，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祝福最多的事件，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奇怪的错觉的结果吗？如果历史上有任何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我们主的复活。而这正是神圣启示的印记和证明。

接下来，难道我不能让无数以死亡印证信仰的忏悔者（包括众位使徒）为耶稣基督作证吗？只要读一读他们殉道的记载，我们会确信，在这里，我们找不到任何狂热、固执或对死亡的骄傲蔑视，有的只是最平和的确信和最喜乐的信仰。

但不仅仅是殉道者的教会，而是整个教会在任何时候都在为基督作见证。教会本身的存在，正如莱辛所说，超越了所有其他神迹，它存在的事实，使它活跃的精神，它产生的效果，它所弥漫的精神力量，都证明了它的崇高起源，所有这些都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启示的证明；因为教会正是建立在他（基督）之上。基督的敌对者，他们对基督教的反对，他们集结的所有力量，在各个时期都被证明是徒劳的，甚至这些人也不得不见证。最重要的是，这个（犹太）民族居住在我们中间和周围，而他们的家却在异国他乡；这个最奇妙的民族，在它繁荣的时候是奇妙的，现在在它逆境的时候也是奇妙的，它是基督的见证。

除了这些证据之外，我们还有另一种证据，即我们自己的良心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共同见证，它是内在的证据，也是所有证据的印记。这是真理本身的见证；而最高级的证据总是真理对自己的见证。

当基督的话语靠近我们，进入我们的内心时，我的内心就会有一个声音被唤醒，那是我们自己良心的声音，说：“是的，这确实是你所寻找的真理，而且你寻找了那么久，却一直没有找到”。于是，我们所有沉睡的观念、模糊的渴望、对和平与和解的衷心渴求，都在我们心中复苏，说：“是的，这就是我们想要的；这就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寻求和渴望的”。人是一个问题、谜语，

基督的话语就是它的答案。

在代数学中，三个已知量和一个未知量（即 x ）的等式， x 的值找到了，解的正确性就通过它与其他量的完全一致和谐得到了证明。这里的情况与此完全相似。基督的话语满足了我们本性的等式；它是 x 的解，是我们内心未知量的解。我们的本性产生了需求，而启示则提供了供给，两者的完美和谐见证了启示就是真理。

当我们内心接受启示的话语时，我们就会体会到这种和谐，从而在实践中确信启示的真理。圣灵向我们的灵见证这是真理。这是真理内在的自我见证，是真理的最高证据——生命和经验的证据。真理是不言而喻的。莱辛说：“感受过电的益处的人，不会受学识渊博的人对电的各种观点和怀疑的影响，而会坚持认为自己亲身经历过电的作用。这就足以证明电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力量”。这里的情况也类似。真理所产生的效果就是其真实性的证明。外部事件可以从外部得到证明，数学命题可以从数学上得到证明；但道德真理只能从道德上，即内心得到证明。只有良心才能证明自己；这就是启示真理的不证自明。

每个人都可以掌握这种证据，与教育程度无关。这一事实是启示自证的基本要素；因为真理必须是大众化的。不能被大众接受的真理肯定不是最高级的真理，因为所有人类都是为真理而生，对真理充满渴望。因此，真理必须是所有人的专利。古代的哲学家

们试图用他们的体系取代他们那个时代不令人满意的宗教，他们经常宣称，他们的教义并不适合大众，而只适合思想贵族。现代哲学在更大程度上也是如此。相反，基督教是为所有人服务的；因为上帝希望所有人都能得救，都能认识真理。基督教使最崇高的真理成为最大众化的东西，成为日常生活的一种力量，甚至把最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提高到比古代世界最有教养的人以前所处的道德水平高得无以伦比的高度。将基督教真理铭记于心的人——这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比柏拉图懂得更多，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

6. 但有人说，基督教、启示与理性背道而驰，它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当然，启示超越了理性，而且不可能不超越理性；因为，正如莱辛所说：“什么也不揭示的启示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启示是可能的、必要的，那么在理性看来，发现启示中包含着超越理性理解的东西，就一定是对启示真实性的证明，而不是反对。那些想从自己的宗教中剔除所有这类事情的人，还不如不信教；因为什么都不揭示的启示又算得了什么呢？将理性“俘虏”为信仰的顺从，是启示这一概念本身的结果，或者说，理性是一个自愿的“俘虏”；一旦它确信启示的真实性，它的投降不过是承认自己的局限性。

然而，这种对局限性的承认是必不可少的。最伟大的思想恰恰是那些最不惧于作出这种承认的思想。苏格拉底是希腊最著名的智者，他把“我什么也不知道”作为自己超越他人的智慧。牛顿临死时称自己一生的努力不过是在海边玩弄贝壳，而真理的汪洋在他面前仍未被发现。此外，关于歌德，这位我们民族最全面的智者，众所周知，这种对局限性的自白是他整个思维模式的特征。我们了解自己吗？我们了解我们周围的大自然吗？歌德说：“人是一种模糊的存在；他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到哪里去；他对世界知之甚少，对自己更是一无所知。”他在另一处说：“我们都行走在神秘和奇妙之中：在最广阔的光亮中不可捉摸；她（即自然）拒绝被你揭开；她不向你的精神视线揭示什么；你不会用铁条和螺丝从她手中夺走什么；世界充满谜团。大自然总是蕴含着一些人类能力无法揣摩的难题。那么，我们有必要把我们狭隘的理解力作为现实和可能的标准吗？你们这些博学的绅士就这样展示着你们的知识：你无法触及的东西，你以为远在天边；你无法理解的东西对你来说——是无足轻重的、你不期望的也不可能是真的；是你不重视的东西；你把它们看得很轻；你不知道的，在你眼里一文不值”。

所有的知识最终都依赖于信仰。我最终必须相信我自己的心灵的真实存在性，相信我心灵所感知的事情的客观事实性。此外，每一门科学都建立在某些原则之上，而这些原则是直接承认的，其本身无法首先得到证明。因为每一种承认都是一种信仰，每一种

哲学体系都建立在这种基本的承认之上。甚至不忠也是信仰的问题；因为我们对事物的原理没有直接的或简单的同质直观，因此也没有绝对的确定性。一切都取决于什么基本信念会在人的头脑中留下无懈可击的真理的印象。没有什么知识是没有信仰的；因为所有知识都建立在对某种信仰的假设之上。即使是只承认物质和力的唯物主义，也是以信仰为基础的，是对这种看不见的力的信仰；因为它只是从力的作用中推断出力的存在。哈曼说：“我们自己的存在以及我们周围一切事物的存在都必须被相信，没有其他办法可以证明这一点。一个公认的事实是，一个人对知识的探求越深入，他就会变得越谦虚，因为他越能意识到自己所能达到的极限；而另一方面，一个人越肤浅，他就会越傲慢，因为他越是自以为已经摸透和理解了一切。因此，一般来说，年轻人比老年人更以知识为荣。青年对那些问题的了解要少得多，而我们越是想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就越是无法解决”。帕斯卡说：“理性的最后一步是认识到有无限多的事物超越了她；如果她没有达到这种认识，她就真的是弱者！”哈曼说：“如果我们首先明白理性是什么，那么理性与信仰之间的一切分歧都将停止”。那么，智慧的最高境界就是了解我们的局限性。

如果说这适用于一切事务，那么它最完全地适用于宗教领域，适用于上帝。因为这是最高真理的领域，也就是所谓的真正的真理。即使我们走遍整个世界，也不可能在其中找到我们所寻求的真理。所谓的真理的确有很多，但真正的真理只有一个，它能解开我们

生命的谜团，揭示我们存在的奥秘。这个真理不是从地球上生长出来的，它的血统超越了这个世界。我们都感觉到，就在我们知识的边界处，就在神秘的起点处，隐藏着我们渴望知道的、我们想要的、决定我们命运的东西。人类一直在探索这个神秘的世界，但只有启示给了我们关于那个世界的任何信息，而信仰是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唯一途径。

我们无法完全放弃信仰，因为所有看得见的事物都被看不见的奥秘所笼罩。那么，在宗教知识的问题上，我们又怎能不依赖信仰呢？这些问题只能通过信仰来把握，我们对它们的所有了解都建立在信仰之上。此外，如果说直接的确定性和内在的力量是每一种名副其实的信仰所特有的，那么宗教信仰则是所有信仰中最坚定、最可靠、最自愿的一种；因为它关系到我们生活和活动的最后和最高的问题，因此也关系到所有其他问题的最佳和最高的动机和理由，而所有其他问题都是在这些动机和理由中结合和完成的。没有任何基础能像对这些事物的信仰那样牢固，没有任何动机能像对这些事物的信仰那样具有影响力，没有任何原因能像对这些原因的信仰那样具有约束力，没有任何结果能像对这些结果的信仰那样影响深远。

这种宗教信仰自然会超越我们的理性，因为它涉及的是我们无法通过自然理解力发现的那些更高的真理。以上帝为主题的宗教信仰更是如此。歌德说：“人类理性和神圣理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

东西”。莱布尼茨也说：“在与上帝有关的问题上，如果一个人只相信自己的理性所能理解的东西，那么他就会削弱上帝的观念”。培根勋爵也有这样的话：“我们必须扩大我们的思想，使之适应神圣奥秘的广度，而不是使之局限于我们狭隘的理解力”。如果这句话适用于上帝，那么它在双重意义上也适用于我们的救赎计划；这些计划是上帝的旨意，除了他自己和他的灵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人的事，除了人的灵，没有人能知道；神的事，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能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他心中无言的秘密，直到他亲自揭示出来；然后，他向我们揭示了一些全新的东西，那是人心中从未想过的东西，一些不属于我们思想的东西，一些远远超越我们思想的东西；因此，我们必须让自己知道，我们应当相信，那些超越我们理性的东西。

但是，有人反对说，启示不也是与我们的理性相悖的吗？而这正是障碍所在。不可否认，启示不仅超越了我们的理性，而且在许多方面也与我们的自然观念相悖。但这本身并不是反对启示的决定性因素；问题在于，真理究竟在以下这两方面中的哪一方面？

(1) 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道德努力达到完美，这是我们自然观念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在道德努力方面取得的进步与我们所期待的回报成正比。因此，(2) 当启示告诉我们，我们在上帝面前根本没有功绩；人的根本错误在于他对功绩的要求；他因此完全丧失了上帝的认可，使他无法得救；我们只能靠恩典生活等等；——这当然是与我们的自然理性相悖的。

启示（圣经）让我们认识了一位谦卑地来到我们身边，与我们同甘共苦以拯救我们的上帝，这当然与我们的自然理性相悖。如果我们必须发明一种宗教和一种启示，我们应该发明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决不会想到如此卑微的启示：从耶稣在摇篮中的婴孩时代开始，到十字架上的死亡结束。我们应该选择希腊或罗马作为“启示”的地点，而不是把它放置在地球的那个犹太地、撒迦利亚、加利利的角落，放置在那个受到人类蔑视的国家。在这一切中，启示的真实面目与人类的理性之间无疑是对立的。使徒保罗强调说，对于单纯的自然理解力而言，福音，即启示，是“愚拙”的。对于理性而言，没有比启示、基督教更矛盾的了。但问题是，真理究竟在哪一边？如果我们的自然理性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启示就不应该与之对立。但是，我们的自然理性仍然是正确有序的吗？如果人是道德变态的对象——这一点谁也无法否认——那么，如果认为人的智力生活中有一个领域没有受到影响，那就只是用机器的眼光看待人。但是，如果它（理性）完全受到影响和败坏，我们就不能说，启示不可能是真实的，除非发现它与之（理性）相对立。

因此，我们在启示中发现的主要绊脚石和悖论就是上帝的谦卑、和他对我们谦卑的要求。“基督教的崇高悖论乐于以最微不足道的形式揭示最高的、绝对的神，同时也乐于以最微不足道的形式隐藏最高的、绝对的神；因此，只有通过最深刻的顺从和谦卑、

善于接受的心灵才能进入神的圣殿，而不善于接受的心灵、自我满足的心灵和骄傲的心灵则会产生对立和敌意”。因此，这种反对是支持而非反对基督教的证据。如果它是一个让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工作和功绩的启示，它会让我们高兴，因为它会滋养我们的骄傲；但那样它就不是真的了。然而，因为它让一切都取决于上帝的屈尊和恩典，所以它让我们不高兴，因为它让我们谦卑；但正因为如此，它才是真实的。帕斯卡说：“所有这些矛盾，似乎会让我远离宗教知识，但却最有力地吸引着我”。因此，尽管存在这种矛盾，但它始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唯一违背一般理性和人类本性的科学，是唯一历久弥新的科学”。

我们不愿意屈服于它，这本身就是对它有利的证据。帕斯卡说：“那么，请认识到宗教的真理就在于，它的被骄傲之人所拒绝的状态之中，就在我们对它的漠不关心之中”。帕斯卡说，“如果耶稣时代的犹太人都同意耶稣的主张，那么这种情况本身就会使他成为不信任的对象，因为这将是可疑的证据；而反之，犹太人的不信本身就应该成为我们相信他的理由”。“总之，启示与理性（即骄傲自大的理性）的对立，启示要求我们放弃这种理性的必要性，都是有利于启示的证据。没有什么比这种对理性的放弃更符合理性了。我们必须懂得在必要时怀疑，在必要时坚持己见，在必要时屈服”。

在这种反对骄傲自大的理性背后，隐藏着理性的真理，甚至是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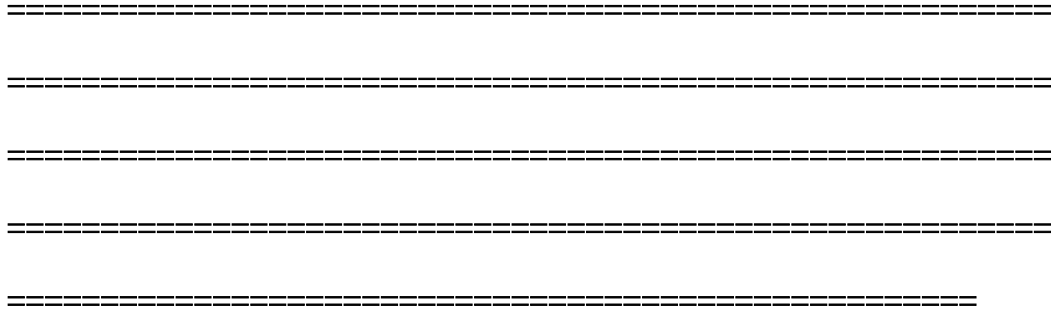
种隐秘的感觉和信念，即我们是为上帝而生，趋向于上帝，以及一种内在的道德意识，即我们是罪人，需要怜悯。

这两者是一致的。

在这个意义上，启示不仅仅是超越和违背理性的，而且也是与理性一致的。

正如为光而生的眼睛与太阳的关系，理性与神圣启示的关系也是如此。但要看到光，眼睛就必须睁开；要感知太阳，就必须与太阳保持正确的位置。同样，我们也必须睁开我们的理性，让它处于与启示的正确位置，这样它才能得到启迪。此外，我们还必须愿意让它受到启迪。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一个物体在我们眼前，我们却看不见它；一个声音传到我们耳朵里，我们却听不见它，因为我们的注意力没有放在它上面，因为我们没有愿意关注于这种印象。同样，如果我们不屈服于启示，就无法获得启示的知识。这种对知识的臣服就是爱。所有真正的知识都是对其对象的爱的吸收。只有对真理的爱才能理解真理。爱不是盲目的，如前所述，而是正确的，事实上，只有爱才是正确的，因为只有爱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及其隐藏的真理。只有用心，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尤其是真正认识上帝及其启示。正如帕斯卡所言：“人类的事物必须被认识，才能被爱；神圣的事物必须被爱，才能被认识”。走在这条爱的道路上的人不会不知道，启示是所有事物中与理性最

和谐的，甚至，它本身就是最高的理性，是理性的真理。



第八讲.

启示的历史——异教和犹太教。

启示是有历史的。它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类似于支配世间万物的发展规律。启示要成为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要与人类思想的进步相吻合，就必然要置于人类思想所遵循的规律之下。有人经常问，既然第一个人（亚当）的罪给人类带来了如此多的苦难，而且正如教会教导我们的那样，有必要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为什么上帝不在堕落之后立即消除这种苦难，恢复人类与上帝失去的交流呢？这一反对意见的答案就在于这一发展规律。上帝立即开始启示救赎，但这一启示是在历史规律下出现的。启示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有一般的历史；有历史，是因为有目的；有目的，是因为有上帝；有永恒的爱，是因为还有天意，天意主宰着人的命运，引导人走向神圣之爱所指定的目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目的，

人类的生活将是最悲惨、最乏味的。我们都相信，历史并不仅仅是错综复杂的迷宫或自我重复的过渡，而是一种进步。对于现代思想来说，没有什么比进步更确定，也没有什么比进步的要求更高。但是，如果没有目的，就不可能有进步。不是我们自己设定了这个目的，而是永恒之爱的思想安排了与我们有关的一切，也只有它才能实现这个目的。我们强调，这一目的被称为天国；实现人类最高的道德和宗教任务和命运，实现我们的道德和宗教理想。我们心中有这样一个理想，我们渴望它；它会实现，它必须实现。历史的秘密，也就是使历史成为崇高的沉思主题的秘密，就在于追寻或至少是猜想上帝引导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它赋予个人生活及其微不足道的行为以更高的意义和尊严，甚至可以说，即使我们的行为是如此微不足道，但只要值得称赞，就有助于完成人类崇高的道德任务，并将被上帝交织进人类的历史之中。

上帝将把我们交织在历史的大网之中，而历史的最终结果就是上帝的国度，真理、正义和完美的国度。

为此，上帝使用了自然生命的手段，即他所创造的无限多样性。在这种多样性中，存在着各个民族的特殊性和特殊使命。每个民族都有其特殊的任务来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但在某些民族中，这项任务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也更为决定性。人类的天职是文化进步。因此，有的民族是文化的民族，有特殊

天赋的民族，是文化几大任务的传播者。因此，希腊是艺术和科学文化的民族；罗马是立法的民族，等等。但宗教才是文化的灵魂和源泉。因此，宗教也应该是整个希腊和罗马所关心的问题，他们被赋予了文化的使命，使之成为人类所关心的问题。同样，宗教被置于一个单一的民族（以色列）之中，以便它能够遍及整个地球。在这个宗教的国度里，启示有了自己的家园和历史。启示的历史与文化的历史有着多方面的关系，但并不相互交融。但这些关系是将宗教转化为文化土壤的准备。

正是基督教使宗教和启示成为整个文化世界的关注点。于是，迄今为止各自为政的两大领域——文化世界的无启示历史和以色列的启示历史——便结合在了一起。基督教时代的任务是将两者彻底融合在一起。因此，人类进步的最大障碍，人类遭遇的最大不幸，莫过于文化与宗教这两个领域的分裂。

异教徒并非没有宗教，但他们不是未来宗教的传承者；他们的使命在另一个领域。他们的宗教是“野蛮生长的宗教”，谢林（Schelling）仿照圣保罗关于野橄榄树的比喻（罗马书 xi.）这样称呼它们；它们不是启示宗教。然而，它们并没有因此而脱离神的指引。即使是异教徒的宗教，也是按照上帝为他们规定的路线运行的，起到了“教育人类”接受启示的作用，因为它们存在的时间越长，就越显示出启示的必要性。如果说启示在以色列为人类经历了一段历史，那么人类在异教世界也为启示经历了一段

历史。这些宗教引导人类的思想超越自身，从而为接受启示做好准备。除非在这些宗教中存在着宗教真理的要素，而这些要素同时又是整个完整真理的积极准备，否则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事实上，使徒保罗在谈到异教徒时说，他们在世上没有上帝（弗二 12）。当然，他们没有上帝本身，这也是整个异教徒世界弥漫着悲叹的深层原因。然而，他们并非完全与上帝没有联系。上帝与他们有联系，他们与上帝也有联系。前者存在于作为其宗教根源的真理之中，后者存在于宗教感情之中，这种感情甚至在他们中间也能找到，并且在几个世纪里支配着古代世界的的生活。但是，宗教的客观性和主观性都经历了一段历史，这段历史是一个逐渐自我解体的过程，一方面导致无神论或迷信的沉沦，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种崇高的期待精神，或者至少是一种不满情绪，旧世界的结束为新世界的精神打开了大门。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这两方面及其历史发展。

所有宗教的根源都有真理的成分。即使是它们的错误，也不过是对隐藏真理的歪曲。若非如此，异教徒的宗教就不会存在如此之久，也不会依然存在。因为不是纯粹的谬误能够赢得和满足人类的心灵；任凭人类如何堕落，他永远不会彻底消灭他心中对真理的情感。个人可能会成功地扼杀他们自己心中对真理的情感，但国家将永远无法完全扼杀它。隐藏在异教中的真理起源于原始启

示，在人类分裂成不同民族之前，这些启示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这些启示是各民族从他们共同的家园带到异国他乡的遗产，在他们离开家园后，他们就以此为生。在许多民族中，我们都能看到“中保”的观念。历史越久远的上古时代，各种宗教的形式就越纯粹。历史研究和异教徒的传统都证实了一个公认的事实，即最初的上帝宗教观念比后来的民族宗教更为纯粹，因此使徒保罗将上帝观念的历史描述为真理逐渐被歪曲的历史。这种意识在时间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例如，瓦罗（Varro）告诉我们，罗马人在长达一百七十年的时间里都没有神像（即他们起初知道不应当用偶像来代替神），而他们使用神像的行为却造成了迄今为止无人不知的错误。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宗教的地位越来越低。

这种谬误的力量从一开始就存在于堕落的人性，它包含在异教的原则之中，并构成了异教的本质。因为它的本质就是把上帝引向世界。在任何异教中，我们都看不到纯粹的神的观念。异教不认识绝对的神，却把宇宙的力量放在神的位置上（即泛神主义），而这些力量不过是神所使用的器具，是神给自己披上的外衣。使徒保罗就是这样描述异教的本质的，在他论述异教的那段经典经文中，即罗马书第一章第 18 节等，尤其是第 25 节，最深刻的科学研究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描述【原来神的忿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

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辱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事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

宇宙的力量是双重的：它们属于自然或心灵。因此，一些异教更多代表自然阶段，另一些则更多代表心灵阶段。拜物教在它所崇拜的单个自然物中误以为发现了神，而印度的泛神论则误认为人类的终结在于将个人融入大自然的普遍生命之中。在这两种宗教之间，存在着一系列将自然神化的宗教。这种宗教在印度白人种族深沉忧郁的世界观和宗教观中得到了最深刻、最突出的体现。异教徒世界观中的泛神论在印度宗教的两种形式——婆罗门教和佛教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婆罗门教将这个易逝的世界看为虚无，而佛教则把易灭的观念落实到一切存在的终极原因上，并最终消灭一切，在绝对服从的观念中找到了对生活中一切罪恶的安慰。

在这里，自然宗教的泛神论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民众需要个人化的众神灵，以使它们可以向它们求助。因此，自然界的泛神论宗教到处都变成了多神教，多个神灵代表着自然界的力量；自然的孕育和生成力量是一系列神灵、象征和庄严仪式所代表的理念。我们已经从自然生命的力量中获得了极大的自由，现在却无法想象这些宗教能够对人们的思想实施怎样的暴政。他们可以要求其崇拜者做出最大的牺牲；无论是巴比伦最高贵的处女为了参与神性而通过宗教热情危及自己的身体，还是迦太基的年轻人为了宗教狂热而冲入火海，他们都不会拒绝。这是内心骄傲自高的力量支配着人类的心灵，同时也是感性的生活。

在这些宗教中，我们随处可见宗教中弥漫着一种力量，但自然生活是因此，所有这些感性的力量、并表现出宗教与放荡的结合，这对我们来说既令人厌恶，又难以理解。

当然，心灵宗教占据了更高的层次，但即使是心灵宗教也没有超越宇宙。希腊人崇拜的神只是人的观念。诚然，神性的观念在他们身上有所体现，但也仅仅是残缺不全的。希腊人对诸神世界的观念中充斥着一神论的特征，它试图在宙斯或命运中达到一种至高无上的绝对神性，但却无法保持它所要翱翔的高度，而总是被限制的障碍所束缚。希腊的民间宗教不知道全能的神，更不知道神圣的神，也没有爱神的概念。众所周知，它常把凡人的激情和恶行归结于它的神灵。在后来的哲学时代，确实发生了一场反对

这种将神的观念人性化的斗争，主要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努力将神的观念提升到更高的纯度和灵性。但是，古老的大众宗教经不起任何批判；对其教义和习俗的探究就是对它的消解，而哲学思辨则无法取代它。因为哲学不是为大众服务的，而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此外，柏拉图哲学缺乏构成宗教所需的客观事实基础。因为每一种宗教都必须诉诸于或已经诉诸于假定的或真实的事实。

若没有真实，就不能成为宗教。这也是阻碍奥秘成为宗教的障碍。在神秘的教义中，尤其是在埃琉西尼的教义中，人们的心灵在寻求大众宗教所无法给予的满足。他们承诺会解答宗教的基本问题，即赎罪和未来生命的问题。他们从全国思想最崇高的人中聚集了一批信徒。但他们的答案只是象征，而非事实，因此，他们与古老的神灵信仰一起衰落了。最后，神谕沉默了，人们得不到神的回答，在这种情况下，古代世界看到了一个重要的迹象，即古代对神的信仰时代已经结束。事实也是如此。一方面是怀疑论，另一方面是迷信。这就是古代世界的虔诚和宗教的问题所在。

在早期的时代，即使是在智力活动活跃的希腊，宗教观点、习俗和风俗对生活所产生的力量和权威也不可能形成太强的概念。我已经谈到了祈祷在古代世界的政治和私人生活中占据的重要地位。祈祷是真实的，宗教也是真实的，每一种生活行为都受到祈祷的支持和环绕。早期的异教是一种虔诚和宗教性的异教。雅典尤其享有敬畏上帝之城的美誉。但宗教的界限也是虔诚的界限。

祈祷和献祭实际上只是履行法定的义务，而不是内心自发的献祭。人类向诸神进贡他们应得的贡品，因为世界是如此分割的，统治权属于诸神，而非人类。因此，人类有责任承认这种关系，履行对诸神的义务，从而赢得并确保诸神的青睐。人与神之间不存在其他的个人关系。神对人没有所谓的爱，人对神也没有爱。亚里士多德认为，谈论对神的爱是完全荒谬的，因为爱只能存在于同类生命之间。虔诚不过是对依赖的承认。但是，单纯的依赖感并不能对人的内心世界产生特殊的道德影响；它可以抑制和缓和、却无法净化心灵，赋予人新的性情。这就是古代世界虔诚的程度。但是，当无边无际的自我主张的时代开始时，宗教的这种作用也消失了。伯里克利时代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标志着希腊生活的这一致命转折。将个人定义为万物标准的诡辩术为这一运动提供了支持，柏拉图的崇高哲学无法抑制这一运动，而时局的普遍状态则唤起并推动了这一运动。修昔底德用不朽的诗句描绘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后、雅典继瘟疫之后的道德沦丧，显示了一切神圣的神灵或人类崇敬的东西是如何开始受到蔑视的。从那时起，古代虔诚的消解过程开始了。宗教没有独立的力量进行成功的抵抗。古代世界的宗教是与国家结合在一起的；它们不是个人的宗教，而是公民的宗教。最高的宗教义务是按照国家的法律崇拜当地的神灵。渐渐地，国家的观念开始失去其以往对古代人思想的控制力，个人意识开始占据上风；事实上，起初往往是以一种未经授权的方式，以感官享受的形式出现。感官享受是异教徒的特殊恶习。而宗教本身也为这种恶习提供了养料。如果说更早以先的宗

教对这种恶习起到了辅助作用的话，那么此时的宗教则被滥用到了更严重的地步。诗歌和艺术助长了这种滥用。对我们来说，荷马的诗歌不过是美丽的想象力的游戏，并没有什么危险，因为谁会认为他的叙述是真实的呢？然而，让我们牢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诗歌已成为希腊人民的现实，在他们眼中具有与《圣经》在我们眼中一样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希腊的严格哲学家将诗人视为腐化者。

柏拉图希望将诗人排除在他的理想国之外。对我们来说，雅典的造型艺术只会让我们钦佩它的美感，这种美感为那些作品披上了不朽的魅力。但我们有大量证据证明，其中一些作品对他们同时代的人产生了危险的影响，而庞贝古城的街道则是艺术为最低级的感官服务的见证。此外，神庙成了放荡的场所，诸神的节日成了狂欢的场所。希腊已经如此，罗马后来也是如此。

因此，这种宗教越来越受到所有有思想的人的鄙视，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然而，哲学除了提供可能性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它，很快，除了怀疑之外，没有任何确定性的东西存在于思想领域。在奥古斯都时代，人们把信仰神灵的时代看作是一个遥远的时代；否认神灵的存在被认为是哲学头脑的标志。

斯多葛派哲学是泛神论，把世界当作神；而伊壁鸠鲁派哲学主要流行于受过教育的阶层，虽然起初允许神灵的存在，但神灵并不

关心人类事务，后来神灵从人们的信仰和思想中消失了。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试图通过对宗教信仰的自然化解读来消除对神的信仰。

但是，人需要超越自身的东西；尽管他可以百般辩解，提出相反的意见，但他并不是自给自足的。这种不相信的必然结果就是迷信的广泛盛行，普鲁塔克（Plutarch）对此进行了生动的描述。魔法师遍布整个帝国；他们所使用的仪式越迷信，得到的赞许就越多。这就是古代宗教思想史的结论。然而，这一切对未来都是有益的。因为在这种普遍的衰落中，产生了一种个人匮乏的感觉，这种感觉摆脱了古代世界的力量，为自己寻求哲学和宗教都无法提供的满足，而只有启示能够提供这种满足。

古代世界的道德也走上了类似的道路；因为宗教与道德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内在关系。道德必须与宗教共存亡。在古代世界的历史中，我们看到了许多高尚而真诚的人，他们在道德上赢得了我们崇高的敬意；正是在列奥尼达的英雄们身上，或是在那些高尚的希腊人和罗马人身上，我们才看到了古代精神所能达到的效果。尤其是古罗马，它比其他许多民族和国家都更具有道德上的真诚，这可以被看作是古罗马宗教精神的结晶。但是所展示的始终是公民的道德，而不是人的道德，更不是焕然一新的心灵的道德。古代的道德被限制在国家的范围内。当国家解体时，与之相连的道德力量也随之消亡。哲学从自身的资源出发，努力创造一

种可以证明自己有效的道德体系，但却徒劳无功。它既不能超越理论，也不能产生持久的效果，从未成为一种普遍的力量。甚至连它的理论本身也不得不引起我们最严重的忌惮。

诚然，哲学曾产生过让所有时代都为之钦佩的人物。尤其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可以说他们无论在智力上还是在道德上都比同时代的大多数人要高出一头。我们可以说，在他们身上，上帝向我们展示了人性中固有的高贵力量可以发挥到何种程度；但他们同时也展示了纯粹人性的道德力量所受到的限制。苏格拉底常常被拿来与基督相提并论，但他们之间的差距就像天比地高一样大。苏格拉底是道德和智慧的强者，但他不是人类的强者，而只是他自己民族的强者。只有他的同胞才是他的同胞，就他而言，不存在其他人。只有雅典才配得上他。对他来说，美德是政治性的、公共性的，就像对一般古人一样。在他看来，遵守国家法律是所有义务的总和。在其他方面，他也没有超越他那个时代的界限。他说：“一个人的美德在于征服他的朋友”。他招收弟子，引领他们走上智慧之路；阿尔西比阿德斯说，在苏格拉底的圈子中，他感到自己是另一个人。但苏格拉底并没有把他们培养成比他的同胞更高尚的道德。他的确让自己远离那些连最优秀的希腊人都会染上的感官恶习，而他认为这与他教导和改造青年的职责是一致的；他不仅允许，甚至还建议与仕女们交往。当苏格拉底听到人们赞美妓院女主人狄奥多塔的美貌时，他和他的弟子们一起去拜访了她，并与她进行了交谈，试图告诉她怎样才能更好地吸引

男人。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任何神圣的怜悯，这种怜悯向罪人宣扬悔改，为他们指明幸福之路。他当然反对恶习，但他认为补救的办法是更好地了解、而不是更新心灵。以希腊人的标准来衡量，他的一生是无可指责的，他真诚地寻求促进同胞的最大利益；但他对所有真正道德的精髓——对上帝和邻居的爱，一无所知。就连他的死——他无情地赶走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以免他们的眼泪和哀叹打断他与学生们的哲学讨论——又怎能与耶稣基督的死相提并论呢？卢梭感叹道：“大胆地将索福洛尼斯科斯之子与玛丽亚之子相提并论，这是多么大的妄想！”

柏拉图在道德高尚方面与苏格拉底不相上下。他的哲学弥漫着永恒世界的气息。他被称作“神人”，关于他的超自然传说流传甚广。但他也没有超越民族思想的局限。在他看来，人的道德任务是将真、善、美的永恒观念注入这个世界。但事实上，他宣称实现这些理念是不可能的。大自然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在心灵的领域里，神圣的原则占了上风；但物质却构成了不利的因素。因此，现实与理念之间的对立永远无法调和，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想呢？柏拉图也没有上升到国家的高度。他的理念不是人类与神的结合，他完全不了解这一点，而是一个理性至上的国家，一个哲学家的国家。他的观念是可以想象到的最不自然的观念，这种国家以其商品和妇女的共同体，以及抽象的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消灭了一切个人自由和财产，同样也承认它建立在骄傲的基础之上：只有权威代表理性；

其他阶级代表心灵的低级品质，直至本能和激情。

柏拉图的理想国需要弱小的婴儿和妻子们的共同生活。他赞同奴隶制，亚里士多德也是如此，因为奴隶只是一种工具，并不真正具有理性；他还容忍贞操问题等等。我们在这里找不到真正的人性。然而，即便如此，奥古斯丁承认，“没有人像柏拉图哲学那样接近我们！”可是，如果他们（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等）在绿树中只能做这些事，那么在枯树中又能做什么呢？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没有能力阻止他们民族的衰败，也没有能力用新的道德精神激励它，后来的哲学体系也不能比他们更成功。因为他们都在人自身的道德力量中寻求补救，并希望使人成为自己的救赎者。但是，任何道德理论，如果不了解道德生命更深层的源泉，而只是源于人的努力，都无法使人焕然一新。

在古代世界末期，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这两个哲学流派一直在争夺统治权。斯多葛学派是最严格的道德学派。但是，古代一般道德的真实情况，即它建立在自爱之上并由清高自傲支撑，在斯多葛学派的道德中得到了最高程度的真实反映。傲慢自大和冷漠顺从的精神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这里一样如此彻底地本土化。如果说基督教道德的根源是谦逊，那么斯多葛派道德的根源则是骄傲。谦逊是一个纯粹的基督教概念。古代已知的“谦逊”

(humilitas) 品质首先被基督教提升为高尚的美德。当然，斯多

葛派的智者不会对侮辱进行报复，但这只是因为他不能被侮辱，因为在他自己看来，侮辱者太小了，不会影响到他。这句格言不是从宽容的情感中产生的，而是从对他人傲慢的蔑视中产生的。斯多葛派的智者不怀有愤怒，不为激情所激动，等等；然而，这并不是因为他要安息于上帝，要充满温和与和平，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太崇高了，任何事物都不能打扰他的神圣一般的安宁。即使世界上存在着邪恶，也不会激起他反对邪恶的热情。在整个世界的进程中，恶与善同样重要，坏人与好人一样都有自己的角色，智者可以潇洒地冷眼旁观：而且，如果事情发展得太过分了，他可以主动离世，因为这个世界不值得他努力去做什么，他可以随意离开这个世界。这就是罗马共和国灭亡时年轻的加图，以及帝王时代许多人为了逃避暴政，甚至为了逃避沉重的疾病负担而采取的做法。

这就是古代末期高尚精神的道德。另一个体系是伊壁鸠鲁的体系，在受过教育的阶级中盛行，其原则是享乐。因此，所有的美德都在于节制享乐，而节制享乐是谨慎的要求，以免破坏快乐。必须承认，这是一种非常可疑和迂回的方式来达到美德的行为！这种哲学的实际效果可想而知。

这就是哲学道德。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道德呢？我们有一系列关于那时哲学家道德败坏的描述，将他们描绘成奴颜婢膝的伪君子 and 谄媚者，令人嗤之以鼻。“在大多数人中，”昆恩说，“在

他们身上，隐藏着旧哲学最大的恶名”。或者说，他们至少是软弱的人物，就像塞内加（Seneca）一样，尤其是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必须承认，他的格言与基督教的格言是如此相似，以至于后来的基督徒都把他的话当作他们的格言，但他的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空谈，他可以下定决心出卖他的文笔，他对尼禄的恶行表现出的谄媚甚至引起了那个时代罗马人的愤怒。

最后，大众的道德观如何？即使在最好的时代，细心的观察者也不难发现，古代国家的内核中存在着腐败的萌芽。而且，国家的文化越发达，这种腐败的萌芽也就越发达。拉丁文作家尤韦纳尔、普林尼、塔西佗、塞内加为我们留下了关于他们那个时代道德状况的描述，这些描述是众所周知的，它们所表现出的无耻程度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无法想象的。当时最优秀的人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这种状况；但他们深信事情不能再这样发展下去了，他们期待着世界末日的到来，对人类感到绝望。

只有永恒之爱才能提供补救办法。

从远古时代起，预言性的话语就充斥着整个古代世界，预言着更好的时代和即将到来的解救。其中一些预言部分是对过去漫长岁月的朦胧回忆，在当下仍闪烁着光芒，就像太阳离开后最后一抹暮色照亮了黑暗的天空；另一些则是渴望和追求的心灵的现身说法，就像星星微弱地照亮黑夜，预示着白昼的到来。

在彼此差异极大的民族中，都同样地有这种残缺不全的、古老的关于黄金未来的预言。波斯人希望有一个时代，一个救世主的时代，在那个时代里，阿赫里曼将被消灭，世界将焕然一新，摆脱一切邪恶！在那个时代里，全人类都将皈依遵纪守法的状态，恢复昔日的幸福生活。印度人期望，在当今罪恶时代结束时，第十位阿凡达（神通，即化身）将来到。佛陀的化身是第九次化身，而这次化身将是毗湿奴的化身，他将以卡尔基的名字出现、推翻一切邪恶，恢复世界诞生之初的幸福时代。甚至就连中国人也不乏这样的拯救者的希望。类似的其他东方民族也有类似的期望。

在希腊人中，普罗米修斯的传说深刻地表达了他们的期望。在古老的德意志诸神传说中，人们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对未来黄金时代的希望，那时整个世界将焕然一新，邪恶将被驱逐。善良、圣洁、睿智的 Baldr 是众神和人类的宠儿，却被邪恶的 Loki 用狡猾的计谋杀害了。众神和所有生物都在哀叹：人和野兽、树木和岩石都在哭泣。之后，邪恶的时代降临人间；争斗和流血事件增加；在巨人和众神的战斗中，奥丁和阿西斯（善神）被制服，世界被大火毁灭。但胜利者维达将恢复黄金时代，一个新世界将出现，春意盎然，万物丰饶；洛基将不复存在，巴德尔将死而复生；神和人将从毁灭中恢复过来，和平共处。墨西哥和南洋群岛也有类似的传统。总之，在异教徒的世界里，到处都流传着这样的预言和希望：当邪恶达到高潮时，这个充满罪恶和苦难的铁器时代就

会结束，甚至在这个时代统治世界的诸神也会被推翻。为此，一位来自天堂的皇家英雄将出现，击碎恶魔的头颅，让幸福和纯真的原始时代重现人间。

奥古斯都凯撒大帝在钱币上称自己为“世界的救世主”（salus generis humani），并让人在钱币上把他自己画成阿波罗神，根据普遍的信仰，他将成为新世界的统治者。诚然，这些都是虚假的谄媚或夸大其词，但它们还是表明了当时人们的希望和期待。此外，根据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塔西佗(Tacitus)和约瑟夫斯(Josephus)的记载，这些预言来自东方，预言一位胜利的国王将在犹太土地上出现，这些预言是普遍流传的。

但这种渴望不仅通过个人的言语表达出来。一种预言的基调、一种向往的特征、一种真理的预感充斥着所有异教徒。

当保罗来到雅典时，他向雅典人宣告了他们无知崇拜的“未知之神”。雅典人在瘟疫肆虐的时候在祭坛上刻上这一铭文，以便不遗漏任何一个神灵，这本身就宣告了他们对神的认识和崇拜是不尽人意的，因为他们因此承认自己没有掌握全部的真理。异教徒真正的目标是至高无上的神，尽管他们既不认识也不拥有他。他们觉得一定有一位至高无上的神凌驾于众神之上；他们称他为宙斯，或布拉马，或奥丁，但他们总是又把他拉回局限之中。当他们宣泄内心最深沉的情感时，这种对至高无上的神的隐秘信仰基础就

会暴露出来。特土良提醒异教徒们，在祈祷和其他表达内心情感的活动，他们不由自主地举起眼睛和双手，不是朝向都城，而是朝向天堂；不是他们所祈求的这个或那个神灵，而是至高无上的神本身。“我向上帝祈祷，上帝会报答我的”，等等。人类的灵魂啊。

异教徒世界的所有祈祷和献祭、所有赎罪和净化都是这种真理的呈现——这种呈现的实现是在永生的、位格的（能听能看的）、圣洁的、仁慈的上帝身上找到的。在某些孤立的事例中，我们也能发现这种对真理的吸引力正成为个人生活的主导力量。贾斯丁就是这种追求真理的最好例子之一，他自己也讲述了自己的一生。他从小就渴望真理和确定性。他从哲学家那里寻求满足这种愿望，但徒劳无功。他（贾斯丁）先是求教于斯多葛派哲学家，但却无法从他那里学到他最渴望的东西，即对上帝的认识，而这位哲学家似乎对此嗤之以鼻。然后，他（贾斯丁）又求教于一位裴斯泰洛齐派的哲学家，然而，这位哲学家主要是只关心数学。最后，他试探了一个柏拉图主义者，这个人最近在他居住的城市定居下来，他的学说进步很快。他完全生活在这一哲学体系所涉及的那些更高层次的思想中。这给了他更高的思想动力，他希望很快就能认识上帝本身。为了能够完全沉浸在这个思想的世界里，他隐居到了海边，以便能够在哲学的沉思中度过整个时光。在这里，他碰巧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的面容既庄重又温和，老人和他谈起了上帝、不朽和报应，很快就让他相信自己的知识是多么贫乏

和易错。老人让他参阅先知们的著作，并劝他最重要的是向耶稣基督本人祈祷，使他的眼睛能够睁开，明白神圣的真理。于是，贾斯汀感到灵魂深处燃起了从未有过的火焰。他阅读圣经，聆听基督徒的教诲，成为基督的信徒、基督教哲学家和基督教的捍卫者，并最终殉道的方式（公元 168 年）确立显明了自己的信仰。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异教寻求的样本范例。异教所寻求的，正是在以色列被称为保守者的启示中找到的。

现在让我们从异教转向犹太教！当其他民族的宗教生活被自然的力量所奴役，甚至堕落到迷醉的地步时，希伯来民族打破了这些枷锁，让人类的思想从自然败坏中解放出来，穿过笼罩着其他民族宗教思想的黑暗氛围，向着上帝——独一的上帝——迈进。将这种思想、这种对世俗之外的上帝的信仰与整个世界对立起来，与所有民族和宗教的压倒性权威相抗衡，毅然决然地不顾自己强烈的自然倾向而坚持这种信仰，并将其作为生活中一切事务的中心和目标，这确实是一种伟大的行为。

整个世界都被多神教充斥着。于是，上帝把亚伯拉罕这个家庭和由此产生的民族从与人类其他民族的联系中分离出来，使它成为古老真理和未来希望的保存者。当这个民族自认为是上帝的子民时，这并不是傲慢的想象，而是真实事实的表达。因为上帝与这个家庭和民族建立了特殊的关系；他在这里植入了他的真理，并把它像一块不可动摇的磐石一样置于万国的汪洋大海之中；他在

这里为他的启示史准备了舞台。真理、宗教、启示只限于这个单一的民族。正如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是民族宗教一样，启示的宗教也是（以色列）民族的财产，但这只是为了让它成为全人类的财产。这种信仰对整个民族都很重要，这种对未来的希望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和民族生活的灵魂。以色列的特殊主义蕴含着普世主义的萌芽。但正是在耶稣基督和基督教中，这种普世主义才得以展开和绽放。

而这正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特殊使命。它对人类文化并不重要，根本不像希腊人和罗马人那样重要。它的使命不在于是艺术和对美的感知；它不在于是哲学精神；它不在于是使其成为世界统治者的天赋；它不在于是伟大的立法能力；这些都是它的与众不同之处，也是它与生俱来的：它的全部重要性在于它是宗教的民族，受启示的人民。正是这一点赋予了它的全部文学以独特的性质。在《旧约》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是在犹太历史上相距最遥远的时期，在最不同的外部环境下，由不同智力水平的人，以最截然不同的心态，为了大相径庭的目的而创作的，既有历史性的，也有诗歌性的；既有抒情性的，也有说教性的；然而，所有作品都弥漫着一种精神；这就是宗教的基调，宗教的世界观，严格、热忱、崇高、谦卑的敬拜上帝的基调，这种基调在整个集体文学中占主导地位，并给它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这种独特的印记使它有别于其他所有民族的文学，并使它对全人类具有永恒的价值。我们可以从其他民族，从希腊和罗马，获得关于世界自然关系、自然生命的安排和构成的决定；——但最卓越的、生命的最高真理，以及我们与生俱来的对上帝存在的意识的确证，生命中所有事件对至高无上者、上帝的参照，简言之，作为生命真理、作为一切道德的源泉和力量的宗教，我们和其他民族一样，都是从以色列这个宗教的民族中获得的。

这种宗教及其心灵和生命绝对服从神圣权威的精神，并不是这个民族的自然产物；这不是它的本性，而是它的历史事实——上帝的作为。它不是这个民族土生土长出来的，而是由上帝引入并植入这个民族的历史和思想中的。他们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他们身上，错误的倾向和屈从于自然败坏和感性生活的力量的危险是多么强大。只有通过严厉的惩罚和痛苦的经历，只有通过上帝拣选和预备的宗教知识的伟大机构的积极斗争，只有通过不断的审判行动，宗教真理才得以在这里确立，成为造福于全人类的不可动摇的磐石。

三个伟大的思想支配着这个民族的宗教生活。首先是上帝。关于上帝的思想，是以色列人最突出、最崇高的思想。上帝是永生的、有位格的上帝，他是万物的主宰，与他相比，一切都是虚空和虚无；他是圣洁的主，由他产生的律法主宰着我们的尘世生活；他仁慈怜悯，穷人和受苦的人可以向他寻求帮助，全世界都可以向

他寻求祝福。以色列是意识到上帝的民族。

第二个思想是罪。律法是对罪的不断提醒和说服。献祭是律法所有仪式的核心。圣火要在祭坛上不停地燃烧，祭物要日日献上；所有祭祀的最高潮是在赎罪大日献上的祭祀，在这一天，大祭司作为民族的代表，将所有人的罪孽放在祭牲上，将赎罪的血带进至圣所、上帝的同在之地，把它洒在施恩座上，使人们可以从罪孽中解脱出来，与上帝和好。没有一个民族对罪的记忆比这更深刻、更真实、更强烈。这种意识是通过赎罪获得救赎的必要前提。

第三是即将到来的救赎。以色列是充满希望的民族。在这个民族中存在着关于救赎和救世主即将来临的古老预言，并一直将他们的目光投向未来。

从最遥远的年代起，人们就已经知道了从上帝口中发出的预言应许，即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的预言。这句话预言了人类通过那“女人的后裔”最终战胜世上邪恶的力量，它指向的是模糊的未来。随后的所有预言实质上都是对这一原始预言的进一步发展。罪恶和悲伤的增加，以及地球上需求感的增强，使人们始终保持着对未来的憧憬。在大洪水——所有国家的传统中都提到过——对现在不虔诚的人类实施上帝的审判之前，挪亚的父亲想起了古老的预言，表示希望他的儿子能给人类带来渴望已久的安息。挪亚的预言是人类在地球上新历史的开端；人类从洪水中重新站立起来，

挪亚的预言以深远的目光描绘了种族的未来，预言规定含的种族将被奴役，从东北部的蒙古一直延伸到西南部的非洲；而居住在亚洲中部和西部的闪族，则是上帝的居所：这里将是宗教的居所，在他的预言中，宗教的祝福将在这里实现。上帝通过对亚伯拉罕的呼召，揭开了启示史的新篇章。未来首先包含了关于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应许，但其祝福却包括整个世界。这一应许构成了未来所有预言的基础。这些预言的形式越来越明确，而实现的范围却越来越小，仅限于亚伯拉罕的后裔、犹大支派和大卫家族。万国之福、争战的英雄、统治将属于胜利与和平的国王，是它们的主题。当以色列在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时期达到其历史的高潮和民族发展的成熟期时，这个时期本身就成为未来的一个预表。一位像大卫一样通过受苦而获得荣耀的国王（诗篇 xxii）；一位像所罗门一样在智慧与和平中统治的国王（诗篇 lxxii）；因此，他（耶稣基督）是这两位国王的更高的对应物，是以色列历史的真正高潮，因此也是其他国家历史所趋向的真正终点；这就是未来的大卫之子和上帝之子，上帝子民的祭司国王（诗篇 cx）。随着以色列君主制外部形式的衰败，先知们笔下未来的精神形象也在现在的废墟上崛起。

耶和华的新的伟大启示将引领这个未来，作为之前历史的终结；启示的承载者将在自己身上结束预言，拥有上帝圣灵的丰盛，成为真正的大祭司和真正的、最终的君王；他也将通过受苦而获得荣耀，并将上帝幸福、荣耀、和平的治理带给世上所有的国家。

这是所有预言的一个伟大主题。每一位先知都以自己的方式，根据他所处时代的需要、上帝赋予他的任务以及他所受启发的程度来宣布这个主题。然而，就像在不同的环境下可以读出形式不同、本质相同的预言一样，不同先知的描述所包含的所有不同特征，共同构成了一幅关于未来祝福的伟大画卷。

这些预言和建立在预言之上的希望，一直伴随着以色列人；这个民族在巴比伦被掳时，在回归后遭受最沉重的苦难时，都带着它们（那些预言的福音）去了遥远的国度；在先知的声音开始沉寂，启示的口被掩盖时，它们仍像一盏明灯照亮着黑暗的道路；——直到过了很久，异邦世界出现了零星的期待和预言的声音——以色列人再次听到了预言的话语，它来自古老时代的见证人西缅，现在在他即将进入坟墓；也来自施洗约翰，新时代的预言家。

几年来，以色列一直被一个最严重的宗教问题所困扰。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位先知，他宣称自己是应许的弥赛亚，是上帝的儿子；他的话语的力量，他的言行的崇高，激发了全国大部分人最狂热的热情，却激怒了另一部分人，尤其是宗教当权者，使他们越来越强烈地反对他，最后爆发了最猛烈的暴力，把他作为亵渎神明者和煽动叛乱者推上了十字架。然而，不久之后，他的门徒们站出来宣布，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现在正坐在上帝的右手边，正如他自己所应许的，有一天会回来审判世界。以色列拒绝了这一信息，将耶稣的门徒逐出会堂，从此过着神秘的生活，成为基督教

的反对者，基督教随后开始征服世界。耶路撒冷的毁灭给他们的土地和城市带来了世界上从未见过的灾难，一百万人丧生，大约九万人被卖为奴隶，日光下的人们目睹了恐怖的景象，一提到这些，人们的心就会冻结。耶稣的预言预示了这一审判；基督徒们铭记于心，逃过这灾祸，而犹太人则蔑视地坚持着，直到被埋葬在燃烧的圣殿废墟之下。大约三百年后，当朱利安皇帝，也就是被称为“叛教者”的人，下令并开始重建圣殿，以证明基督的话是错误的时候，地震和火焰突然爆发了，基督教和异教徒的作家都证实了这一点。犹太人的子孙分散在万国之中；他们漂泊的脚带着他们走遍了全地。他们在各处建造居所，却又在处处形同陌路、不与当地人融合、保持自己的独特民族身份；他们的心灵和面容上都留下了他们出身的印记。尽管他们的敬拜仪式因圣殿被毁而变得不可能，他们也无法再遵守他们的律法，但他们仍以无比顽强的毅力坚守着昔日的传统。没有了国王，没有了祭司，没有了祭祀，没有了中心，他们仍然团结在一起，尽管已经分散成了碎片；尽管大卫的家族已不复存在，亚伦的祭司种族也不复存在，但只要他们不沉溺于当下的琐事，他们就会生活在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希望之中——这是一个历史之谜，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以色列的古老预言在马利亚的儿子耶稣身上应验了；而以色列，这个发生了这一事实的民族的大废墟，就是这一应验预言的纪念和见证。基督教是以色列之谜的解答。

但是，如果我说基督教，我就是说耶稣基督。基督教出现在世界

上，不是作为一种哲学体系，不是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而是作为基督耶稣这个人的事实。一切都取决于他。基督教的兴衰与他息息相关。给以色列带来危机的不是他的戒律，而是他的位格和关于他自己的见证。他自己使他的整个事业依赖于他的位格。我们不能把它与他分开。理性主义曾试图将基督教与基督分开，将其简化为纯粹的道德。但经验证明，这种尝试是不可能的。耶稣基督与基督教的关系不同于穆罕默德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也不同于其他宗教创始人与他所创立的宗教的关系；他本身就是基督教。谈论基督教，不是谈论教义和戒律，而是谈论耶稣基督。基督教的确是真理的总结，是一种新的教义，可以说是一种哲学，一种新的世界观，一种对历史的新解释，一种新的崇拜方式，一种新的道德观，一种新的生活准则，等等。它就是所有这些，因为它在本质上是一个普遍的事实。但是，所有这些都取决于耶稣基督的位格，与他同在，包含在他之中。因此，如果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基督教在历史上的地位和意义，那么，耶稣基督本身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就会映入我们的眼帘。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这个问题。

=====

=====

=====

=====

=====

第九讲。

历史上的基督。

《路加福音》的作者圣路加在叙述耶稣诞生时，用了几句看似不重要的话作为开场白，他说（路加福音第二章第 1 节），“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督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路加福音》在叙述耶稣诞生时说（路加福音第二章第 1 节），当时，凯撒-奥古斯都颁布了一项法令，要向全民征税，接着又说，征税发生在耶稣按照预言出生在伯利恒（大卫家族的故乡）的时候。因为其中包含了这两种情况：耶稣在历史上的出现与罗马皇帝所展现的古代时代的顶峰和终结相吻合；世界历史的进程从属于神圣历史的进程，以及它们之间由此产生的内在联系。

当时存在的时代本身就意识到自己即将终结。罗马帝国并非偶然，而是之前历史的必然结果。

我们或许可以说，每一位凯旋登上都城的罗马将军，在鼓掌的士兵和民众的簇拥下，都是皇帝的典范。庞培、安东尼、凯撒等几位大权在握者，在他们所处时代的狂风暴雨中，将自己凌驾于他们的同胞之上，他们不过是未来建立皇权并使之成为其家族永久财产的皇帝的初步雏形罢了。如果帝国不是之前整个成长过程的

成熟果实，不是之前历史的必然结果，那么这么多个世纪的共和国不会如此心甘情愿地向新的统治者投降。在帝国中，罗马的普世统治找到了它的终点，实现了它的使命。

以色列有一个古老的预言——见于《但以理书》（第二章第 29 至 42 节和第七章）——预言了各种普世统治的继承，人子和他的圣徒的王国将与这些统治的高潮相吻合。

一方面，人们意识到所有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另一方面，统治的本能很早就产生了将世界上所有不同的民族和王国联合成一个包括整个全地的大帝国的想法。这个傲慢而宏伟的想法可能首先要归功于巴比伦那位骄傲的君主尼布甲尼撒——当时的外国和民族离视野越远，这个想法就越宏伟。这种观念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人的灵魂中存在着一种与整个种族相互联系的意识，我们无法想象历史事件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是将人类联合成一个大家庭。历史的现阶段的确是多民族的，但其未来却是世界主义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观念是上帝自己对人类的想法；因为这是他的道路所要达到的目的。然而，就亚洲那些强权统治者构想它的方式和实现它的手段而言，这是对真理的亵渎；因为它是为野心勃勃的权力欲望服务的，因此只是对神圣思想的讽刺。但是，这种思想一旦被引入人类事务的进程，就会在逐步实现的过程中成为历史。从那时起，普世帝国的思想就成为了历史的动力。在一次又一次的实现尝试失败后，人们又开始了一次又一次新的尝试，以期通

过新的手段实现前者未能实现的目标。历史上有四次实现这一理念的伟大尝试，它们分别是巴比伦君主制、波斯君主制、希腊君主制和罗马君主制。人们对这些帝国的记忆分别与尼布甲尼撒（巴比伦）、居鲁士（波斯）、亚历山大（希腊）和奥古斯都-凯撒（罗马）的名字结合在一起。前两个帝国与以色列的历史密切相关，后两者则与基督教进入世界密切相关。

尼布甲尼撒率领军队把以色列人掳到巴比伦，解散了他们的国家和民族，从而对这个不顺服的民族执行了上帝威胁已久的审判。与此相反，居鲁士允许以色列人返回并重建他们的圣殿，使他们的国家恢复了一种形式，尽管这种形式很卑微，但它将经历并接受其古老希望的实现，以及真正救赎的祝福。应许之民与外邦民族的接触在这两种情况下都起到了作用，甚至将他们宗教知识和盼望的特殊真理移植到异邦的土地上，从而对异邦人实现了被拣选之民对世界所有民族的预言使命，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为救赎应许的实现预备了异邦世界。

另外两个君主国——亚历山大统治下的希腊和罗马皇帝——与基督教进入世界有着密切的关系。亚历山大的宏伟构想是建立一个庞大的帝国，他在对亚洲各国古老堡垒的狂风暴雨般的进攻中，迅速攻取了它的庞大帝国。

这个帝国从马其顿的山脉一直延伸到印度的河流，由差异如此之

大的民族组成。亚历山大早逝后，他的王国变成了一片废墟，由此产生的各个独立的国家，由受过希腊教育的人统治，只是为了继承亚历山大的事业，完成用希腊的语言和学问渗透东方世界的任务。然而，按照上帝的旨意，在当时整个文明世界实现的这种语言和学识的统一，将为基督教的宣布和传播奠定知识基础，而基督教是通过希腊语传入这些不同民族的。当然，在这里，正如在任何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神圣的思想指引着历史的进程。

然而，从亚历山大大帝国中产生的所有独立国家和王国都被并入了罗马帝国，从而也与西欧联合在一起，并被卷入了世界历史的洪流之中。罗马帝国提供了一种外在形式，正如亚历山大帝国提供了一种思想准备。正是通过罗马帝国，迄今为止还相互保留和排斥的众多民族联合成了一个伟大的整体，他们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和交往，这种联系和交往也扩展到了一般文化领域。

它将民族和习俗的多样性结合成一个更高的统一体，从而为基督教的伟大思想——上帝的国度——做好准备。与此同时，它还为福音传到西方国家准备了道路；因为罗马官员和军队从首都到各省之间往返的道路，或者商船往返航行的轨道，也是耶稣基督的使者带着生命的话语从幼发拉底河到罗马和西班牙的必经之路；在这一伟大的民族地区，当时世界的历史就是在这里发生的。罗马的特殊使命是建立罗马法的权威，并使其成为公共生活的保护力量。

正是在罗马法的保护下，基督教渡过了它的萌芽期；使徒保罗的一生向我们展示了罗马法是如何保护他抵御犹太敌人的狂热的，他的任务就是在罗马世界实现基督教的普世使命。

在基督诞生时代的时局状态——罗马帝国——词及其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的名字所代表的状态——是之前时代发展的结果。它的所有进程，甚至是智力发展进程，都在这里交汇。

这些民族被赋予了特殊的精神禀赋，他们是这种智力发展的保存者，也是向我们传递古代世界人类心智培养成果的渠道。在他们身上，人类的思想展现了其可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同时也体现了其巨大局限性。起初，一般的智力生活与民族和国家的观念有着最密切的联系。国家是社会生活的最高形式，所有其他形式，甚至家庭和宗教生活，都从属于国家。国家和民族之外的人类被忽视了。所有的智力培养在最充分的意义上都是民族的，事实上，起初是希腊的。在这个民族的智力培养之外，一般来说根本没有智力培育，只有野蛮。在希腊人眼中，所有其他民族都是野蛮人。道德和宗教也是民族的和政治的。美德和罪恶即是政治美德和政治罪恶，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宗教本身也是如此。基督诞生几个世纪后，异教徒哲学家塞尔苏（Celsus）仍然在宣称，人类的宗教、普世的宗教是愚蠢的。国家、民族是一切生命活动的源泉。但这一源泉很快就枯竭了。民族精神日益低落，最终熄灭。国家衰落了，人们放弃了对政治的追求，转而追求更普遍的文化。在

希腊艺术和哲学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希腊人寻求并找到了对他们丧失的民族和政治独立的补偿。

人们由此认识到，政治存在既不是精神生活的最高源泉，也不是精神生活的最深刻和最终的源泉。在普遍主义精神努力从民族主义精神中解放出来的同时，观察古代历史即将结束时所经历的精神过程是非常有趣的，这一过程贯穿于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宗教、道德和哲学。民族宗教的界限被冲破了，人们在最截然相反的宗教中寻找最好的宗教，然而在五花八门的迷信中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除了哲学家普罗提诺所表达的信念，即人不能接近神，但神必须接近人。在伦理学方面，人们也放弃了民族观点，而追求一种普遍的道德和道德哲学，这种道德在其表现形式上往往与基督教的道德有最明显的外部联系，尽管它肯定表现出精神上的完全不同，而且从不追求力量和现实。哲学也在寻求普遍真理，努力探索上帝与世界之间普遍关系的奥秘，但却无法超越怀疑和不确定性，最终对获得任何真理都感到绝望。彼拉多带着轻率和蔑视说出的“真理是什么？”这个问题被认为是古代世界的探究所导致的结果的无意识表达，这是正确的。发现真理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放弃这种毫无结果的热情似乎是最好的选择；然而，人类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欲望却无法根除。例如，亚历山大的推测的所产生的解释神的奥秘及其启示的想法，不过是真理的一个微弱的影子，可以说是实际果实的外壳，而实际果实仍未结出；然而，正因为如此，它预言了真正的、实际的真理，

它不是从人类心智枯竭的力量中产生的，而是作为上帝的行为进入这个世界的，而且是以那位能说自己是“我就是真理”的人的身份进入这个世界的。

因此，耶稣基督是所有古代历史（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所追求的目标——是整个历史发展所要求的目标，是历史结论问题的答案，是历史之谜的解答，是我们理解世界历史的钥匙。他是上帝神奇的恩赐和作为，从上而非从下而来，他不是世界的产物；但他是其要求，因此，尽管就他的本性和起源而言，他是超自然的，但就他的历史地位而言，他是其自然的目标。可以说，他填补了人类历史留下的空白，而人类历史自己却无法用自身的资源来填补这一空白。

这就是基督教的地位，即耶稣的地位。与此相对应的是，从未来的角度来看，耶稣在历史中所处的地位；他是历史的起点，也是历史的力量。一个新的时代从他开始，由他主宰。

耶稣在离开门徒之前，吩咐他们将福音传给万民，奉他的名给他们施洗，将他们聚集成新人类的教会，因为他曾应许他们，福音要传遍天下，要有一个教会，一个牧人。这句话似乎根本不可能实现；如果是在其他人的口中，可能会被称作疯子的话。因为这几个使徒，他们是没有文化的渔夫和公仆，是世界上最被鄙视的民族，他们怎么能够引导世界上的其他人接受一个以被钉十字架

的人为中心目标的宗教，这个宗教所宣布的救赎之道尽可能地远离谄媚人的倾向，与他们所有的自然观念截然相反呢？将人类视为一个伟大的统一体的思想，简而言之，就是一种全民宗教的思想，一种普世宗教的思想，一种包括所有民族、各种国籍、生活地位和教育程度的羊群的思想，我们所拥有和了解的教会思想，是人类有史以来所设想或表达的最伟大的思想。

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它的实现是奇迹中最伟大的奇迹；它是一个永恒的、无处不在的奇迹，它弥补了我们所有其他奇迹的缺失。路加在《使徒行传》的开头写道，上帝的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使他们成为新人，使他们能够借助这一新灵的力量征服世界，建立起一个王国，这个王国不像旧世界的王国那样是靠自然的力量建立起来的，而是由上帝之灵的话语创造出来的，它将永远存在。

没有比基督教在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胜利进步更崇高的主题了。

一切外在因素似乎都在合谋使它的胜利变得完全不可能。它的起源与它背道而驰；它似乎只是一个犹太教派。它的拥护者和追随者毫无吸引力可言，他们大多属于未受过教育的下层阶级。它的教义是绊脚石，“它似乎是最令人烦恼的愚昧”。它对上帝的敬畏也受到怀疑；因为基督徒不使用神像，被崇拜偶像众神的罗马人认为是无神论者。他们的“神秘”敬拜仪式被说成是最糟糕、

最不道德的。公众舆论对他们抱有偏见，哲学家们用思想武器攻击基督教，而当局则用残酷的暴力反对它。然而，它还是胜利了。早在尼禄统治时期，正如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愤慨地断言的那样，基督教已经广泛传播。尼禄为了转移自己在罗马大火中的罪责，处死了大量基督徒，但这并没有阻止它的发展，正如塔西佗所说，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犯了罪，不如说是因为他们遭到了所有人的憎恨。尽管如此，基督教仍在继续传播。小亚细亚比提尼亚总督普林尼写给他的朋友特拉扬皇帝的一封有趣的信，大约是在基督死后七十年写的，这封信至今仍然流传，清楚地描绘了当时基督教事业在圣保罗和圣约翰传教之地的状况。普林尼写道：“这种迷信已经在四面八方传播开来，在城镇、村庄和乡村都是如此；我们的神庙荒废了，祭祀已经停止很久了。——我逮捕了几个被称为女执事的女孩，对她们严刑拷打，但除了发现过度和有害的迷信之外，什么也没发现。她们承认，她们在黎明前聚集在一起，像赞美上帝一样赞美基督”。他还说，“他们彼此庄严约定，要过有道德的严肃生活”。一个世纪后，利昂在他的《辩道书》中可以对异教徒说：“我们不过是昨天的人，但我们已经占领了你们的整个国家、城镇、岛屿、营地、宫殿、元老院、论坛；我们只给你们留下了寺庙”。可以列举的大迫害就有十次之多，但这些大迫害都没能阻止基督教的胜利。不分年龄，不分性别；帝国的所有力量都被征用；某些最有活力的皇帝，如德西乌斯和戴克里先，认为他们的特殊责任是从世界上根除基督教，因为罗马帝国的存在就取决于基督教的灭绝。但在基督徒的

忠诚面前，刽子手的武器失灵了。戴克里先被迫放弃了他的工作；他退出了舞台，但基督教却留了下来，并以君士坦丁的身份登上了帝国的宝座，自此开始统治罗马世界，甚至是对外统治。

那些属这个世界的宗教，是以外在征服和感官享受为特征的宗教，“剑是它的传道者”。帕斯卡说：“穆罕默德通过杀戮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而基督则通过自己被杀而受苦。”从人性的角度来说，穆罕默德选择的是适合征服的手段，而耶稣选择的是适合被击败的手段。因此，与其说“穆罕默德成功了，耶稣基督也可能成功”，不如说“穆罕默德成功了，耶稣应该失败”。让任何人知道从一个人的心中根除自私自利的顽固地位有多么难，就会知道基督教信仰的传播是多么奇迹的事情；然而，这是一场与世界上自私自利顽固地位的斗争！不可否认，在罗马帝国时代，帝国的统一、遥远国家之间的交往、语言和教育的相同等外部环境有利于基督教的传播。但这些外部环境又何尝不是天意呢？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当时存在着一种感觉，即新的东西、比已知的更好的东西将会出现。但是，这种感觉又何尝不是上帝所安排的、旨在为基督教准备一条进入人心的道路的先前发展的结果呢？基督教及其倡导者的道德力量也是不可否认的。世人从未见过如此崇高的道德纯洁，如此挚爱的手足之情；异教徒也不禁为之钦佩。他们惊叹道：“看这些基督徒是多么相爱，”“他们是多么愿意为彼此而死！”。他们几乎是在认识对方之前就相爱了。甚至朱利安也对基督徒的圣行和兄弟之爱赞叹不已。讽刺作家吕西安说：“这些

人在苦难中彼此相助，真是不可思议。”“他们没有条件进行哲学思考，却像哲学家一样生活。”“基督徒的女人真多啊！”Libanius 惊奇地说道。

这一切又何尝不是耶稣基督之灵的果实呢？这种道德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戴奥涅图斯的书信》是早期基督徒的杰出作品，在谈到基督徒时说：“他们在肉身之中，但他们并不随肉身而活。他们寄居在地上，但他们是天堂的公民。他们遵守现有的法律，但他们的生活却使他们高于法律的标准。他们爱每一个人，也受每一个人的迫害。如果他们受到谩骂，他们会祝福；如果他们受到傲慢的对待，他们会表示尊重。虽然他们做的是正确的事，但他们却像作恶者一样受到惩罚，并以经受苦难而感到欣慰”。“殉教者以他们的坚贞成为基督教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传教士，他们的鲜血成为教会的种子”。拉坦提乌斯说：“男孩和少女通过沉默征服了折磨他们的人”。有些人甚至使刽子手也皈依了基督教。这并不是狂热，而是他们从基督之灵那里获得的新生命的明亮反思，使他们能够以宁静平和的头脑面对死亡，而不去想从人那里获得荣耀；因为在世人眼中，他们的信仰的告白是一种耻辱；许多人死后，只有上帝知道他们的名字。

所有这些事情都为基督教的成功做出了贡献，而且不能不做出贡献，如果没有这些途径，基督教肯定不会征服世界。但这些手段都是上帝和上帝之灵的手段。

征服异教并不像我们看起来那么容易，因为异教与人们的政治、社会和思想生活交织在一起，似乎不可能把它们分开、以至于一个连根拔起、另一个却屹立不倒。与祖先的信仰为敌的人似乎也是国家和整个文化的敌人。国家生活建立在宗教之上，并与宗教共同成长；宗教与政治密不可分。所有的国家行为同时也是宗教行为；所有的公共事务都带有宗教性质。基督徒被视为国家的敌人，甚至连爱国主义似乎也要求敌视基督教，因为基督教被视为对国家最危险的东西。所有早期的基督教辩护士都不得不为基督教辩护，以抵御这些责难。文化也是如此。艺术和科学以及所有的精神培养都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试图宣扬基督教就有可能毁灭各个时代的智力成果。基督教被视为野蛮的同义词。最初为基督教辩护的人不得不一再驳斥这种指责。即使在今天，我们也能对当时的状况有一个生动的印象。例如，我们只需进入基督徒举行仪式的地下墓穴或墓室，然后将其中一个墓穴与另一个墓穴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到当时的情况。

如果我们看到，人们在其中献祭的那些迷人的希腊神庙，或是他们聚集在其中观看欢乐场面的那些宏伟的圆形剧场，甚至是基督教殉教者与野兽的血腥冲突，就能感知和感受到，要战胜异教和异教生活的强大力量，需要多么强大的道德力量。

基督教确实战胜了异教徒；但它非但没有消灭异教徒，反而保存、

净化、接受了古代世界的文化，并将其与自身的存在结合在一起，传给了后世。在占领罗马世界之后，它又将现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日耳曼世界置于耶稣的脚下；使其人民成为向未来传播其教义的工具，并在他们身上发展出一种新的知识生活。教会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冲击，内部的争斗和外部的敌人、穆罕默德的虚假宗教、匈奴人和蒙古人的野蛮部落。但它经受住了所有这些危险和攻击，只是更加坚定地扎根于人们的思想之中，更加坚定地植根于所有人类利益之中。上个世纪末，这个国家确实出现了一帮人，他们努力并希望终结耶稣基督的宗教；法国也很快出现了一场风暴，威胁着基督教会的灭亡。但风暴过去了，教会屹立不倒；而基督的信仰却从它所经受的苦难和时代的可怕骚乱中获得了新的力量和喜乐。我们所处的时代也同样是一个充满冲突的时代；目前在思想舞台上攻击的对象无非是基督教的至高无上地位。但基督教的拥护者们非但没有气馁，反而把在国外对敌人的进攻与在国内的防御结合起来。许多世纪以来，没有一个时代像现在这样在异教徒中开展传教活动；尽管实际取得的进展可能很缓慢，但这仍然是一种进步，所有人都坚信，基督的事业必将在万邦中取得胜利；使徒所说的“对于耶稣的名，万膝必跪拜”必将实现；诗人所说的“争战不会停止”必将实现：

“争战不会停止

直到胜利为他的事业加冕；

直到每一个最遥远的民族

臣服于他的律法”。

基督教在历史上的进步是胜利的进步。

这就是耶稣基督的胜利。

当我们说基督教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说耶稣基督，因为一切都取决于他。基督教的含义就是在基督面前俯首称臣，尊他为我们所有人唯一的、永恒的救世主。然而，基督教并不仅仅是一种拥有外在主权的力量，而是一种行使内在和精神权威的力量。由此征服和更新的不仅是各民族的外在宗教，还有人类的整个思想生活。随着基督教的兴起，一个新的时代降临到了人类的心灵以及我们种族的整个道德和社会生活中。基督教开创了人性的时代。在它出现之前，人们从未将自己视为一个大家庭的成员。在此之前，人类的人格权利从未得到承认。所谓人的权利就是基督教的成果。它没有改变社会的外部安排；它将法律和特权、礼仪和条件、习俗和等级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但它在所有这些生活关系中引入了一种新的精神。它甚至没有在表面上废除奴隶制；但它教导所有人承认奴隶是人，是基督徒兄弟，从而在内心深处打破了这一令人反感的制度。它使妇女的地位从低贱提升到最尊贵、最有影响力的地位。它使爱情（正如孟德斯鸠所说，在爱情产生之时，爱情还只是一种无法命名的形式）成为心理和精神生活中最崇高、最温柔的力量。从前，异教世界中的父母在自己孩子出生之前或之后可以毫不犹豫地毁灭他们，因为他们被视为父母的财产，拥

有者完全有理由按照自己的意愿处置；基督教使孩子们脱离了父母的专断权力，并将他们置于救世主的保护之下，宣布他们通过洗礼成为上帝的儿女和天国的承受人。它创造了一种新的基督教家庭亲情，这种亲情是如此挚爱、真诚和自愿；在基督教到来之前，人们甚至不知道这种亲情，也认为这种亲情是不可能的。直到基督教出现，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邻里之爱。基督教将人性引入世界，并灌输了同情的美德。基督教世界历史上著名的对病人和穷人的关怀，就是它的幸福果实之一。爱、顺从、自我牺牲的精神是道德生活中最可爱、最高尚的产物，这种精神源自基督教，源自基督的十字架。正是基督教打破了阶级、民族和国家之间的隔阂。在此之前，世界上从未有过像国际法这样的东西，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社会的框架都依赖于国际法。历史不是一场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持续战争；权利和法律构成了国家生活的基础，因此，商业和交往以及人类的普遍文明在地球上成为可能，这些都是基督教带给我们的恩惠。除了法律和正义在各国的至高无上地位之外，基督教还结合了温柔的精神，提醒人们即使是罪犯也是人，应该成为我们同情的对象，因为他是上帝怜悯的对象，因为拯救他的灵魂是上帝的旨意。除了基督教承认的人格权外，它还确立了私人判断权和良心自由的权利。

基督教的第一批捍卫者也是良心自由的第一批宣扬者；无论教会的拥护者有时如何违背这一原则，但良心自由本身就是基督教的成果，其必要性现已成为普遍的信念和承认。但基督教赋予良知

的不仅仅是自由；它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它做的远不止于此：它还给良知带来了安慰，给灵魂带来了平安，使人摆脱罪感，意识到自己得到了宽恕，确信上帝的仁慈，因为耶稣基督的献祭为罪作了永恒的赎罪，良知的创伤因此而愈合，思想从焦虑中解脱出来，心灵从沉重中解脱出来，这是一切苦难中最好的安慰，是今生一切忧伤的最好补救，同时也是一切工作和行动的真正道德力量。因为生命的价值与在其中所做的工作是成正比的；但快乐工作的力量取决于一个确信得到上帝宽恕的良知。因此，基督教通过宣告上帝在基督里的仁慈，同时也成为一种新的、迄今未知的道德力量的源泉。古代世界甚至无法对基督教所记述的人物形象形成一点些微的想象——完全道德的人物形象，他们在做事和受苦方面同样伟大，在自我牺牲和积极进取方面同样伟大。

也正是这种新的道德力量的注入，使人类在艺术和科学的各个领域和精神努力得到了滋养、发展和提升。除了基督教，还有什么能从心灵和思想的隐秘深处唤起科学研究的严谨认真和多才多艺，艺术表现的崇高纯洁和真实，诗歌创作的深度、心理真实和丰富性？总之，基督教不仅在宗教意义上，而且在知识和道德意义上，都成为人类新生的力量。

诚然，以基督教的名义犯下了许多不公正，甚至是臭名昭著的罪行。但这是对基督教名称的滥用，也违背了基督教的本质，而基督教本身与这些行为毫无关系。基督教世界也经常会出现道德黑暗

和错误，这也是事实。但是，基督教世界的人们总是能从道德沦丧的深渊中挣扎出来，从而表明基督教与其他所有宗教不同，它拥有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生命力，通过这种生命力，它甚至能够从最深的腐朽中焕发出新的青春。它的生命和活力来自永恒的源泉，唯有如此，它才能成为人类新的生命力。

这种新的生命能够注入生活的每一个阶段，因为它的本质是精神性的，而不仅仅是任何一种特殊形式的外在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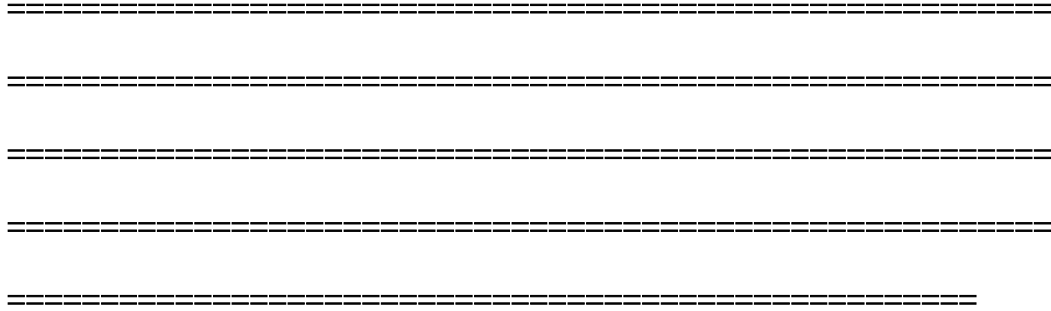
因此，它也同样能够呈现出最截然相反的外在表象，能够进入最截然相反的生活并成为其灵魂。在教会的不同时代，基督教的形式何其多样！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它在殉道者的苦难中庆祝胜利，在地下墓穴的晦暗中举行仪式；在君士坦丁之后的时代里，它让十字架成为征战的旗帜和王冠上的第一颗宝石；在中世纪，它从罗马向世界颁布法律，建造辉煌的大教堂，并从其富饶的怀抱中孕育出丰富的诗歌世界；在宗教改革时期，它通过谆谆教诲唤醒并抚慰人们的良知，为西方世界注入新鲜的精神活力；在德国的战争狂热时期，当它用慰藉的赞美诗抚慰被碾压和践踏的人民时，或者当它后来赋予人类心灵以权利，使其适合后来大胆的哲学研究时，或者当它在这片土地上安静的狭小圈子里植入新未来的萌芽时；或在本世纪，当它在我们的人民面前前进，带领他们取得摆脱外国奴役的胜利时；或在最近，当它唤起同情的精神，将被遗弃者聚集到避难所，或在病榻上施以援手时。——在所有

这些不同的方面下，它始终保持着同一性。

今天，基督教和教会是以何种不同的形式存在的；是以何种不同的礼仪和习俗、教义和崇拜的形式存在的——在北方和南方的民族中，在文明和未开化的民族中！无论其形式如何多样，无论其关系如何千差万别，它始终是相同的：对耶稣基督——罪人的救赎主——的信仰的告白！所有教会在一件事上是一致的：对上帝、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使徒式信仰告白（《使徒信经》），是所有基督徒和教会的共同信仰。如果在人与人之间找不到其他的共同信仰，那么基督的十字架就已经在人与人之间建立了合一，一个信仰与告白、爱与盼望的合一。无论他们的知识文化水平有多高或多低，十字架的传道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智慧；无论他们的国籍有多不同，在基督耶稣里，所有人——印度人和欧洲人、黑人和亚洲人——都肃然起敬。他们敬拜那同一位主，他们的老师，他们的救赎主，他们的王。

这就是基督教在人类中的普遍地位。它是一种更新生活各个方面的神圣力量。但基督教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因为它源于耶稣基督，归于耶稣基督，存在于耶稣基督之中。他就是基督教。因此，耶稣并不像其他人一样，而是具有普遍的重要性，是神圣生命的承载者。那么，他怎么会像勒南所说的那样热情癫狂，而他的门徒们更是如此呢？一条如此纯净、如此富饶的溪流不可能从如此黑暗的源头涌出。从他那里流出并仍在流出的祝福证明了这一点：

这里是上帝的启示，因此也是世界的光明和生命。他是永恒的生命；在他里面，我们拥有上帝。这也是福音书对他的见证。



第十讲

耶稣基督的位格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研究课题能像关于耶稣基督的位格一样，如此引起当代人的宗教兴趣。也没有任何其他主题有权要求同等的关注；因为这是一个涉及基督教本身，甚至是世界历史的问题。正如让-保罗-里希特（Jean Paul Richter）所说：“这关系到他，他是大能者中最神圣的，是圣洁者中最伟大的，他用被刺穿的手把帝国从铰链上掀起，使世纪之流转变航道，至今仍统治着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对教义的兴趣确实远远低于对历史问题的兴趣，然而历史不过是教义的载体和外衣。事实上，关于教义的争论已被带入耶稣基督的生命史中。在这里，彼此间的对比是何等的强烈！就像永恒的上帝之子与约瑟之子之间的差别一样大。

这些对比是古老的，尽管在今天更加强烈。

从一开始，基督徒就把神圣的荣耀献给了耶稣基督。即使在《新约》中，他们也被称为“求告主耶稣之名的人”。普林尼(Pliny)在他写给特拉扬皇帝的书信中提到了基督徒在集会时对基督像对上帝一样所唱赞美诗。即使我们对使徒教会关于耶稣的教导一无所知，那么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证明他所受到的神圣尊崇。然而，我们很早就遇到了基督教会教义的双重反对，一种是来自犹太教的，一种是来自异教徒的。犹太教的错误在于，仅仅认为耶稣只是最伟大的先知，他超人的伟大在他真正的人性中消失了。异教徒的错误在于，他们仅仅在耶稣身上看到了超人的存在、他从更高的领域降临人间；但它将耶稣的历史真实化为纯粹的表象。在前者中，历史占了上风，贬低了观念；在后者中，观念占了上风，贬低了历史。教会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了两者的结合，历史与观念的结合，神性与人性的结合。事实上，二者如何才能结合成一个完美的统一体，这对理性来说仍是一个难题，理性永远无法完全理解这一事实。然而，即使是自然生活中的问题，只要它们超越了表象，我们也远未达到充分了解事实的程度！而且，教会的信仰和告白与人类理性理解和探索耶稣基督的奥秘的尝试无关。在这一信仰告白与主干教义上，各教会从来都是一致的。与信仰的一致性相比，教义上关于这个问题的分歧微不足道。所有教会的基督徒从来都是一直向耶稣的圣名屈膝。

理性主义抹杀了基督人格中的神圣因素，也抹杀了一般的超自然现象。甚至当它谈到“天国显现”时，这也只是一种比喻，因为在它看来，耶稣仍然只是最伟大的道德导师。但人们很快就意识到，单纯的道德导师并不能满足事实的要求。基督教是一种远远超越了单纯道德界限的现象。福音书中描绘的肖像太伟大了，“拿撒勒的睿智拉比”无法实现；哲学推测试图把握基督教更深层次的思想。但是，如果说理性主义是以牺牲思想为代价来鼓吹历史，那么投机主义则是以牺牲历史为代价来鼓吹思想。对于他们来说，耶稣只是一个象征，例如，斯宾诺莎认为是神圣智慧的象征；康德和雅可比认为是理想完美的象征；谢林和黑格尔认为是神人合一的象征。对于他们来说，耶稣本人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了这一理想，或他并没有完全达到这一理想，这一点无从谈起；但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因为一切都取决于观念，而不是事实。但是，说服我们接受这样的观念是徒劳的；因为《福音书》如此强烈地吸引着我们，使我们对它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除了耶稣本人的历史真实性之外，它还能是什么呢？我们觉得不可能仅仅停留在理念上、并满足于此。然而，施特劳斯试图从这一理念哲学观点出发，彻底摆脱历史。他几乎把所有的历史都归结为虚构，而虚构的起源则是基督教会的诗歌精神，只留下了历史真实的少量残余。但是，如果《福音书》中的耶稣是教会的产物，那么教会本身又是谁的产物呢？施特劳斯给我们留下的耶稣历史的少量遗迹，与它们被说成是其原由的效果并不相称。另一方面，勒南

深信，这段历史所发挥的力量过于巨大，不容许将其化解为神话。在这方面，他的著作比施特劳斯的著作更进一步。他向历史现实致敬。德国人的哲学思想可能满足于抽象的概念和观念，而法国人更为现实的思想则要求历史事实。他正确地指出，耶稣诞生的原因必须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相吻合；耶稣不可能只是传记作者虚构出来的；福音书中的历史必须是真实发生过的。通过对事实发生地的考察，这段历史在他眼中获得了明显的体现。在他眼中，耶稣是一个伟大的人。但他竭力逃避承认，他的自然主义世界观不允许他这样做。他用了许多华丽的辞藻和华丽的句子来逃避一个简单的承认，那就是耶稣这个人是一个奇迹，他的历史的本质是超自然的。因为勒南绝对否认超自然和奇迹；因为他不承认这个有限世界之外的世界，不承认自由而有位格的上帝，也不承认个人的不朽。然而，神迹是耶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他宁可将其视为耶稣本人的妄想和欺骗，并将“目的使手段神圣化”的格言应用于耶稣身上；换句话说，他宁可抹杀耶稣的道德品格，也不承认在耶稣身上我们确实遇到了超自然的力量。但是，只要道德感还存在，它就会反驳耶稣使用了各种手段的说法，甚至连普通道德也无法容忍这样的说法，例如，假装了解人们的想法，或有意识地玷污他的教导的纯洁性，掺杂狂热的激情，以增加其效果，因为人们愿意被欺骗；或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并把这一声明作为他的王国的基本原则，而他自己的知识却反对这一声明；或在客西马尼悲哀绝望地想着他家中闪闪发光的溪流，想着随时准备把感情献给他的加利利少女。

这些亵渎想法只会在勒南的心中产生。这样的想法只能出现在一个想象力天马行空的人和一個现代巴黎人的脑海中。不，只要《福音书》存在一天，它们就足以驳斥这种对那纯洁中的纯洁者的亵渎。

首先，请允许我就福音书的总体情况说几句话。

耶稣本人既没有创作，也没有留给我们任何著作；因为他不是哲学家，也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宗教创始人。他的位格和工作就是他在人类历史上用大字刻下的著作；他的灵在人心中工作就是他日复一日在我们心中用无法镌刻的大字刻下的书信。然而，他的门徒们确实写了一些著作，我们从这些著作中获得了有关他的更详细的信息，自五旬节以来在世界上流传的关于他的口述传统和宣告也通过这些著作得到了支持和保存。事实上，即使我们没有福音书，我们也可以确信耶稣基督的存在；教会本身，它的存在本身，就是我们的福音书。而且，即使口耳相传的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在细节上存在不确定性和差异，我们也可以确定他的主要生平事迹。这种细节上的不确定性不会破坏我们对总体和整体的确定性。即使他的所有事迹都没有被写成文字，他一生的主要事实对我们来说仍然是确定的，而且可能几个世纪都是如此。然而，即使是拿破仑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印象，与耶稣在他们心中树立的纪念碑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前者留下的影响，与后者完成的

工作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因此，我们的信仰并不仅仅取决于著作及其真实性，而是取决于属于历史的事实，以及在我们心中产生的影响。然而，文字叙述是我们信仰的支撑和捍卫。它们如此生动地向我们描绘了我们所认识和热爱的那位神的形象，以如此崇高的纯洁和鲜活的力量表现了他的特征，以至于我们只能在其中辨认出上帝的手指，并把它们当作我们最好、最珍贵的世间珍宝来尊重和敬仰。

对这些书籍的一再攻击，使人们，尤其是不明真相的人，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即这些书籍并不像基督教会迄今所认为的那样牢不可破。然而，这种怀疑不仅完全没有根据，而且，从所谓著作的不确定性来推断事实的不确定性也是极其武断的。

那么，福音叙述的情况如何呢？

不要忘记，这些福音书并不像在图书馆中偶然发现的著作，人们有理由对其来源产生怀疑，因为它们再无其他了解。它们并非源于私下，然后从私下走向公开，而是从第一个基督教会的怀抱中诞生，可以说是在它的眼皮底下写成的。从一开始，它们就得到了福音史口述传统的认证，对其起源的记忆一直伴随着它们。

最早的基督教教导到处都与福音史有关，因为传福音就是传耶稣基督。他生平的重大事实、他所说的话、他所经历的命运、他的

受难、他的死亡、他的复活，这些都是使徒布道的主题。基督教教会的所有兴趣都集中在耶稣基督的人格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宗教团体对其创始人的历史有着与基督教会相似的兴趣。因为耶稣基督的历史事实就是其宗教信仰，而事实的确定性就是信仰的基础。使徒书信向我们展示了原始教会对耶稣生平的生动记忆。即使我们没有拥有福音书的叙述，也可以从使徒书信中收集到基督生平中所有更重要的事实。这些书信是在耶稣死后二三十年写成的，也就是说，是在第一代基督徒的生活期间写成的。

此外，使徒书信中的基督与福音书中的基督完全相同。很自然，当第一代基督徒开始衰落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原始教会这个时代开始后的六七十年间，人们首先感受到了对这种关于耶稣生平的书面叙述的需要。这些著作以福音书的名义，自第一世纪末以来，在基督教中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当然，这四部福音书的创作并非没有神的旨意。因为这些不同的叙事通过相互补充的方式，奇妙地为我们的救世主提供了一个丰富而和谐的共同肖像画。我们得知，第一卷福音书（马太福音）是使徒圣马太为巴勒斯坦的犹太基督徒写的，然后他离开巴勒斯坦到其他地方传福音。根据教会传统，第二卷福音书（马可福音）是在圣彼得的指导下创作的。第三本（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它是在圣地勤奋调查的结果，并献给了一位高贵的罗马人，供其进一步学习，此后通过他成为基督教会的财产。第四卷（约翰福音）充分说明是使徒约翰的作品；我们还从其他地方得知，这位使徒在向以弗所教会长期口头

传讲耶稣之后，应教会长老的迫切要求写作了这本福音书。这些传统既得到了这些著作本身的证实，也得到了教会自始至终的尊重。第一个世纪的基督教文献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直到 150 年，这些文献才变得更加丰富。然而，尽管这些文献既少又零碎，我们却在其中发现了对福音书的反复引用；而且文献越丰富，这种引用就越多，这些著作的教会权威和使用也就越牢固。我们从各种个别例子中越是了解早期教会在传统问题上是多么严格和顽强，甚至在涉及保留次要传统时也是如此，它的见证就会得到越高的评价，这种准确性和顽强性也会使我们更倾向于看重它为福音书提供的证据。许多关于完全次要的敬拜礼仪传统差异存在争论，但关于正典福音书却从未出现过争论或讨论；整个教会的根本立场从一开始就被视为毫无疑问的决定。在这个问题上，在《约翰福音》中，传统的紧密联系链最适时地出现了；因为士每拿主教波利卡普（Polycarp）在 90 岁时殉道，他是使徒圣约翰的门徒。在爱任纽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大量关于圣约翰福音的见证，他本人也是波利卡普的弟子。现在，爱任纽一定掌握了关于这一点的准确信息；因为波利卡普，他的老师，自然会告诉他很多关于他与这位年迈的使徒约翰的个人交往。除此之外，第二世纪的其他证词远远超过了爱任纽，可以追溯到圣约翰死后的十年。

除了教会的见证，还必须加上异端的见证。第二世纪诺斯替主义奇幻学说的信徒们不会主动求助于正典福音书，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正是因为福音书的权威性得到普遍

认可，他们（诺斯替主义者）才不得不为自己的错误教义进行这种看似合理的辩护。

然而，为福音书作见证的不仅仅是教会的外部见证，也不仅仅是异端教派的见证；还有福音书的自我见证，即福音书叙述的和谐性、谨守性和整体性所提供的见证。对基督历史事实的了解是整个教会的共同财产；因为基督教的教导始于对基督生平事迹的教导。那么，如果福音书的叙述不是与这种口头教导相一致，它们会被接受吗？因为这起源于目击见证者，如果书面记录没有诉诸这种目击见证，无论其作者本身是目击者，如马太和约翰，也许还有部分马可，还是直接从目击者那里获得信息，如路加，它们都不可能接受。《福音书》具有这种特征，其完全的真实性和直接的知识成果是非常明显的。一种清新的气息、独创的魅力弥漫在所有福音书中，构成了它们独特的吸引力，产生了致胜的力量。从中，我们看到、听到耶稣本人，与他一起经历了历史的各个阶段。这里没有对历史的反思，而是对事实的体现；没有对历史的迂腐描述，而是历史本身；它向我们诉说；我们被移植到它的场景之中。这些直接的表述经得起任何调查。书中还穿插了大量的地理和其他方面的事情。我们可以验证它们的准确性，而所有这些验证都会成为佐证。

但最重要的是它们所描绘的主耶稣的形象事迹。主耶稣的肖像不是人类所能创造的，它一定是从真实的原作中复制出来的。我们

可以说一个人没有罪，没有错误，是神圣圣洁的形象。但是，如果没有我们有限的、错误的、有罪的头脑所引入的某些特征，我们就无法描绘出这样的形象，而这些特征会暴露其来源。然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幅完整的图画，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在所有内在和外在生活的变化中，在最鲜明的对比中。每一个特征，每一个最微小的转折，都让我们钦佩，让我们跪拜。没有人能按照这种方式进行发明创造。犹太人最不可能这样做，因为这绝不是他们心中的理想。因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可能是某个犹太文士，但耶稣却很少表现出这样的性格！他与这样的理想形成了完美的对比。耶稣的门徒在宗教问题上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依赖于老师的权威，这一点与其他不学无术的同胞是一样的，如果他们所描绘的这种具有压倒性力量和崇高性的模式不是以耶稣的形象真实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就永远不会从这些权威所规定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并建立起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式。红衣主教怀斯曼在他的一次演讲中说，在拉比们的著作中，我们有充足的材料来塑造一个完美的犹太教师的典范：我们有希勒尔、迦玛利耶和拉比塞缪尔的言行，也许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想象出来的，但都带有民族思想的烙印，都是根据想象中的完美规则形成的。然而，没有什么能比他们的思想和原则、行为和品格与我们救世主的思想和原则、行为和品格相去更远了。他们喜欢争论不休的争论，喜欢提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悖论，妒忌地维护自己国家的独有特权，热心地坚持法律的最起码的逗号，最诡辩地背离法律的精神。这些伟人大多如此——他们正是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写照，他们被

毫不妥协地斥责为与福音原则背道而驰。

勒南试图建立一个自己发明的理想，展现福音书的基本事实，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答案。他所描绘的耶稣，虽然高尚和蔼，但却是一个狂热分子，为了达到目的，他甚至不惜使用不道德的手段。我们的描绘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自己充满罪。但这些基督使徒以福音书见证了他们的真理，甚至记述了对真理的信仰。就连歌德也无法摆脱这种印象。

他在《与埃克曼的谈话》iii. 371 中说：“我认为《福音书》是完全真实的；因为其中闪耀着从耶稣基督身上折射出的崇高光辉，这种光辉是世间从未有过的神圣。”

对于我们现在的目的来说，如果这种内部和外部的见证只证实了福音书叙述的更基本、更一般的内容，那就足够了；因为如果我们只确定了耶稣基督这个人，我们就确定了要点。但这种确定性也延伸到细节方面。这些事件是基督教会的共同财富，即使是它的对手也不是不知道；因为正如圣保罗在罗马巡抚非斯都面前所断言的那样，这些事情不是在角落里做的（使徒行传二十六 26），而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做的。这些事情成为耶稣和他的对手之间多次讨论的主题，最后成为他受到审判和被处死的原因。

事实上，在所有反对福音叙述的历史真实性的不同论据中，最根

本的反对意见只有一个，那就是否认神迹——否认另一个世界。这种反对意见并非源于历史批判，而是源于世界哲学观。相信另一个世界存在，并在耶稣基督的人格和历史中看到其启示的人，会发现这个绊脚石已被移除，确信他的历史中的神迹是真实的。对于神迹，我们只有一个条件需要坚持，那就是神迹应该具有道德目的：神迹不应该是任意的、茫无目的的，也不应该是梦幻的，而应该是为了揭示在基督耶稣里显现的真理和恩典。了解福音叙事的人谁不知道并承认这一条件得到了彰显呢？如果我们想进一步确定这一点，我们只需比较一下世俗文化传统的系列传说、或奇幻小说，以及它们对神迹的任意而无味的叙述，毫无道德目的可言。

我们只需将圣经福音书与那些传统文化民间传说、及其毫无道德目的的武断而无味的神迹叙述，或有关穆罕默德的一系列传说，进行比较，就会确信它们与我们的福音书相去甚远，就像天与地相去甚远一样。

当人们首先下定决心不接受福音史时，他们会采取什么奇怪的手段来摆脱福音史呢？施特劳斯于 1835 年发表了《耶稣传》，开始了他的攻击，此后这些攻击又以不同的形式重复出现。他的观点是，早期基督徒用来自《旧约》预言的天国特征来装饰他们主人的形象，从而形成了一个神话和传奇叙事。但事实上，如果门徒们按照自己的期望来设计弥赛亚的形象，他们会创造出一个完

全不同的形象。他们描绘的将是大卫的皇子，而不是加利利的先知、被钉在十字架上又复活的救世主。基督历史的外在事实对他们的信仰是阻碍而不是帮助；因为这些事实既不符合他们的心愿，也不符合他们的期望。除非基督本人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否则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使他们超越所有这些信仰的绊脚石，使他们确信基督就是弥赛亚。除了《福音书》中描述的耶稣的生平和神迹这样非凡的现象，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而且，从福音历史本身到其描述之间的时间如此之短，尤其是在那个历史准确性和文学活动丰富的时代，怎么可能形成这样一个神话圈呢？这种观点与所有的历史可能性都是对立的。单个的传说和神话可能是由于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或令人敬畏的人物在人们心目中可能产生的不同寻常的印象而产生的，也可能作为历史叙事的点缀而被添加进去，但本身就是奇迹的生命与生活却不是这样。

然而，施特劳斯自己也承认，他的攻击是失败的，他不得不说，耶稣基督的位格毕竟仍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之谜，“无论如何，基督教对整个世界的 importance 都取决于他的位格”。此外，他不得不让复活之谜悬而未决。如果这一点仍无法解释，那么对人类历史的所有其他解释又有什么用呢？

有人大肆渲染几部福音书之间存在的差异，目的是使它们的证词失效并引起怀疑。但这些所谓的差异，即使影响到细节和外表，

却没有触及历史的本质。在任何其他情况下，这些差异都不会被视为反对事情本身的有效论据。已发现的这些不一致之处一般都是由于完全从外部的角度来看待和比较这些叙述，而忽略了对每个福音书作者选择和安排其材料所依据的基本思想的探究，以及类似历史事件细节的多次发生，例如耶稣的讲道。

在简要介绍了福音书本身之后，我们将回到对耶稣基督本人的探究。

福音书的一个特点是，它们处处都在向我们展示耶稣基督的人格。如果我们愿意，我们不可能仅仅停留在他的教导上。我们到处都能见到他本人。在他所说的一切话中，我们都能看到他的形象。是他赋予他的言语以独特的魅力，是他将崇高的严谨与亲切的和蔼奇妙地融合在一起，使它们如此难以抗拒。他自己散发出馨香，弥漫在他的话语中，使它们成为生命之言。耶稣本人的形象闪耀在他的一言一行中，构成了福音史的中心点。

那么，福音书所描绘的耶稣形象是什么呢？

我们被告知，耶稣是在加利利的一个偏远小镇上，在一个默默无闻的居民家里长大的。事实上，他的出生地是大卫之城伯利恒；与此相关的神奇事件也有记载。他像其他孩子一样在父母家中长大。只有一件事，一句话，被圣路加保留了下来，那就是耶稣十

二岁时在圣殿里说的话。我们对他这段沉默时期的了解，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他的温顺，这是在我们面前的这幅图画中的主要特征，而这幅图画正是历史叙述中的几处点睛之笔。

在天国即将来临之际，他来到施洗约翰那里，像其他以色列人一样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尽管他清楚地知道，是他自己要把天国引进来。约翰拒绝了，他宁愿从他那里寻求洗礼，因为他是比他自己更高更伟大的人，他不配解开他鞋上的锁扣；但耶稣让他履行他的职责，甚至说：“我们理当尽这诸般的义”。我们得知，在这次洗礼中，天父为他的儿子作了神奇的见证。之后，耶稣从水里出来，到了旷野。在经历了神秘的试探之后，他始终保持着无私顺服的天职，回到施洗约翰的附近；当他默默地上路时，约翰的一些门徒跟着他。“你们来看”，这是所记录的他对他们说的唯一一句话；但他给他们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们终生与他的事业紧密相连。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他出席了迦拿的婚礼；在他的一言一行中，我们看到了同样谦卑的矜持；他只是在上帝指明的道路上一步一步地前进，耐心地等待着他的事工逐渐发展和扩展。许多人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他的身边，直到他逐渐唤起了一场宗教运动，这场运动一直延伸到以色列的边境，并很快唤醒和增加了反对者对他的敌意。他之后的一生就是一连串持续不断的旅行，充满了动荡和清贫，是一轮无休止的活动和令人精疲力竭的劳动。从他在加利利传道的一开始，情况就是这样。他从拿撒勒出发，把迦百农作为他的中心点。在众人的陪伴下，

他来到加利利湖边。在这里，他上了一艘船，当他们站在岸边时，他就在船上教导他们。他呼召门徒跟随他；他进入会堂，在众人的喧闹中教导和医治。离开后，他进了彼得岳母的家，治好了她的热病。傍晚，安息日已过，有人从四面八方把病人和被鬼附的人带到他那里，他一直为他们治病到深夜。天还没亮，他就到一个隐蔽的地方去祷告。

他就这样在迦百农开始传道，并在其他地方继续传道。福音书的作者不止一次地提到，他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他甚至被工作缠身，以至于人们认为有必要用强力限制他，因为人们担心他会失去理智（马可福音第三章 21 节）。

这就是他在加利利传道的开始。这种情况持续了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福音书提供的细节足以让我们了解他在这个地方的事工。无论从外部还是从内部来看，他的事工都可以说是令人兴奋和精疲力竭的。然而，如果我们追问这种活动的灵魂是什么，我们将不得不说，这里所描绘的是一位救世主的生活，一种献身于穷人、病人、被遗弃者和被鄙视者的生活，一种献身于不幸者的生活；他把他们从生活的忧伤中解救出来，尤其是从心灵的压抑中解救出来。税吏和罪人，哀悼者和忧伤者，这些都是他所寻找的群体。他给受苦的人带来安慰，呼召疲惫和负重的人，使他们得到安息。他生命中的每一个行为都充满了怜悯的爱和仁慈的善意。我们在《旧约》中读到上帝给先知以利亚的启示（《列王记上》十九 11、

12): “耶和華說，你出來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時耶和華從那里經過，在他面前有烈風大作，崩山碎石，耶和華卻不在風中。風後地震，耶和華卻不在其中。地震後有火，耶和華也不在火中。火後有微小的聲音。”以利亞聽見這聲音，就用幔子裹著臉。——這就是在基督里所顯明的上帝。如果說愛曾在地上顯現過，那也是在基督里以溫柔和謙卑的形式顯現的。

但在这位温顺的罪人之救赎主的外表下，流露出一种荣耀和威严，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向他屈膝。谁能在默默地注视着他时，不感到他身上有一种神秘而隐秘的威严，并从他的一言一行中看到这种威严的光辉呢？

最重要的是他最深的谦卑。他的爱是以作为罪犯死在耻辱的十字架上作为回报的。他一生行善，却头戴荆棘冠冕离世。他死时大约三十三岁半，他的死是何等的悲惨！人类的恶意所能创造出的任何对身心造成痛苦的东西，都与他的死有关。耶稣不是无情无义的斯多葛派，傲慢地蔑视苦难、或造成苦难的人类。他的灵魂深处感受到了这一切。他的爱越伟大，他就越痛苦地感受到，他来救赎的自己的子民竟如此卑鄙地拒绝他。最令人扎心的莫过于他的子民对他的拒绝。

没有什么比圣经四福音书的作者们对耶稣最后时刻的朴实无华的描述更感人了。他们几乎是漠不关心地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细节，丝毫没有透露他们内心的情感。但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叙述才更加感人。向我们讲述这些事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他们的主题。我们在这里思考的不是普通人的生命与生活。我们在客西马尼和十字架上的所见所闻，迫使我们感到我们是在一个深奥的奥秘面前。我们似乎能感知到他的灵魂与天父上帝的内在相搏；它们是无形世界的事，透过可见事件的面纱闪闪发光。我们不能不有赎罪祭的概念。

然而，在压倒他的十字架苦难与鞭伤中，他以温顺宁静的态度忍受着罪人的折磨，以宽容的爱对抗邪恶的恶意，这甚至比他的生平更强烈地震撼了我们。前者胜过了出卖他的人，后者使盗贼皈依了信仰；而在整个场景中，他闪耀着伟大和威严的光辉，甚至连异教徒的百夫长也发出了这样的忏悔：“这真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也不能不说：这不只是一位圣人，不只是一位殉道者，不只是一个人。

他的死亡和受难的奥秘是通过他的本体的奥秘向我们揭示的。他的人是一个奇迹。即使我们只了解他的事工，对他的起源一无所知，我们也无法回避这样的认知。谦卑与威严的结合给他的整个举止打上了独特的烙印，爱的无声力量使他的生命成为上帝之心的启示——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他的圣洁的彰显，而圣洁正是他

的位格和本性的道德特征。

没有人会不被他圣洁纯净的本性深深打动。即使否认其他一切，至少也必须承认这一点。耶稣的问题“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在过去的时代是无法回答的，即使在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如此。

此外，主耶稣的形象是最崇高、最纯洁的和谐，无论是他的精神本质还是道德本质。

其他每个人的内心生活都是不和谐的。精神生活的两极，知识和情感，头脑和心灵；道德生活的两股力量，理智和意志，我们在哪里能找到它们的一致呢？相反，在耶稣身上，我们生动地感受到，在他的内心世界里充满了完美的和谐。他的内心世界绝对平静。我们无法想象在他身上有任何一种精神力量占据优势，而其他精神力量却因此退居其次，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他的智力部分和天性是完全相称的。

他的整个道德和精神生活也是如此。这是一种至为完美和谐的人的生活。他有爱，有心，有感情；他又有思想，有精神上的启迪和升华。在他的天性中，情感与理智之间没有分裂。此外，他的感觉和情感、思想和决心都具有最强大的生命力，但他内在本性的这种生命力从未陷入失控的激情澎湃之中；一切都是宁静的尊

严、平和的朴素、崇高的和谐。

这就是福音书向我们展示的基督形象，我们不得不说，他的确是这样的，他也一定是这样的。在这样的形象中，反映了他本性的道德和谐。正是因为在他身上没有任何充斥于其他人内心世界的道德不和谐，他的心理和精神生活才如此和谐、安宁。耶稣与自己完全和谐，因为他与天父上帝完全和谐。这就是他无处不在的意识。他知道自己与天父是绝对相通的。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即使是最虔诚、最圣洁的人，与上帝共融的意识也总是伴随着罪的意识，即使罪已被赎回并得到宽恕，但罪的意识仍然构成了它的背景和前提。而耶稣却不是这样。他的意识是纯粹的、绝对的与天父上帝的交流。耶稣生活在与天父上帝持续不断的祷告中。

他的一生都在祈祷，但他从不祈求宽恕。他教导我们祷告，饶恕我们的过犯；但他自己从未这样祷告过。他与天父之间没有这道隔墙，因为在他里面没有罪。他的灵魂，他的理智和意志，永远完全在他父的事务中。那么，一个罪人的后裔怎么可能不受所有其他凡人的普遍道德法则的约束呢？他不可能像其他人一样。他的本性一定超越了纯粹人类的界限。他向我们展示的道德现象肯定也是如此。这也是他所行神迹的教导。他的一生充满了奇妙的事迹，完全超越了人类思维惯于对自然界行使的权力和指挥的最大限度。我们不需要对自然界所有隐藏的力量和法则了如指掌，就能确定我们在这里读到的确实是神迹。任何自然力量都无法将

水变为酒，也无法只用一句话就让瞎子看见、聋子听见、哑巴说话、麻风病人洁净，甚至让死人复活。然而，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仿佛是他的本能。这些神迹不是通过努力实现的，而是自由的能力。但是，有人试图用人造的或所谓自然的解释把它们（那些神迹）从他的生命中抽离出来，摆脱它们。但这是徒劳的！我们还不如试图从该撒或亚历山大的生活中抹去他们的军事成就和战斗。那还能剩下什么呢？他的神迹构成了他生命和事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从其中删除。否则，那样一来，他的历史就完全无法理解了。他的神迹吸引了如此众多的人，以至于他的对手的妒忌不断地、越来越强烈地激发出来；他的神迹成了他的对手们争论不休的话题，他们不敢完全否认他的神迹，但除了把它们归咎于鬼王的作用之外，别无其他权宜之计。使徒们后来也将这些事迹作为公认的事实，当时有许多证人（如使徒行传 x. 37）。甚至在使徒时代之后，辩护士奎德拉图（Quadratus，二世纪初）也提到了一些被主医治或从死里复活的人，在他写作的时候他们仍然活着。总之，不可否认，耶稣基督的神迹是历史事实。

但我们认为，我们关心的毕竟是主耶稣本人，而不是他所行的神迹。他不是为了创造神迹而创造神迹。他的怜悯促使他去帮助那些可怜的人。但他的目的远不止于此。他的目标要高得多。他行动的目标是拯救灵魂。他希望通过神迹治愈的是信仰的软弱。这些对他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他一直意识到自己拥有神奇的能力；但他让自己的能力服从于他的职责——他作为人的救赎主的职责。

他行神迹的目的是为了荣耀天父上帝，是为了产生或增加人们对他的信心，是为了显明他拯救灵魂的事工。他的神迹就是他所要带来的灵魂救赎的预表。它们是纯粹的仁慈之举；因为他来不是要毁灭人的生命，而是要拯救他们。它们不是茫无目的、任意而为的行为，而是各有道德动机和道德条件；不是单纯的能力行为，而是拯救之爱的行为。可以说，它们是他教义的象形文字，同时也表明他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远远超越了所有普通人。

他的教导伴随着他的神迹。奇迹说明了他的教导，而他的教导又解释了他的行为。没有教诲，他的神迹就没有宗教意义。即使对我们来说，他的教导也是最重要的；因为事实上，我们不仅是为了他的神迹而相信他的教导，而也是为了他的教导和他自己的缘故而相信他的神迹。我们确信他自己，也确信他的神迹。如果他不是他，如果他的教导不像他那样让我们心悦诚服，他的神迹就不会给我们留下这样的印象。我们将不得不把它们视为历史事实；我们将不得不承认我们无法解释它们；我们将不得不承认它们的真实性，并从它们中推断出耶稣不只是一个普通人。它们之所以如此，完全是因为它们与耶稣的教导和位格有关。正是这一点赋予了它们更高的真实性和宗教重要性。正是这一点迫使我们这样说：他的教导是这些神迹的前提，而这些神迹又是这些教导的前提。两者互为前提、互为印证、互为解释。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他的教导。

有一次，当犹太公会委托他们的官员想要抓住耶稣、把他带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的供词是：“从来没有人说话像这个人”（约翰福音第七章 46 节）；我们不能不同意这个供词，所有的时代不能不同意这个供词。自耶稣讲道以来，已经过去了十八个世纪，在这十八个世纪中，人们的观点发生了许多变化，但他的话语依然保持着其古老而又新鲜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要理解它和体验它的效果，不需要学识渊博，也不需要特殊的准备。它对所有人都具有同等的可理解性，对所有人都具有同等的影响力，没有区别。只是因为我们对它太习惯了，所以它并不总是对我们施加其原有的影响，也不产生同等的效果；但如果我们解开心结，将我们的心交托给它，它就会以其胜利的力量出现在我们的脑海中，就好像这些话是直接从主耶稣的口中对我们说出来的一样。

那么，主耶稣教导的特殊力量究竟在哪里呢？其影响力的秘诀并不在于其卓越的辞藻。耶稣不是诗人，不是演说家，也不是哲学家。吸引我们的不是诗歌的魅力，不是让我们惊讶的巧妙应用，不是让我们神魂颠倒的雄辩，不是让我们惊叹不已的大胆推测；不是这些。无论是登山宝训，还是耶稣关于天国的比喻，抑或是所谓的主祷文，没有人比耶稣说得更简洁明了。没有人比耶稣说话更简单。然而，这正是耶稣影响深远的原因，他用最朴素的语言道出了最伟大、最崇高的真理。

他用最平实的语言表达最伟大、最崇高的真理时，我们看到他是多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我们不能不看到，永恒真理的世界是他的家园，他的思想与之不断交流。他谈到上帝和他与天父上帝的关系，谈到超世俗的精神世界，谈到未来的世界，谈到未来的人。人的生命，神在地上的国度，它的性质和历史，最高的道德真理，人的最高义务，总之，所有人生最大的问题和最深的谜团，都是如此简单明了，没有任何精神刺激，没有对他特有的知识进行晦涩深奥的阐述，甚至没有像那些有新东西要传授的人那样对细节喋喋不休，仿佛一切都很自然，不言自明。我们看到，最崇高的真理就是他的本性。他不仅仅是真理的导师，他本身就是真理的源泉。真理是他本体的一部分。他可以说，我就是真理。我们在聆听他的话语时的感觉就是，我们在聆听真理本身的声音。因此，他的话语在任何时候都对人们的思想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他的教导不仅是他的本质神奇性的外在表现，他还使他的位格成为他所有教导的中心点。他本身就是他的教导。他讲的是神的国度吗？是他自己建立了这个国度，对他的信是进入这个国度的途径；而这个国度的本质在任何情况下都永远与他的位格联系在一起。他是最崇高的道德导师吗？他的教义是最纯洁、最崇高的道德哲学吗？他的伟大成就是将宗教和道德从单纯的外在行为转变为内在的心灵和思想状态吗？信他，因信而爱神，这就是他的教义。即使他没有直接提到他自己，他真正说的也是他自己。他把

自己作为每一次宣告的中心点。他的大部分教导都不是间接地，而是直接地这样做的。他把一切都建立在他自己身上。他所倡导的事业、他所带来的救赎、他所提出的要求、他所宣布的未来，都取决于他的位格。这是他所有教导的主旨。“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约翰福音第八章 24 节），事实上，这句话可以概括他的全部教义。这是多么奇妙的一句话！没有比它更崇高、更自尊的了。人类的伟大导师中，没有人敢说这样的话。我们也不能容忍其他人说出这样的话。历史上其他一些人也曾谈论过他们所倡导的事业和他们所传播的信息，或许还曾断言这些都是真理。但在每一种情况下，他们的重要性都来自于他们的事情的重要性。而相比之下，耶稣让一切都取决于他自己的人、他自己的位格；事实上，他的位格就是他的事。他总是把自己的分量放在天平上。当他最强调地保证或确认时，他的话是：“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们要相信他的话，不仅是因为其内容的真实性，而更是因为他的位格尊严。因为是他说的，所以是真的。宣言的权威取决于人的权威：“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说话。在《旧约》中，只有上帝说过这样的话。耶稣的话语仿佛是神圣的权威。然而，他是所有人中最温顺的人；这种情况使“是我”这句话更有力量。

那他是什么呢？

他用自己的两个称谓概括了他告诉我们的关于他自己的一切，这两个称谓也一直是他现在的称谓。他称自己为人子和神子。那么，这两个称谓意味着什么呢？

他称自己为人子意味着什么？一方面，通过这个称谓，他把自己包括在其他人之中——他是我们种族中的一员；另一方面，他以此把自己提升到整个种族之上；从真正的意义上说，他是人类之子。他是人类的儿子，是人类真正的后代，人类的整个历史都在向他靠拢，人类在他身上找到了统一，在旧时代结束和新时代开始之际，历史在他身上找到了转折点。他的头衔“人子”意味着整个人类都在他身上，他是人类历史的目标。

耶稣基督的整个举止具有普遍性的特征。这是他给每个人留下的印象。在每一个民族的历史中，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把自己包含在某些思想和品格比一般人更全面的人身上。每个民族都崇敬这样的历史英雄，他们在更高的意义上是民族天才的保存者，在他们身上，民族看到了自己的存在。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过是对完美代表的近似和尝试。尤其是当对人类的整个本性和思想的理解成为问题时，情况更是如此。即使是那些最能代表人类思想的人，即使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具有普遍性的天才，他们离真正成为人类的代表还有多远！耶稣就是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但他是世人所见过的唯一一个。他是人类的真正原型，在他身上完善和展现的不仅仅是人类本性的个别方面，而是人类本性本身，

是原始的真理和纯洁，没有罪恶带来的干扰和变态。在他身上，我们发现了我们真正的本性。正是在这种原始性中，耶稣基督是普世的原型。无论人们的国籍和个性如何不同，每个人都可以把耶稣看作自己的原型。诚然，就外在环境而言，他既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他是马利亚的儿子，也是以色列联邦的一员，他的外在生活只包括有限的一些情况，然而，他在历史上显现的这种明确而特殊的形式却如此彻底地包含着普遍性的特征，以至于他是所有人在所有时代和所有环境下的最高的、无所不包的、取之不尽的原型。在他面前，一切民族特性、时间距离、精神修养的差异都烟消云散。当我们看到他被希腊人追随，尽管他不是任何一个希腊哲学教派的创始人；被婆罗门印度人敬仰，尽管向他们传教的是渔夫种姓的人；被加拿大的红人崇拜，尽管传教士属于被憎恨的苍白人种，——我们不能不认为他注定要打破一切肤色、形状、面容和习惯的区别，在他自己身上形成亚当所有子孙都可参照的统一类型。

在他身上，人类找到了自己的一体性，因此，人类的历史也找到了自己的目标。他降临之前的所有历史都是对他的预言。外部事件的整个进程和人类思想的进步都在向他靠拢；两者的结果都是需要他、渴求他、而无法产生他；因此，在他身上，两者都得到了圆满。他是全人类集体发展的渴求和目标，这是他力量的秘密，也是他成功的保证。他既实现了以色列人的预言，也实现了外邦人的预言；因为他彰显了拯救人类的神圣计划。此外，他还实现

了我们自己心中的预言，即我们渴望的目标；它在不知不觉中将我们所有人与他联系在一起，并不由自主地吸引我们走向他。我们的目标是他，而我们自己却不知道。我们都如此向往他，以至于没有他，我们的灵魂就得不到安宁；因为他是我们存在的真理。因此，他是我们所有人的目标、是我们之间的纽带。

这就是他针对于世界的普遍地位的原因。他以最强调的方式说明了这一点。他称自己为世界之主。他将整个世界和个人的命运与自己联系在一起，使之取决于他们对自己的信仰。当他谈到这一点时，他的话语超越了一切人类的尺度。但他是世界的主，只是为了成为世界的救赎主。他来寻找并拯救丧失之物。这是对罪的救赎，是与上帝的真正关系，他要赐给世人的是和平、救赎。

他是主，他是救赎主，他是中保，通过他，罪在上帝与人之间竖起的隔墙将被废除，他所做的赎罪将成为新约的根基。耶稣就是这样谈论自己，谈论自己的使命和意义。

同样，他也将自己与全人类相对比，将自己提升到远远高于我们的高度，以神圣的全能和权威出现在全人类面前。特别是在谈到他的未来时。他用了可以想象到的最强烈的措辞。就在他作为罪犯被定罪，看到十字架上可耻的死亡摆在他面前时，他对审判者重复了他已经对门徒说过的话：他将升到天父上帝宝座的右边——将在神圣的荣耀中显现，被侍奉他、执行他命令的神的天使围

绕——将召万国到他的审判台前，按照他们对自己的行为审判他们。他曾这样表达自己，这是历史事实；因为这是他被定罪的理由，后来成为早期基督徒的普遍信仰和最坚定的希望。但这是多么无与伦比的一句话！如果是在其他人的口中，这简直是疯言疯语。即使是罗马皇帝们的疯狂傲慢，要求向他们的雕像致以神圣的敬意，也从未达到如此匪夷所思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最温顺的人却说出了这样的话；他以最冷静的态度说出这些话、不是在激动的时刻，而是为了教导他的门徒，为了警告他的敌人，在平静和安宁的时刻，在他对外确实屈服于暴力，但对内却战胜了敌人，通过提升他的道德本性，超越了人的一切卑鄙和邪恶，并显明了他在道德上的最大胜利；——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他称自己为神圣的统治者和世界的审判者！

这样的断言一定是真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真理与疯狂之间没有媒介。在这里，任何理性主义的美德理想都无济于事：仅仅称耶稣为人类的原型和预示，不足以证明这种说法的合理性：我们不得不放弃人类的局限，在上帝本身中寻找他存在的根源、他的本性和生命的本质，以解释这种说法的可能性，如果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人，那么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一个无法解开的心理学之谜。如果耶稣和我们一样处于有限存在的法则之下，那么这种说法就是不可能的。他必须从本质上脱离有限的存在，而必须是神圣和永恒的生命。他与世界的绝对关系，要求他与上帝的绝对关系。后者是前者的必要前提，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真正理解前者。只

有因为耶稣对上帝而言是他所是，他对我们而言才能是他所说的。他是人子、世界之主、世界的审判者，只因为他是天父上帝之子。

他就是这样称呼自己的。如果他要谈论他本性中最高、最深、最神秘、最奇特的东西，他就称自己为上帝之子。这不是后人的概念或发明，而是耶稣自己的见证。没有人会否认这是他自己的说法。尽管前三卷福音书更多展示了耶稣与世人的关系，而第四卷福音书更多阐述了耶稣与天父上帝的关系（这构成了耶稣与世人关系的隐秘背景和前提），但前三卷福音书和第四卷福音书都包含了这句话（“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本身，并以最明确的方式表达了这句话的特征。这是《圣马太福音》中的话：（第十一章 27 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他与父的关系是无与伦比的。但正如圣子为圣父所知，圣父也为圣子所知，两者之间有着最亲密的默契，而对于世人来说，两者都处于神圣奥秘的朦胧之中，直到基督脱离神圣的隐藏，出现在人世间，这个奥秘才被揭开。耶稣称自己为天父上帝之子，是绝对意义上的，而不是人因被造或在道德上与上帝相似而被称为上帝之子的那种意义。就耶稣而言，这个称谓表示他自己的本质与性质的关系。不是程度上的，而是种类上的。他以此造人；人是一体的，上帝确实是我们的上帝。上帝是我们的父，也是他的父，但意义完全不同。他与天父上帝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他与上帝的关系是绝对的（约翰福音

第十章 33、38 节)【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僭妄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 …“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他的同在，他的异象，实际上就是天父的异象（第十四章 9 节及以下和第十七章）【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他本身就有神圣的生命（第 26 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因此，他甚至会像天父一样受到尊崇（第 23 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总之，他把自己包括在上帝的本体中，因此，在世人和全人类面前，他是神。除非他是神性的一个基本部分，因而也是永恒的部分，否则，人怎么可能与神如此相关，以至于两者之间存在着最严格的关系，而不受任何罪或受造物的限制呢？因此，这些考虑因素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他的永恒存在，耶稣在第四卷福音书中如此频繁地确认这一事实，当他说自己是从父那里来，又来到这个世界上时；【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

我。】（约翰福音第八章第 58 节）；当他指定他在时间之前的存在是他参与神圣的爱和荣耀的存在时（约翰福音xvii. 5, 24）

【父阿，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 父阿，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因此，他使自己成为天父上帝本质和存在的分享者。在这个最高意义上，他称自己为上帝之子。

福音书中的这些命题包含了真实的历史传统，即使是最有批判精神的人也必须承认这一点。就我们而言，决定性的问题是，耶稣真的在这种超人的意义上称自己为天父上帝之子吗？如果是，这种说法就一定是真的。我们听说，当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时，有一天，他按照惯例谈论古代伟人，并将自己与他们进行比较，突然，他转向他的一个随从问道：“你能告诉我耶稣基督是谁吗？”当后者承认他还没有花时间考虑时，他继续说道：“那好，我就告诉你耶稣基督是谁”。然后，他将耶稣基督与他自己以及古代的英雄人物进行了比较，并说明耶稣是如何远远超越了他们，最后他说：“我想我对人性有些了解；我告诉你，这些人都是人，我也是人；但没有一个人像他：耶稣基督胜过人”。

如果耶稣真的如他所说，是世界之主，他就必须如此，因为他教

导我们，他是神性的组成部分。这些事实可以而且已经得到了证实；但在我们接受他自己对他神子身份的见证所提供的解决方案之前，这些事实仍将是无法解开的谜团；除非，如果他在这个意义上真的是神的儿子，那么一切就都清楚了，我们所知道的关于他的其他一切也都是必要的。但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他。如果我们不得不把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实——一个自称可以解开一切谜团、使我们的一生成为祝福的事实——完全抛在脑后，那么我们可能获得的所有其他知识，所有关于人类思想及其历史、人类本性及其命运的知识，又有什么价值呢？即使我们愿意，我们也不能就这样离开它，因为它无处不在地与我们相遇。我们必须对它采取某种立场。然而，没有其他立场是可能的，而这种立场绝对不是自相矛盾的：那就是根据基督自己的见证，承认他是天父上帝永恒的儿子，他本身具有永恒的神性与荣耀。

这就是他的整个历史给人留下的不由自主的印象。当多马被复活的救世主的显现所震撼，惊呼“我的主，我的神”时，那是压抑不住的情感的表白！但这种情感的告白也成为了信念的告白；我们的理智最终必然会我们将我们引向这种信念。

耶稣为我们留下了两个圣礼。他出现在世间，并不是为了制定宗教生活的外部教规。他希望在思想和心灵中，在最深处的灵魂中，为那座在天地消逝后仍将永存的大厦奠定基础。然而，他确实为

我们制定并留下了两项圣礼——这两项构成基督徒生活和教会精神的外在形式的仪式——为了将它们与其他一切仪式区分开来，我们称这两项仪式为“圣礼”：洗礼和主的圣餐。它们由基督亲自设立，这一点毋庸置疑。每一项圣事的本质都是神秘的，每一项圣事都宣告了一个奥秘。在制定洗礼仪式的话语中，耶稣将自己的名字放在圣父和圣灵的名字之间（基督徒的洗礼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这样，他就将自己置于神圣生命和本质的范畴之内，并说他自己是天父上帝之子，是神圣本质的参与者。他在设立圣餐时说，他将自己的身体和宝血赐给世人，以赎世人的罪。他在关于圣餐的圣礼中宣布了自己出现在世间的本质目的，上帝爱的永恒旨意在其中得到了彰显和实现。

三位一体和赎罪这两个奥秘实际上是在基督的这两个圣礼制度中向我们宣布和教导的。这是基督教的两大核心真理。有了它们，我们就进入了其内在的圣所；而我的目的只是要通过把基督教的基本真理呈现在你们面前，并设法证明它们的真理和必要性，把你们引向那圣所的门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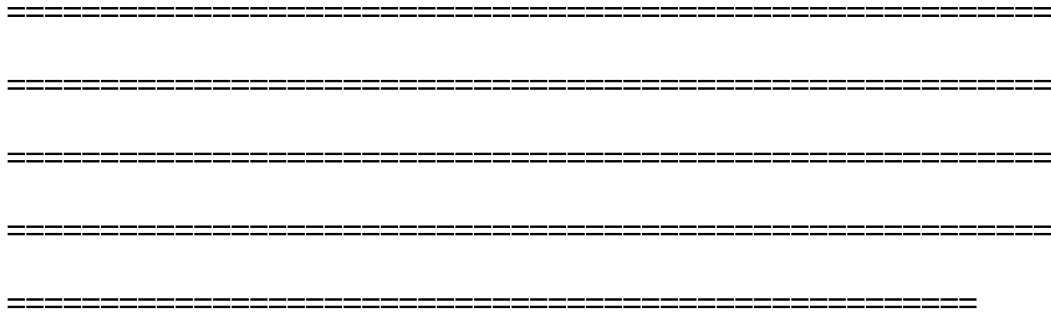
到此为止，我的任务结束了。我们共同走过的道路始于生存的矛盾、人类生活的谜团和人性的问题。我们看到，生存之谜需要上帝，需要有位格（能听、能看、能作为、有自我意识与自由意志）的上帝。但上帝不是死的力量，而是活生生的爱；他向人类启示了自己。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彰显了自己；在他身上，我们生存的

矛盾得到了解决。因此，让我们毫不退缩地承认，在这个世上，我们的内心确实存在着许多矛盾；它们是使我们无法安息的荆棘。只有找到基督，我们才能得到安息；在他那里，矛盾得到了解决。是他解决了上帝与人、圣洁与罪恶、天堂与人间的的问题。在他那里，我们得到与上帝的绝对的和解。如果我们能穿透所有的空间，我们就会发现神的力量；如果我们能勘察所有的时间，我们就会看到公义的神。但是，只有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能认识恩典之神。

在基督耶稣里，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找到了他们的平安和喜乐。整个基督教会的集体生活就是对基督的信仰告白。她的行为、她的整个崇拜、她的布道、她的祷告、她的圣歌、她的神圣仪式，都是对基督的见证；她从一开始就为之服务的所有艺术，以及无论是语言还是表现，都是为了荣耀基督。只要世间还有感恩之心，人们就还会记得他，他的名字就还会在人们的心中和嘴边萦绕。谁要剥夺人类对他的记忆，谁就会拆毁人类这座最高贵大厦的基石。但基督教所保留的不仅仅是对逝去恩人的怀念，而是一种至亲关系，一种与活生生的人的切身而重要的关系；在他的名字面前，所有人的心都在跳动，所有人的膝盖都在叩拜。在任何时候，福音书中描绘的耶稣形象都将对人们的心灵发挥其神秘的力量，从他身上发出的精神将成为一种纽带，在信仰和爱中将他们与基督自己联系在一起，从而成为将整个人类联系在一起的爱的纽带。只要世界上还有基督徒（直到世界末日也会有基督徒），他们就

会以“愿主耶稣基督赐福”的敬语彼此相认！

我以这些话结束我的演讲。我已尽我所能，阐述了我们共同信仰的坚实基础。我已经尽力表明，我们遵循的不是虚幻的寓言，而是真理，是我们的理性、良知和情感所认定的真理。



圣保罗在雅典亚略巴古会的演讲（《使徒行传》第十七章第 11-31 节）中概述了基督教世界观的主要特征，并在《罗马书》前十一章中更全面地论述了同一主题。【保 罗 站 在 亚 略 巴 古 当 中，说，众位雅典人哪，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未识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事，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本有古卷作血脉），住在全

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各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作可信的凭据。】